

邓小平思想年谱

一九七五——一九九七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0100337

D2 10
67

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 — 199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2

ISBN 7-5073-0530-9

I. 邓… II. 中… III. 邓小平理论-1975~1997-年谱
IV. 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3253 号

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

编 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责任编辑/姚建平

封面设计/张 戈

版式设计/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北京博诚印刷厂

850×1168mm 32开 14.75印张 260千字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ISBN 7-5073-0530-9/A·71 定价：23.00元

出版说明

《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是根据邓小平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九二年的大量文稿及其他有关档案资料编写的。文稿包括讲话和谈话的记录、批示、书信、题词等，截至一九九二年南方谈话，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全书共六百余条，首条是一九七五年一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实际上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最后一条是一九九七年九月中共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思想年谱》比较系统地反映了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对《邓小平文选》的重要补充。这个年谱的出版，对于全面、系统、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目 录

1975 年	(1)
1976 年	(24)
1977 年	(26)
1978 年	(53)
1979 年	(104)
1980 年	(141)
1981 年	(178)
1982 年	(211)
1983 年	(245)
1984 年	(277)
1985 年	(307)
1986 年	(347)
1987 年	(373)
1988 年	(400)
1989 年	(419)
1990 年	(447)
1991 年	(455)
1992 年	(459)

1993 年	(465)
1994 年	(466)
1997 年	(467)

1975年

1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举行。在这次会议上，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

1月19日 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根据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提出：军委只准备两个工作，第一是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其中一个大题目就是军队要整顿。第二是战备，要准备打仗，解决战略方针、装备等问题。整顿军队是邓小平抓全面整顿的开端。

1月20日 在会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保利茂一行

〔1〕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重申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分两步走，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构想。这个报告是邓小平主持起草的。

时说：同日本友好的方针是毛主席定下来的，是周总理领导实行的。我们要贯彻这个方针。中日关系不从比较高的政治角度来考虑是不行的。我们彼此都采取这个态度，这样，政治上解决和平友好条约是不困难的，经济交往也会是不困难的，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我们永远不称霸。中日两国联合声明里就写了任何一方都不谋求霸权。坦率地说，现在我们这么一个落后的国家有什么资格称霸？问题是三十年、五十年以后，我们也成了一个发达国家，是不是也要称霸？毛主席制定的路线叫永远不称霸，不是讲现在，是讲将来永远不称霸。我们在联合国正式声明过，如果有朝一日中国要称霸，世界人民就有责任揭露我们，指责我们，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来打倒称霸的中国。我们是用这样的路线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的。中日联合声明之所以确立了我们两国间长期友好的关系，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双方在亚洲也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也好，都不谋求霸权。所以，我们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有了这一条，我们友好的基础就是牢固的，就可以建立牢固的相互信任关系。

1月25日 在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传达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针对林彪、“四人帮”对军队建设的严重破坏，指出：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

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这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还很严重。问题主要在干部。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战斗力也一定会削弱，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喜欢搞派性的，要觉悟，要改正，改正了就好。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提出加强纪律性，首先要从我们北京的机关、部队做起。所以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加强纪律性。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军队要整顿》。

3月1日 在同刚果总理洛佩斯会谈时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再存在，两大阵营的概念已不合乎今天的实际。因为不但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阵营也发生了变化。拿帝国主义阵营来说，当然老殖民主义还在采用新殖民主义的方式掠夺第三世界，但欧洲、日本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们有相互依赖的一面，但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成了它们之间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而且它们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出现了一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3月5日 在为解决铁路问题召开的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到二十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要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还必须反对派性。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还指出：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这个讲话的大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同意的九号文件《关

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3月25日 在听取关于徐州铁路局情况汇报时插话说：平反工作要真正搞起来也快，要一批一批地搞，不要一个一个地搞。铁路一通，就暴露出冶金、电力等各行各业的问题。各部都要自己打算打算，怎样工作，怎样解决老大难问题。下一步的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

4月1日 在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艾伯特、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罗兹时指出：我们这个国家还很落后。我们也有一些雄心壮志，看能不能在二十世纪末达到比较发展的水平。所谓比较发展的水平，比你们、比欧洲的许多国家来说，还是落后的。我们的人口多，有八亿人，人均国民收入还是很低的。钢要达到你们和欧洲、日本的水平，至少要五十年的时间，而到那时候，你们又发展了。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他指出：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很欣赏当时尼克松总统走出了勇敢的一步，亲自到中国来，双方签订了上海公报，这是我们两国关系的转折点，是新的开端。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对国际政治的许多主张也不同，但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语言，甚至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些共同的语言。总的来说，在这差不多三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内，我们觉得发展还是好的。只

要遵循上海公报的精神和原则，逐步发展两国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指出：我们两国之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只能按日本方式解决，即撤军、废约、断交，不能有别的方式。

4月16日 在会见以池田大作为团长的日本创价学会第三次访华团时指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进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含义有两点。一是中国和日本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都不搞霸权主义。我们中国愿意用这点来限制我们自己，中国承担了义务，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日本承担在亚太地区不谋求霸权的责任，这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近百年的历史总结出来的经验。由于长期的历史渊源，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形象是受了影响的。写上这一条，对日本改善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二是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国家集团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的努力。现在确实有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写上这一条不是干涉谁的内政，而是干涉它们的行动，要侵略、奴役、控制、欺负人家，这是应该干涉的。所以，这两点，应该不成为我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障碍。问题恐怕是究竟中日友好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中日两国之间只是贸易和人员来往还不够，还要有政治基础，反霸条款是政治基础，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个问题。

4月30日 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委员、农业和土改部部长塔耶比·拉比。在谈到人口问题时指出：人多是个麻烦事，无限制的增长不得了。我国现在差不多接近八亿人口。解放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每年的人口增长率是百分之二。现在提倡节制生育，有些地方见效了。我们力求在一九八〇年前能把人口增长率控制到百分之一一点五，一九八五年能控制到百分之一以下。做到这一点，要做大量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

5月12日—17日 访问法国。分别同德斯坦总统、希拉克总理就重大国际问题和发展两国关系问题举行会谈。在同希拉克总理会谈时说：随着中法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应当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有些问题现在还不可能一下解决，如贸易平衡问题。就我们经济建设的需要来说，我们希望从一些发达国家购买更多的技术和产品，但受到支付能力和条件的限制。当然，随着我们经济建设的发展，这个情况将逐步得到改善，所以我们说这是暂时现象。从长远来说，我们在这方面有着广阔的前景。

5月21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钢铁工业座谈会文件。他在会上说：对钢铁生产，我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解决的条件也成熟了。各个行业都要

支持。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敢不敢接受中央的支持，敢不敢按中央这次批示的要求去办。不管是哪一级的领导，不能总是怕这怕那。现在，干部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字当头，不敢摸老虎屁股。我们一定支持你们，也允许你们犯错误。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要敢字当头。毛主席讲矫枉必须过正，解决老大难问题不过正就不能矫枉。更重要的是，要严格，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调，该批的批，该斗的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像鞍钢这样的大企业，有管理问题，也有个体制问题。大的钢铁厂整个生产过程从上到下是一环扣一环的，要有一个指挥生产的好办法。公司必须单独有一个班子，不是管油、盐、酱、醋、柴，而是指挥生产的，有一个单独的系统。领导鞍钢这样大的企业，那么复杂，没有懂行的，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机构，不打败仗才是怪事哩！我们反对“唯生产力论”，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如果不讲这些，还能谈得上社会主义总路线吗？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和生产都搞得才好才行。

5月29日 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把钢铁工业搞上去，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第一，必须建

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因此我们首先强调要把领导班子解决好。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要敢字当头。还要发动群众起来共同反对。今年三月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不要怕。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首次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这个讲话的大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6月2日 在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时说：中美两国之间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我们的立场很清楚，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台湾问题只能采取日本方式解决，具体地说就是美国从台湾撤军，同台湾废约、断交。其他方式，我们不能考虑。如果美国政府考虑还不成熟，我们也可以等一等。总之，“两个中国”、“一个半中国”、“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立场，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变相形式的这种立场，我们也不能接受。我们也知道，有的人有这么一种设想，就是把台湾在美国的大使馆变成一个联络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形式，这个我们不能考虑。他说：总的说来，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国家，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把中国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这些方面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体系，使各方面都有比较好的发展。第二步是在这个世纪的末期达到现代化水平。所谓现代化水平，就是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当然不是达到同等的水平，在这个时期内还办不到，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情况，首先是人口比较多。但还有二十五年的时间，我们有信心达到比较接近通常说的西方的水平。要做到这一步，我们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为此，我们当然要有国内的条件，我们也希望有比较好的国际条件。

6月10日 在上海同马天水谈话。指出：中国这

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

7月4日 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讲话。再次指出：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毛泽东同志去年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团结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还说：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讲军队要整顿，整个党也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作风方面。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省委坚强了，敢于领导，就能帮助地委、县委。这样，我们党就能够实现自己的领导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要三不要”〔1〕，这是党的原

〔1〕“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毛泽东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在南方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中针对林彪等人的阴谋活动而提出的。

则，也是党的作风。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

7月13日 就《论十大关系》整理稿^{〔1〕}致信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当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后来，《论十大关系》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7月14日 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军队整顿的任务，着重讲了五个问题。一、军队的状况。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肿、散、骄、奢、惰。当然，全军总的面貌不是这

〔1〕《论十大关系》整理稿，是在邓小平主持下，由胡乔木等根据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记录和一九五六年五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记录稿综合整理的。

样。但是从部分单位来说，从部分同志来说，是存在这五个字的。尽管是部分的，但是不可忽略。二、军队要整顿。整顿就是整上面讲的那五个字，要联系起来解决。在整顿中，还要加强干部学习，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三、军委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两件事：第一件“军队要整顿”；第二件“要准备打仗”。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同志讲的，这是我们军队工作的纲。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按次序来抓。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四、整编中的干部问题。一是在军队内部的处理问题，一是在地方的安置问题。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五、高级干部的责任。现在军队一些不好的现象能不能克服，几十年的优良传统能不能继承和发扬，主要靠老同志传帮带。只要大家带头努力，做到毛泽东同志说的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军队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可以贯彻好的。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军队整顿的任务》。

7月16日 会见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指出：要坚持民族独立的旗帜，坚持团结的旗帜，坚持进步的旗帜。谁坚持这三条，人民最终就选择谁。人心的向背决

定谁最后胜利。一时的胜利决定不了命运。起决定作用的是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政策。

8月3日 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第一，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领导班子问题一定要抓紧解决，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以把队伍带起来。第二，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特别是军工产品。没有必要的规章制度，质量难于保证，这方面要很好地整顿。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问题。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第三，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这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讲怪话。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

8月18日 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就发展工业的有关问题发表七点意见。一、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

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这是个加强工农联盟的问题。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二、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可以考虑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这是一个大政策。总之，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三、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这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的科技人员数量应当越来越多，在全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应当越来越大。四、整顿企业管理秩序。五、抓好产品质量。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提高产品质量是最大的节约。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必须在产品质量上狠下功夫。六、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关键是建立责任制。执行规章制度要严一点。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工资政策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要研究。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

8月23日 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在谈到我国长

远经济规划时指出：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宣布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我国经济发展的两步规划，我们正在做。总的来说，就是在这个世纪末，我们要达到比较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只是比较接近，要完全同美国、西欧、日本水平一样，恐怕办不到。我们立足于自力更生，自力更生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意味着是一种保守主义。我们要学习、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前景会更广阔一些。在谈到我国的少数民族问题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们完全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而且在具体政策上更多地照顾少数民族利益。在谈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问题时说：对于人民生活水平，我们采取逐步提高的办法。人民也不要求收入增长过快，因为他们知道首先要积累资金，搞建设，发展工农业。从长远来说，这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

9月1日 对话剧《万水千山》剧本提出意见。指出：主要是二方面军写得不够；要把长征中的路线斗争写明确；要写陕北是落脚点和出发点；三个方面军会师的地点较难处理，对会师的政治意义突出不够，要把毛主席总结长征时说的“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的意义表现出来；毛主席军事思想最光辉的一页，就是长征中的四渡

赤水。全剧的中心是要突出毛主席的思想。讲清楚长征后红军缩小了，但更强了；讲清楚长征的伟大意义；讲清楚树立了我党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地位，迎接革命新高潮。这样才能反映出在艰苦奋斗中的革命乐观主义是从哪里来的。

9月15日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指出：二十五年来，在农业方面，我们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俄状态做到了粮食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在工业方面，我们也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但是，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尽管有了这个基础，但我们还很穷、很落后，不管是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说形势好，有希望，大有希望，但是，头脑要清醒，要鼓干劲，不仅路线要正确，而且要政策正确，方法正确。周总理在四届人大讲了毛主席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就是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从明年起，二十五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我们相信大家能够办到，但是不要疏忽大意，不要以为轻而易举。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不好，很可能拉了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像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那

样全面，但就实现二十五年的目标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会议，或相当于那次会议。我们不能吹牛。类似大寨型的县、社、队，各地都有，但是很不平衡，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即使是个别的情况，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社员收入有的很少，有的还倒欠账。这种状况，我们能满意吗？总之，形势要求我们走快一些。他还指出：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9月20日 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我们的方针还是自力更生，但不排除吸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成果。我们现在的国际贸易额很小，但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贸易额肯定会扩大。在回答希思提出的中国是否仍然不向外国贷款问题时说，还是这样，但可以采取延期付款的方式，我们可以接受这种方式。

9月25日 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北京军区和空军的领导班子配备问题时说：我看现在党内存在一种倾向，看风向，顺杆爬。这是从井冈山以来我们军队没有的。现在第一步需要一些老同志出来工作，进行

整顿，把作风搞正。第二步是选一批四十岁左右的人接班。搞接班人，一般要经过各级锻炼，取得各级的领导经验，但不排除把个别的有特殊贡献的一下子提到高级领导岗位。要一步一步地发现品质好、党性好、正派的人，提拔干部要上台阶，快些可以。

9月26日 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汇报《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时插话说：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现在科研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科研工作能不能搞起来，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不把领导班子搞好，谁来执行政策？领导班子，特别要注意提拔有发展前途的人。对于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留在领导班子里？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可以当所长？要让党性好的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

平拖住了。提高自动化水平，减少体力劳动，世界上发达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是走这个道路。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主席讲消极因素还要转化为积极因素嘛！教育战线也要调动人的积极性。这些插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

9月27日、10月4日 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插话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方面的整顿就不难。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要在整党的基础上挑选干部。挑选领导干部，不管老中青，都要看他是不是肯干，是不是能带头吃大苦耐大劳。这是第一条。当然还要有头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

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这些插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各方面都要整顿》。

10月7日 在会见英国保守党上院领袖卡林顿时说：中国有中国的问题，中国自己有自己的条件，因为我们人口多。即使我们的生产能力和总产值达到了美国的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跟你们西方的水平还差一个很大的距离。说赶上西方，就是比较接近，至少还要五十年。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清醒的估计。

10月8日 在会见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时指出：不结盟运动的基础就是第三世界。^{〔1〕}第三世界主要指亚、非、拉国家，还有其他地区的发展

〔1〕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第一世界，指美国和苏联两个拥有最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

中国家，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第三世界是多样的，不结盟国家也是多样的，不同的是，第三世界开不成会，不结盟国家有一个会。我们一直支持不结盟运动，没有任何损害不结盟运动的言行，没有否定它的作用。我们不反对不结盟国家这个概念，这同我们讲的第三世界概念并不矛盾。

10月20日—22日 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举行了四次会谈，着重谈美国总统福特访华的准备工作和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双边关系问题。指出：毛主席多次强调，中美之间当然有双边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对待国际问题，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根据我们理解，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的，是为战略服务的。如果策略上是多种多样的，那可以是符合于战略的，也可以是偏离战略的。你们强调的是灵活态度。如果我们要对自己作一个评价，我们的态度从不僵硬。但我们认为，灵活是要符合于战略要求的灵活，如果灵活得过分，就会使人们想到究竟这个战略是什么。我们强调，苏联的战略重点在西方，在欧洲和连接欧洲的中东、地中海，甚至波斯湾。对苏联战略形势的判断，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质问题。

12月2日—4日 同美国总统福特举行了三次会

谈。在谈到两国关系问题时说，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我们两国虽然各自所处地位不同，但两国领导人相互经常接触、交换意见，总是有益处的。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过去毛主席讲过，我们提倡小吵架，大团结。我们两国之间有许多共同点。

1976年

1月2日 会见美国国会女议员访华团。在谈到福特总统访华问题时说：福特总统来的重要性在于访问的本身，谈问题也好，不谈问题也好，谈不拢也好，访问本身就是重要的。在会谈中，我们双方都认为在国际有关的问题上有许多共同点。当然，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存在着根本分歧，这在上海公报上也讲了。

1月8日 周恩来逝世。15日，首都举行周恩来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

2月25日 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即《毛主席重要指示》）。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指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此后，在全国掀起了对邓小平的批判。

4月5日 从三月底开始的首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

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活动，在四月四日（清明节）达到高潮。这个群众运动受到“四人帮”的极力压制。本日，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采取抗议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行动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且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9月9日 毛泽东逝世。

10月6日 “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7年

3月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等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4月10日 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严重阻碍了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进行拨乱反正。邓小平的上述观点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提出的。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5月12日 同中国科学院两位负责人谈话，针对科教战线的落后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强调要抓科学和教育。指出：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十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数中学教师水平不高。要

重新审订大中小学的教材。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要加强教师的配备。抓科研要注意选接班人。关键是人。方针正确，组织路线要跟上。加强党的领导，选好科研人员，选后勤人员，很重要。还要搞规划。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有什么错？只是讲得还不够，是根据当时勉强能接受的水平写的，真正要解决问题就不够了。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中国在清朝时搞闭关自守，“四人帮”也是搞闭关自守。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要抓重点，要抓重点学校、重点科研院所、重点人才、重点项目。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为什么要抓理论研究？就是为了这个。讲空话不行，要有具体措施，统一认识。实事求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一个时期，说科技人员是“臭老九”，连发明权都没有。科学研究是不是劳动？科研人员是不是劳动者？三大革命运动有科学实验嘛。科研人员搞点体力劳动是需要的，但他本身是脑力劳动者。自动化技术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

5月24日 同中央两位负责人谈话。指出：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

“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我来看我的两位同志说，我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他还着重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在谈到加强企业规章制度建设时指出：要从严要求。我们国家的卫星，有的上去了，有的上不去，就是因为对零件、对工艺的要求有的严格，有的不严格。在谈到在理论队伍中应提倡和实行民主作风问题时指出：这个问题很重要。毛主席讲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辩证法嘛，不“辩”怎么能“证”呢？经过“辩”才能“证”。民主作风是个党风问题、军风问题、民风问题、学风问题。总的说来是党风问

题，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延安作风、延安精神。延安作风、延安精神要恢复，要继承和发扬起来。关于党风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当时的条件很难有什么建树，列宁有发展，毛主席继承列宁，加以总结、创造，把党风大为发展。我们党很完整的作风，经过延安整风已经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要继承发扬的就是延安时期那一套。在谈到“四人帮”批判的所谓“三株大毒草”时说：“三株大毒草”中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我确实是在最近才看到的。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香花，不是毒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当时想争取通过，但没有能做到，有些问题现在要进一步写。《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看过第二稿，以后的稿子没有看过。这些文章也有缺点，没有缺点的香花我看是没有的。这个谈话的一些内容分为两篇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一篇题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篇题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7月21日 出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全会上发表讲话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

有别的选择。他又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还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次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7月29日 在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教育工作时指出：要进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编出新的教材，以后就拿新教材上课。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中小学教材。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应纳入国家规划。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逐步培养研究生。教育部也要抓一些中小学重点学校，在北京就可以抓四十所到五十所。不能降低教师

的待遇。要加强外语教学。要搞电化教学。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

8月1日 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从小学抓起，否则赶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现在要立即着手指定。两条腿走路，但要有重点，重点学校的重点就是直接从高中招生。编写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从最先进的东西教起，一开始就启发学生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这就有希望了。现在比较急迫的问题是教材问题，还有教师队伍问题。教材要精简，大学的教材也应精简。毛主席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的。“四人帮”另搞一套，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劳动人民都要知识化嘛！如果照“四人帮”的说法，到了共产主义，人们岂不都成了“臭老九”吗？总之，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他们世界观的改造。要提倡尊

师爱生，现在要特别提倡尊师。

8月3日 在英中了解协会主席、作家格林六月四日同新华社记者谈关于中国的对外宣传问题的谈话记录稿上批示：“我认为格林的意见都重要，无论宣传和文风等等方面，都值得注意。建议印发给作宣传、外事的同志看看。”11月3日，会见美籍华人教授王浩。在谈到文风问题时又说：格林提的意见很好，已印发所有搞宣传的人，主要是反对不真实、八股调。我就不愿意看那些八股调。

8月4日—8日 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8日，在会上讲话。他首先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接着，讲了六点意见。一、针对当时争议很大的关于如何看待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问题，指出：主导方面是红线，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特别是前十几年，我们自己培养的。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关于调动积极性的问题，指出：要特别注意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要强调尊重教师。对于终身为教育事业服务的人，应当

鼓励。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按劳分配这个问题，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三、关于体制、机构问题，指出：要统一规划。重建国家科委，这个意见我个人比较赞成。科研、教育部门的调整当中，第一位的是配备好的领导班子。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要保证科研时间，使科研工作者能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四、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的，指出：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和业余大学是一条腿。先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大专院校。要重视中小学教育。要树立好的风气，党风、军风、民风、学风，最重要的是党风。改变坏的风气，要从小学教育开始。要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要研究如何提高教师的水平，包括政治思想水平、业务工作能力以及改进作风等。教育制度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比如学制、放假制度、招生制度、跳级留级制度等都要认真研究，该恢复的恢复，能实行便实行。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五、关于后勤工作问题，指出：后勤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为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服务，为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

事科研、教育工作。他还说：有一批华裔学者要求回国，我们要创造条件，盖些房子，做好安置他们回国的准备工作。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六、关于学风问题，指出：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要把对待封锁的态度，作为检验一个人世界观改造得如何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

8月10日 在万毅要求恢复工作的申诉信上批示：“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排，他过去有贡献。”

8月13日 对作家老舍的夫人胡絮青请求尽快给老舍作出结论一事批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

8月12日—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18日，邓小平致闭幕词。他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

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党内和整个人民内部，认真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8月23日 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某一个时期总有某一个时期的纲，某一个部门总有某一个部门的纲。就当前来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总要有有一个时间限制。对于军队，“整顿”至少是三五年内的纲；“准备打仗”是打仗以前的纲。他重申在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原则：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一方面部队本身要提倡苦学苦练。军队要能打仗，靠提高政治觉悟，靠勤学苦练。

练。干部，包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在苦练中增长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部队训练还要努力学习现代战争知识和其他许多必要的政治文化科技知识。另一方面是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要承认我们军队的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特别是各级干部的指挥、管理能力弱。他对办军队院校提出三个要求。第一，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第二，认真学习现代化战争的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不但高级学校要学，连排干部也要学，都要懂得现代化战争。第三，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作风，就是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8月24日 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就中美建交谈判中的一些问题，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指出：我们历来都说，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国务卿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比我们签订上海公报后的探讨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我们必须澄清一个事实，是美国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要控制台湾，使中国人民不能实现自己祖国的统一。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

一个让步。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民间来往，我们可以同意。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你们说很关心台湾的安全。中国人自己总比你们美国更关心自己国家的事吧！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8月27日 在会见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时说：关于恢复“臭老九”名誉的问题，我们正在做。当然要做许多工作，要具体解决许多问题，只讲恢复名誉，不给工作条件不行。

9月6日 就成立国家科委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信中说：“我同不少同志交换过意见，看来恢复国家科委势在必行。”“原拟在国务院设科教组的方案，拟取消。教育部将来由中宣部主管（大学科研由科学院统一规划）。国防科研也由国家科委统一起来，特别是必须统一规划。”9月18日，中共中

央发出《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

同日 就高等学校招生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指出：“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随信附上刘西尧关于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汇报。9月30日，在《红旗》杂志根据邓小平对教育工作的几次谈话整理成的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送审稿上批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建议政治局讨论一次，进行修正，然后确定是否发表。”10月3日，在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等文件上批示：“此事较急”，“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10月2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并经国务院批准，从一九七七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这一年，全国共有五百七十万青年报名参加高考。

同日 在会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时指出：过去“四人帮”不提倡搞生产，认为搞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就是“不革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反对按劳分配原则。所谓按劳分配，就是多劳多得，少

劳少得，不劳不得。现在，我们要恢复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是实行低工资政策，要实行好多年。随着经济的发展，才能逐步提高工资。我们采取低工资政策还因为有个城乡关系问题，如果工资过高，农村生活水平不能很快提高，会吸引许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即使我们的工业更发达，国家收入更多，也要照顾城乡关系，不能相差太多，当然差距总还是会有有的。要按劳分配，要有差别，但差别不能太大。群众反对“四人帮”，主要是反对他们不让劳动，不让提高劳动生产率，不鼓励劳动有贡献的人，不让他们多收入一点，不让那些在艰苦劳动条件下劳动的人多收入一点。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对外贸易是随着我们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我们历来提倡自力更生，但并不是像“四人帮”解释的那样，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搞，连世界上先进的东西都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世界上先进的东西？这是人类共同的成果。

9月10日 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在谈到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时指出：对于福田首相过去的立场我们是了解的，既然他声明他要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就是两个字“签订”。

9月14日 在会见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时指出：“四人帮”说，宁要没有文化的社会主义，不要有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国际间的相互交流是很自然的，是需要的。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的指示被“四人帮”歪曲了，他们把引进世界上一些先进成果都谴责为“洋奴哲学”，这是最蠢的。一切先进成果都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也懂得这个起码的常识，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它都引进。你们日本就是这样。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资源，但决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原来存在的两个阵营都瓦解了，两个阵营中间存在的中间地带也发生了变化，根据这个新形势的发展，毛主席概括地提出了新的战略规定。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发达国家也是属于第三世界。

同日 审定《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在《通知》中加写了一段话：“小学、中学、大专学校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基础，而大专学校又是科学研究一个重要的方面军。”

9月19日 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教育战线的拨

乱反正问题。指出：一九七一年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工作会议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1〕；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要健全教育部的机构。工宣队问题要解决。军队支左的，无例外地都要撤下来。重

〔1〕“黑线专政”最先是林彪、江青一伙用来诬蔑建国后十七年文艺工作的用语。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作出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断言：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后来，林彪、江青一伙又把“黑线专政”论扩展到教育、出版、体育、卫生、公安工作和党的组织、宣传、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其他党政工作。这种颠倒是非的荒谬估计，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之一，给各条战线的工作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点大学教育部要管起来。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双重领导，以教育部为主。教育部要直接抓好几个学校，搞点示范。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招生的条件，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科学研究机构已经确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并决定恢复科研人员的职称，这是很大的决策，会引起震动，会影响到教育、工业等方面。教育部门要紧紧跟上。大专院校也应该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要加强学校的教师队伍，科研系统有的人可以调出来搞教育，支援教育。搞教育是很光荣的，要鼓励大家热心教育事业。要很好地研究科研和教育如何协调、人员如何经常交流的问题。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教育方面的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出人才、出成果。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邓小平这次谈话以后，教育部即以大批判组名义，发表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的文章，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进行批判。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

9月25日 会见联邦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

席韦尔纳。在回答中国加速现代化的重点是什么时指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要使用世界上的一切先进技术。搞现代化，理所当然不是拿落后的技术作出发点，而是用世界的先进成果作出发点。当然，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主要靠自己积累资金，我们不愿意背很多的债。稍长的延期付款，这样的形式我们愿意采取。凡是我们需要的先进的东西，条件适合的，我们都愿意吸收，包括军事技术上某些先进的东西。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着手在工业方面搞自动化、半自动化，技术革新，在农业方面搞机械化；另一方面，根本上还是从教育和科学研究着手。

9月29日 同邓颖超一起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指出：六十年代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水平差距不大，一九六四年我国爆炸了原子弹，这是科研水平集中的表现。世界科学技术在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各个科学领域一日千里地发展，一年等于好几年，甚至可以说一天等于几年。一个新东西发明出来，可以带动其他方面走得很远。一个新粒子的发现，一种新的理论的出现，会发生深远的影响。一九七五年我曾讲过，同日本相比我国落后了五十年。那时我老想抓科研，结果不仅没有抓上去，反而我自己被抓下去了。其他方面恢复起来比较容易，教育和科研方面就不是这样，这里存在一个要后继有人的问题。抓科研

不抓教育不行，要从小学教育抓起。我们损失了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的时间，但我们相信中国人是聪明的，再加上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末，我们就是有望的。如果不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创造条件，努力奋斗，恐怕就没有希望。我们还要吸收世界先进的工业管理方法，要搞科研，搞自动化。我们的设备能力不小，但生产落后，这是一个组织管理问题。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我们的潜力很大，但有个组织管理问题，归根到底是科学研究要走在前面。

同日 会见来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华侨、华裔、港澳台同胞旅行团正副团长。指出：侨务工作要提到日程上来，要恢复过去的侨务机构。我们的政策还是那些，在国外生活的，鼓励他们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但不能强迫。加入外国国籍也可以为祖籍国服务，还有个更好的条件，可以加深两国关系。不愿意的也不勉强。祖国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侨务政策绝大部分要恢复起来，某些要改正，不完善的要完善起来，不妥当的要改进。前不久恢复了中央统战部，过去“四人帮”破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没有了，现在把“庙”建立起来，有人在里面管事，要把爱国人士、民主人士、宗教人士等

等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我们要把因“四人帮”破坏而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在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要花更大的精力。这个领域我们损失很大，这是教育一代人的事，培养一代人至少十五至二十年。现在教学质量、教师质量都下降了。这不是他们自己的原因，世界发展到了什么样子，他们不知道，也不敢知道。我们要承认落后，不要怕丑。最近我跟外国人谈话都是讲这些话，有些外国朋友觉得惊奇，这有什么惊奇？承认落后就有希望，道理很简单，起码有个好的愿望，就是要干，想出好方针、政策和办法来干。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不管那些“洋奴哲学”的帽子，我们实行“拿来主义”。

10月2日 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及夫人时说：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四人帮”胡说什么“地、富、反、坏、侨”，把华侨同地、富、反、坏并列起来，这种错误政策一定要纠正过来。要做大量工作，进行政策教育，全国执行。中央已下了这个决心。对愿意出去的人，不要搞得那么紧，继承遗产、娶亲等等，都可以出去。回来的也欢迎。

10月15日 在会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教授和夫人陈恕时说：林彪和“四人帮”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说只有毛泽东思想最好，马列主义不在话下。这表面上好像把毛泽东思想抬得很高，实际是否定毛泽东思想。正确的解释是，毛泽东思想是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反对他们搞“大树特树”，真理是在斗争实践中为大家所接受并运用的。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最根本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两者相互影响，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四人帮”搞的那套上层建筑妨碍生产力的发展，粉碎“四人帮”以后就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上层建筑问题很重要。“四人帮”否认生产力的重要，认为只要上层建筑的问题、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谁提发展生产力，就被说成是“唯生产力论”。这是我们同“四人帮”的重大争论之一。如果不是生产力发展到物质极大丰富，怎么能实现按需分配，怎么能进入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没有“唯生产力论”这个词，这个词不科学。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我们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

式，农村包围城市。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样。

10月20日 在同教育部和北京大学的负责人谈话时指出：重点大学要实行双重领导，以教育部领导为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重点的重点。要利用北大、清华的经验。北大是综合大学，理科要抓，文科也不要丢掉。自然科学固然重要，要搞好，社会科学也很重要。文科，光有人民大学还不够，北大文科是有基础的，搞好文科是很必要的。现在许多科学家提出要“回炉”的问题，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入学的大学毕业生，实际上只学了两年，有些人想“回炉”，要办“回炉”班（进修班）。凡是要求“回炉”的，说明他们觉得需要，是有进取心的表现。重要的是打好基础，不打好基础不行，搞专业也不行。要引进—些研究手段，更新研究手段。

10月23日 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代表团。在回答关于中国经济计划问题时说：行政管理属于上层建筑问题，总是要不断改进的。如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建国初期接受了苏联的经验，苏联的经验也有好的，很多并不好，批判是对的。但林彪、“四人帮”把

合理的规章制度也破坏了。现在合理的要恢复起来，不好的要改进。

10月26日 会见法国《地方大报集团》访华团。在谈到对外经济往来时说：由于我们还处于发展阶段，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经济贸易方面还要发展，我们不仅同法国而且同国际上的经济往来也会逐步发展。我们想把世界上一切先进成果统统拿到手，但我们历来考虑到自己的支付能力，我们接受延期付款的方式。人们都说中国是个大国，其实只有两点大，一是人口多，二是地方大。就发展水平来说，是个小国，顶多也是个中小国家，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发动战争，中国是没有资格的，中国在若干年后强大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只要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如果那时我们发动战争，就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论大小，不管它发达到什么程度，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所以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对外政策和路线是永远不称霸。

11月3日 会见美籍华人教授王浩，肯定他提出的《关于促进教育科技发展的几点意见》。指出：科学领域，总是后来居上，否则人类不能进步。过去我们有些方法有缺陷，不容易发现有特殊才能的人。有的人才甚至是外国发现了我们才注意到，有的是国内同行知道

了，其他方面还不知道，没有给他创造条件。要善于发现和选拔人才，发现有前途的，要能够有比较好的方法帮助他，早出成果。不仅是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要大力提倡学术讨论和交流。各种学报和刊物，都是交流的场所，还要召开学术讨论会。要允许犯错误，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要允许犯错误，允许说话。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他们的思想方法实际上是形而上学，认为一切都是苏联的最好，其实很多并不是这样。结果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思想僵化。这妨碍了他们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落后了。“四人帮”也是形而上学，一进口什么东西，就说是“洋奴哲学”，毛主席批评他们是形而上学猖獗。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所以现在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实行“拿来主义”。日本科学发展得快，就是实行“拿来主义”。“拿来主义”不坏，真正的科学态度应该如此。

11月18日—23日、25日 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问题的汇报。指出：引进外国的东西，还是“一用二批三改四创”，首先是学会用。日本就是这样，引进一个技术，就集中一批人来攻，不仅吸收，而且改进。对质量问题还要提高认识，强调质量可以提高工艺水平和技术水平，促进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粗制滥造，障碍我们前进，障碍技术进步。企业管理得好不好，产品质量应该是主要标准。从长远来讲，要注意农村问题，

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要逐步缩小剪刀差。将来要考虑提高粮价。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积极性，这是很大的政策。这个计划还有一点要注意，工业有这样的速度，农业速度不高，很可能出现农业不适应的情况，但是农业达到百分之四的速度也不简单。农业要有一系列政策，要有具体措施。

12月6日 在原五机部副部长吴皓的妻子要求落实政策的来信上指示：“请中组部对这类事要关心，实事求是地对每件事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不只是对本人，对家属亲友都是关系很大的，拖不是办法。”

12月20日 在一封申请去美国投亲的来信上批示：“这类事今后会多起来，特别是华侨，要求家属出国，我倾向放宽政策，利多弊少。”

12月25日 在王其梅的妻子王先梅的申诉信上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历史问题〔1〕不应影响其子女家属。建议组织部拿这件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

〔1〕王其梅，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他的所谓历史问题，指“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诬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见本书第71页注〔1〕。

12月26日 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指出：林彪和“四人帮”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不讲生产，谁讲发展生产就说谁是修正主义，那马克思写《资本论》是干什么的？马克思讲，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要有物质基础。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我们的潜力很大，加上认真学习外国经验，在学习外国东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大家劲头都来了，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少。

12月28日 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讲话。在讲到整顿领导班子问题时说：对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定要彻底查清。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干部。不仅要看他过去的历史，也要看他同林彪、“四人帮”斗争中的表现。今后配备领导班子，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在谈到形势问题时说：国际形势是好的。战争可能延缓爆发，我们要争取有更多的时间，把装备搞上

去，把部队的教育训练搞好。他还提出：要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使干部既学到现代战争知识，又学到现代科学知识和生产知识，还要学会做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成为军队和地方都合用的干部。对战士的教育训练要做到一兵多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技术，还要学点数理化，学点工农业知识，学点外语。要使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经过训练，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在谈到纪律问题时指出：军队非讲纪律不可。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在谈到团结问题时指出：我们要反对那些搞帮派、搞宗派的行为，要反对任人唯亲。我们讲团结，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978年

1月7日 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

1月26日—31日 访问缅甸。30日在会见仰光华侨代表时说：建国以来国家对海外侨胞是非常关心的。当然，十一二年来也受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侨务机构没有了，过去有个华侨事务委员会，后来没有了。对海外侨胞没有一个机构管，你们理所当然地会遇到一些困难，有些问题本应解决的而没有解决。现在“四人帮”被粉碎了，过去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方针政策，不管是对国内的或对国外的，包括侨务政策，应该恢复的正在恢复起来。现在又重新建立一个侨务工作机构，叫华侨事务领导小组，由你们都很熟悉的廖承志同志负责。华侨事务的重要政策是鼓励侨胞自愿加入住在国国籍。考虑到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华侨比较多，

住在国比较注意这个问题，鼓励华侨自愿加入住在国国籍，这对我们国家与住在国的关系有好处。但也总有人不愿意加入住在国国籍，愿意保留中国国籍，我们不能强迫。我们政策的另一面，就是保护侨胞的正当权利，鼓励华侨与住在国人民搞好关系，这是我国发展与住在国友好关系的重要一环。

1月31日—2月3日 出访尼泊尔前，途经成都作短暂停留。2月1日，在听取中共四川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真正解决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以后，是不是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轻工业、服务行业，都可以用一些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行业可以用很多人，我们用的人很少。又比如发展旅游事业，可以用很多人。对多余人员的出路要多想些办法，只能靠自己多开辟门路。全国都要研究有什么门路容纳这些劳动力的问题。工厂里要培养科技人员。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科技人员和工人的比例开始为一比八，后来科学技术发展了，倒过来为八比一。我曾经讲过，可能有两个问题拖我们的后腿。一是农业，搞粮食

可不容易；二是工业管理水平，我们不会管理。关于领导班子问题，总的政策是，过去“四人帮”要打倒的一批老家伙，现在还得请他们回来。老家伙的任务，首先是找接班人，接班人不能是坐火箭上来的干部。找接班人，要有自觉性。

2月10日 在教育部党组《关于请调教材编辑出版干部的报告》上批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

3月2日 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小组会上讲话。指出：要恢复和发扬我们行之有效的政策，恢复和发扬毛主席创立的一套好作风。目标就是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优越吗？不优越叫什么社会主义。“四人帮”不讲生产。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讲生产行吗？共产主义是什么？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就要物质极大丰富。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然，就始终处于挨打的地位。光喊口号没有用。他还指出：现在有两个问题要注意，一个是农业。农业不发展，不能实现粮食年产量八亿斤的目标不行，不然还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再一个拖后腿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不会管理。技术落后，管理技术水平低，在工业上是个很突出的问题。你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就要比人家管

理得更好。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很重要。管理好不好大不一样。这确实要有专家，要一批一批地把外行变成内行，把半内行变成全内行。这不能弄虚作假。抓科学技术，教育很重要。这不仅是科学院的事，而且是全民的事，从娃娃起就要培养。在谈到风气问题时他说：现在不是都在讲作风吗？所谓作风，第一就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态度。对待事情没有实事求是的作风行吗？没有埋头苦干的精神行吗？没有艰苦朴素行吗？现在要发扬这些作风，这是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很重要的问题。军队好是作风好。比如过去打仗，宁可少报战功也不多报。谎报战功要杀头。你看这简单吗？这是非常重要的。要老老实实，不能弄虚作假，自己欺骗自己。

3月8日 在同教育部负责人谈教育部起草的文件草稿时说：揭批“四人帮”，语言要简练一些，有些内容报上已经讲了很多，不要再讲了。向前看的東西应该多一些，包括方针、政策、办法。要重点突出，有些什么问题，要真正抓到要害，抓到点子上。同科技相比，教育的政策问题更多。民主这一点要反映出来。基本思想是要彻底解放思想，首先从教育部开始。

3月15日 为军事科学院题词：“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

3月18日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他说：“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光明灿烂的前景。他强调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在这篇讲话中，他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他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在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他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第二个问题，关于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他说：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又红又专要有正确的理解。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红的表现。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必须打破常规

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第三个问题，在科学技术部门的各个研究所中，怎样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他说：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关键在于我们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都应该有相应的转变。在科技部门中要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同时是通过科学研究计划来领导，还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科学技术的业务领导工作，应当放手让所长、副所长分工去做。对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是我们少犯错误、做好工作所必需的，是我们科研机构实行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3月28日 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在谈到按劳分配问题时说：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

也不能是按资格。现在小学教员的工资太低，要提高。有些教得很好的小学教员，工资可以评为特级。要实行考核制度。考核必须是严格的、全面的，而且是经常的。各行各业都要这样做。要有奖有罚，奖罚分明。奖金制度、稿费制度也要恢复。总的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在谈到如何使城市容纳更多的劳动力问题时，他指出：这里有一个城市结构的问题，有一个在城市里开辟新的领域的问题。要研究一下，使我们的城市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现在搞上山下乡，这不是长期的办法。他还指出：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管理问题。实际上我们不懂得管理。什么事情要发展，首先想到的就是增加人。每个部门都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搞管理，应当有定额，有责任制，有考核，可是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讲究，实际上没人管。在谈到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时，他说：赞成增加新的研究所。什么事情总得有个庙，有了庙，立了菩萨，就可以动起来了。有些翻译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年龄都很大了，不赶快给他们立个庙，过些年就没法抓了。党史也是一样，现在还有些老人，再过几年，老人没有了，很多事情就没办法再了解。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3月30日 在会见泰国总理江萨时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重新整顿了侨务政策。这个政策被“四

人帮”破坏了，造成了混乱，他们把所有华侨的海外关系都视为敌对关系，这反过来影响到中国境内的归侨，华侨在国内的亲属也受到压制。所以要整顿恢复我们的一贯政策。我们侨务政策的要点，第一条，就是鼓励华侨自愿选择住在国的国籍。华侨多的国家对华侨很有戒心，我们了解这一点，所以把鼓励华侨选择当地国籍作为重要的侨务政策。加入了住在国国籍的人，就是住在国的人，应该对所在国尽到他们自己的责任。第二条，我们也不能强迫愿意保留中国国籍的人加入住在国国籍。我们要求保留中国国籍的人要为住在国的发展和两国友谊做出贡献，遵守住在国的法律。理所当然的，中国要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这也是国际惯例。第三条，我们历来不赞成双重国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贯政策。

4月13日 在同教育部负责人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文件时说：我们发展的领域要很好研究一下。我国土地少，人口多，从总的发展来看，工业需要的劳动力不会超过现在。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减少而不是增加劳动力。开辟什么领域，哪些方面会增加，要研究。现在商业点少了。许多服务行业尽管自动化了，人也不够。科学研究人员，包括企业中的，至少是成千上万的增加。大学生人数要大量增加。大学生的比例也有个结构问题，要研究。我们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开辟，比如旅游

事业，就业的路宽得很。要研究一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肯定有些我们是不要的，但是为工农业服务的，有些领域我们现在是没有的。研究社会结构，开辟什么新的领域，与教育很有关系。培养人，中心是把基础打好，然后干哪一行都行。建筑业肯定要大发展。钢铁、建筑是我们的支柱。我们现在的结构是工农业技术落后的结构，现代化以后，这个结构肯定就不行了，构成比例肯定要变化。生产率提高了，就逼着我们改变结构的比例，实际上是农业工业化了。

4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文件。发言说：人民大学要培养经济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人才。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实际上是清理过去教育的问题，把一些带政策性、方针性的问题肯定下来，看看教育有些什么特殊问题需要研究。教育经费的使用，要很好地讨论一下方针和原则，更多注意用到重点和提高方面。为了早出人才，师资、钱、材料都要用到重点和提高上。宁肯有一部分放慢一点，宁肯牺牲某一方面，也要用到重点上、提高上，不是平均用到普及上。大学要多花一点钱，解决青黄不接问题，解决提高问题。中学现在数量不少，质量不高。要装备好北大、清华。我们要有规划，要适合现代化。现在师资缺乏，非走电化教学这条路不可。

4月22日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针对“四人帮”反对学生以学习科学文化为主，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的谬论，指出：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人才的标准是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应该越加自觉、刻苦。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要认真研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他还指出：“四人帮”不仅造成教育质量惊人下降，而且严重损害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培养训练专门家和劳动后备军，也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周密计划。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讲话最后提出，要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一个学校能不能

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要研究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4月30日 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指出：资产阶级权利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从理论上讲清楚，澄清“四人帮”制造的混乱。工资级别一定要有，而且定级一定要以技术为主。工人的工资不一定是八级，还可以考虑多几级。总之，八级工资制需要做些改革。还有行政人员的工资级别，也有一个改革问题。奖金一定要搞，问题是怎么搞得更合理。要把农业发展起来，需要很多方面配合起来搞。现在我们一些同志的脑子里，总以为只要有了农业机械化就行了。其实，搞现代化农业，需要各方面的配合，交通运输要配合上去，化学工业要配合上去，电力、水利事业要配合上去，等等。畜牧业要发展。农产品增加了，就跟着发展各种农产品的现代化加工工业。从科学方面来说，要发展农业，需要有生物学的发展，气象学的发展，土壤学的发展，遗传学的发展。总之，农业要工业化才行。我们现在有些搞农业的人，实际上还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

农业，不知道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搞现代化农业。在谈到开辟新的行业问题时说：旅游业可以大大发展，算是一个新行业。最大的行业，还是建筑业。为人民日常生活服务的行业都应当发展。饮食业发展了，就可以减少家庭劳动。足球也可以发展，也是一个行业嘛。可以组织一些国际比赛，既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又增加了收入。

5月7日 在会见马达加斯加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时说：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再加一条，那就是我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的口号是少说空话，多做工作。在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实现四化，永不称霸》。

5月13日 同解放军总参谋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军队的状况，还是一九七五年讲的，就是五个字：肿、散、骄、奢、惰。总参的“肿”是很严重的。我可以肯定，这么庞大的指挥机构，指挥战争是要打败仗的。要解决一个“肿”。机构臃肿、庞大、重复，不好。人员减少了，指挥才灵便。目标是指挥系统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因为它与军队现代化密切相关，如不

解决，装备技术现代化是实现不了的。

5月21日 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对布热津斯基说的卡特总统表示美国已经下了决心准备同中国积极讨论美中关系问题说：很高兴听到卡特总统的这个口信。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是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双方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过去我们也说过，对自己国家统一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不关心，不急于解决呢？我们很希望能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然我们历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国际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合作的余地。有许多问题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不少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你们要表示你们的希望，这可以；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5月28日 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总统特使扎伊贝克时说：在工业方面，我们二十八年还是搞了些基础。但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就现有设备能力来说，由于技

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低，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过去“四人帮”干扰，就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连世界是个什么样子都不清楚。如果说六十年代前半期我们同世界技术上的发展有些差距，但不很大，那末近十多年则拉得很大。现在提出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当然有很多重要的条件作为根据，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吸引过来，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吸收外国技术，吸引了先进技术，自己还要有所创造。这是件很重要的工作。现在我们提出这个目标是有根据的，不是讲空话。有信心，但也不容易，有好多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要解决。我们现在还要学习，要善于学习，在科学事业上来不得一点虚假。

5月30日 同胡乔木等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提出要着重讲关于真理标准问题。^{〔1〕}他说：我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讲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着重讲第一个问题。实事求是马列主义思想、哲学、理论、方法的概括。它同各种机

〔1〕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六十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十一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的大讨论。

会主义思想都是完全对立的，包括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左”的右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要把这个意思写进去。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也是讲得最多的道理，列宁也讲得很多。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首先就是实事求是。归根到底，这是涉及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不但军队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外贸、管理、经济政策，都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很多事情都不敢搞。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它们有很多困难，资金没有出路，可是他们借钱给我们，我们又不干，非常蠢。现在东方有四个小老虎：一个是南朝鲜，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新加坡。它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对外贸易增长很快。它们都能把经济发展得那么快，我们难道就不能吗？我们的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会是空的。

6月2日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从部队存在的问题和实际情况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对军队来说，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这是个最大的不同。我们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

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我们讲实事求是，讲新的发展时期，讲新的历史条件，就要讲破和立。破，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是要深入揭批“四人帮”，要联系揭批林彪，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揭批“四人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立，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揭批林彪、“四人帮”必须联系实际，搞好各方面的整顿。当前调整好整顿好领导班子是个关键。要放手发动群众，揭露矛盾，搞清是非，整掉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还必须把派性整掉、搞臭。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治军要严，首先对领导班子要严，对高级干部要严。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我们的干部，要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榜样，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6月5日 在会见日本广播协会代表团时说：我们的电化教育才开始，我们这方面不发达。在人民中拥有的电视机数量比较少，要加强这方面的发展。我们现在要解决教育问题，电化教育是一个重要手段。“四人帮”的干扰在工农业上有破坏、损失，但最大的损失在科学教育方面，这方面耽误了十一二年的时间。我们要实现

四个现代化，不抓紧科学教育不行，科学教育不采用现代化的方法也不行，电化教育这个手段是重要的措施之一。当然，这项工作根据我们现有条件开始做了，我们要采取措施加快步伐。

6月7日 会见泰国记者访华团。在回答中国向西方开放是否担心会受到西方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影响时说：不担心这个问题。毛主席过去说过，他开始读孔夫子的书，以后学的是资本主义，但他终究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归根到底，要看我们的事情搞得好不好。如果人民都知道我们自己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那末，什么影响也不怕。至于有些人，就是没有外国人来，他也会受影响的。人们的眼界开阔些好，这样鉴别是非的能力只能增强，不会减弱。

6月10日 在同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会谈时说：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我们相信，经过一段努力，我们自己发展后，可以更多地尽到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支持不结盟运动。我们认为不结盟运动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没有矛盾。

6月23日 在视察清华大学时，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话指出：学校要办成学校，学校要按学校的要求办。

我赞成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请教育部研究一下,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留学生管理制度也要改变一下,不要看得死死的。留学生可以住在学校,也可以住在外国朋友家里。暑假还可以让他们回来一下,了解国内情况。教育部要有一个专管留学生的班子,可以到留学生较多的国家去看看,经常了解留学生的状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6月25日 在一封有关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1〕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1〕 一九三六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出狱。对此,中共中央早已作过结论,没有当作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康生、江青等人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这是一起重大的错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为这一错案作了彻底平反。

7月11日 在听取全国民兵工作会议筹备工作情况汇报时讲话。指出：民兵应该做好本职工作，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要太多。民兵都是青壮年，应该成为生产的骨干、主力军。要搞好战备，就要成为生产的骨干力量，这是统一的。我们是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就是人民战争。民兵就是要提到战略地位。

7月17日 在会见英国詹金森爵士时说：我们的战略是毛泽东主席制定的。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就是人民战争。过去是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三结合，现在是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搞人民战争并不是不要军队现代化。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要建立强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提出军队的现代化。现在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就包括国防现代化，这是毛主席的思想。西方报刊说我们不要军队现代化，那是不了解情况。条件不同，人民战争的表现形式也不同。装备的改进，使人民战争更有力量。

7月21日 同中宣部负责人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活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7月22日 同胡耀邦谈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

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8月6日 会见奥地利中国研究会代表团。在谈到中国人口问题时说：这个事情也有一个习惯的势力，特别是农村。中国历史上就以多子多孙为幸福。我们建国以后就提出了人口问题。现在，我们国务院、各级地方政府有专门的机构管这个事情，包括宣传。我们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节制生育的药品、手术都是免费提供。这个事情我们搞了很多年了，所以现在有一点成绩，但还要努力，还要做很多工作，特别是说服工作，这个事情搞命令主义是不行的。如果能够做到不再增长，这就了不起了。但是，下这样决心的人不算很多，这同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有关。人口增长过快并不反映经济发达，而是反映经济落后，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是发展中的国家。在回答关于中国吸收外国技术、设备和资金的问题时说：吸收外国的技术，一般采用过去很多国家采取的方式，实行国际交往，吸收外国好的东西来发展自己。用银行贷款的方式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购买我们需要的设备和技术。用其他方式也可以。

同日 在会见利比亚总人民代表大会总秘书处成员贾卢德时说：资本主义要消灭，这是一个很长期的斗争。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8月10日 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在谈到即将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说：条约的中心内容实际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反霸是不针对第三国的，但有一条，谁搞霸权就反对谁。我们自己如果搞霸权，那就自己反对自己。我们坚持反霸有四条理由。一、日美关系是重要的，美国不会反对。二、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约束。中国现在没有资格称霸，但起码东南亚有些人担心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后是否会称霸。我们再三说，中国永远不称霸，如果称霸，那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变了质。条约里写上反霸条款，体现了中国长久的国家政策。三、对日本也是一个约束。这对改变日本的形象有好处。四、对日本解决北方四岛问题有好处。中日之间并不是没有任何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地讨论，慢慢地商量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这一代找不到办法，下一代、再下一代会找到办法的。12日，邓小平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

8月19日 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在谈到理论问题时说：理论问题涉及到文化部没有？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我看了，先念

同志也看了，提过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要让人说话。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我说过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人反对。问题是从“两个凡是”来的，那时我还没有出来工作。我讲过那不是毛泽东思想，如果毛主席在世也一定反对这种提法。我们做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要认真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毛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呢。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能够讲问题，能够想问题就好。要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提问题，想问题，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文化领域必须解决读物问题，要有书给人看。现在文化生活太贫乏了，这怎么行呢？体育也应该活跃起来。文化部的任务是很重的。现在电影不多，读物很少。我这里摆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的小说，干巴巴的读不下去，写作水平不行，思想艺术水平谈不上，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电影也是这样，题材单调，像这样的电影我就不看，这种电影看了使人讨厌。文艺队伍要扩大，现在不是大了，是小了。要培养人才，发现新作者，要使他们开眼界。我们要重视开辟各种行业，不能一提行业总是上山下乡，行业道路越走越窄。上山下乡一年国家要拿出十几个亿，还要同农民争口粮，结果还不是都跑回来了？我们要开辟很多行业，开辟为工业、农业服务的行

业。文化也是一门行业，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随着生产的发展，精神方面的需要就增大了。最近，我赞成要使一亿拿工资的人有一半都能够拿到八十元以上，相当七八级工的工资。这样，消费需要就不同了。这些人要看戏，看电影，要艺术品装璜他们的家。他们柜子里要有东西放，需要书，需要花。这样反过来就会刺激其他行业发展。人们要吃好的，就会刺激饮食行业。归根到底，理论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我们要敢于想问题，提问题，敢于理论联系实际。有人怪得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政治工作问题，有人也反对，说这和华主席讲的“新时期”不一样，唱对台戏。有的人就是不敢想问题，不能从“四人帮”的框子里脱出来。作品不敢写恋爱，怎么能没有恋爱呢？看来文化部的队伍，经过整顿以后是有希望的。文化要发展，肯定会出现新人物。

9月8日—13日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朝鲜参加朝鲜国庆三十周年活动。12日，在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指出：我们希望二十二年不打仗，我们就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在谈到引进技术发展经济问题时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

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9月13日—20日 从朝鲜访问归来，在东北地区和天津市视察工作。

9月15日 在哈尔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

9月16日 在长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从实际出发，把实践经验加以概括。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科学研究，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学他们的基本经验，如大寨的苦干精神、科学态度。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评工记分，它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小自由完

全没有了，也不能学。全国调整农业经济政策，好多地方要恢复小自由，这也是实事求是。所有在一个县工作、在一个公社工作的同志，都要根据一个县、一个公社的条件，在大队工作的同志也要根据一个大队的条件，搞好工作。要鼓励哪怕是一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队很好地思考，根据自己的条件思考怎样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总产量，还有技术方面、多种经营方面，哪些该搞的还没有搞，怎么搞。这样，发展就快了。多少年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脑筋开动得也不够，这些年来思想僵化了。企业管理，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那时候，苏联企业管理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后来我们学了那个东西，有了那个东西比没有好。但现在连那个落后的东西也丢掉了，一片混乱。现在要使所有的人开动脑筋，哪怕管理一个街道工厂，也要自己开动脑筋，敢于思考怎么样使生产增加，产品质量提高，成本降低，原材料消耗少，产品价格不断降低。不管大中小企业，搞得好的要奖励，不能搞平均主义，要鼓励先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毛主席总是提倡要开动脑筋，开动“机器”。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思想搞僵化了，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

陷于落后不行。一个小的企业，甚至一个生产队，都应该搞好民主管理。我们的生产队为什么不搞民主？队长不合格就淘汰，社员应该有权利，现在有些干部权力大得很，包办选举，几个人说了算。所以现在农村有霸，出霸王。不管是公社各级领导干部，还是工厂企业的管理干部，都要考核。现在我们的科研机构、学校的考核制度慢慢建立起来了，企业的考核制度也要建立起来，要真正搞按劳分配，鼓励向上，鼓励人们努力学习，这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益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总之，实事求是，开动脑筋，要来一个革命。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这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他还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生产力总是需要发展的，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9月17日 在沈阳听取中共辽宁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全党全国范围的问题，昨天在长春概括地讲了一下，中心讲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东北三省情况大体相同，但也都有不同。你们辽宁省几个地委、几个市，每一个都有不

同。鞍钢改造以后，必须是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市政府是不是要考虑变成它为它服务。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怎样高举，一个是怎样发展生产力。我们的思想开始活跃，现在只能说是开始，还心有余悸。要开动脑筋，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不开动脑筋，就不能分析自己的情况，就不能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学大庆有这个问题，学大寨也有这个问题，照搬不行，要教育所有干部开动脑筋，实事求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只凭上级指示或中央发的文件，或省里补发的文件，能解决所有具体问题吗？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東西可以大胆改革，也要给他这个权。所谓考核，第一就是考核这个问题。凡是能够这样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肯定会大有好处。当然也会出现瞎指挥，但总的来说会好一些。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也是思想问题，也是实际问题。

同日 听取中共沈阳军区常委汇报工作时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批林彪也好，批“四人帮”也好，怎样才叫搞好了，要有几条标准。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是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我们的传统就是老老实

实，说通俗一点，就是不看风使舵，不投机取巧，忠诚老实，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第二，消除派性，根除派性的影响，真正统一了。林彪、“四人帮”把军队搞分裂了，派性侵入到部队，把思想搞乱，把组织搞分裂了。第三，现在军队在地方在人民中的印象改变了，名誉坏了。什么时候地方和老百姓看军队像老八路，像老红军，这样就行了。第四，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五，干部队伍整顿好，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都搞清楚。对搞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上述问题的解决，也不能只是靠运动，还要靠日常教育，靠干部的领导。通过运动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把作风搞好，有半年时间就可以了。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有的不痛不痒，没有个目的，搞成形式主义，这也不行。究竟搞多久，你们研究。也不能一个号令，一天结束。有的单位，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结束，可以抓训练，可以组织学习科学知识。多学些科学知识，就是转到地方，也便于工作。提拔干部，要注意人的品质，注意思想，宁肯笨点，朴实一点，不要只看他会说会写。一定要注意干部路线。作为运动搞好的标准，就是以上那五条。这是我今天第一次提出来的。

9月18日 在鞍山市听取中共鞍山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讲话。他说：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

会，第二要提高创新。凡是引进的技术设备都应该是现代化的。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是真正的爬行主义。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我们改造企业，为了保证应有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要有合格的管理人员和合格的工人。不合格的作编外处理，要组织他们学习，对他们进行培训，开辟新的就业门路。合格的管理人员、合格的工人，应该享受比较高的待遇，真正做到按劳分配。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大大小小的干部都要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头脑僵化。以后既要考虑给企业的干部权力，也要对他们进行考核，讲责任制，迫使大家想问题。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用先进技术和方法改造企业》。

9月20日 在天津听取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我走了几个地方，一再讲就是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从实际出发。大队、小队都有特

殊性，不能划框框，不能鼓励懒汉。过去不能碰“禁区”，谁独立思考就好像是同毛主席对着干。实际上毛主席是真正讲实事求是的。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管理人员好的也应该待遇高一点，鼓励大家想办法。不合格的管理人员要刷下来。工资总额、劳动定额不能突破，这样自己调剂的能力是没有的。在谈到引进技术要改革企业管理时说：凡这样的工厂，管理要按人家的方法，这个对我们来说叫革命。

10月3日 在会见泰国新闻代表团时说：中国这么大，每个省的情况都不同，一个省那么大，各个地区也不同。所以，我们搞农业，主张每个地区独立思考，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搞农业机械化，这个地区的机械同那个地区的机械不同，有它的地区特点，不然就不适用。所以，现在讲解决农业机械化问题同过去的概念不同。

同日 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指出：法制确实需要建立和健全。民法、刑法要搞，但都没有搞成。没有法，他就乱搞，确实不行。现在是领导人说的话就叫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违法，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他说：这次我在沈阳军区讲，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要区别

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我们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总不能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有些事情还要自己负责。他还说：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说的领袖指的是单数还是多数，我说你们引用可得小心，既然列宁所讲的领袖指的是多数，你们引用时就得符合原意。总之，“领袖”这个词，中国人把它神话了。要把领袖变成人，不要把领袖变成神。按照不正常的方法去做，就会损害毛主席的形象。

10月9日 同民航总局、旅游总局负责人谈话。在谈到民航的管理工作时说：民航的服务不好，没有竞争能力，要改进一下。业务要大大开展，要按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要抓利润，利润不是帅也是将嘛。

10月10日 在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上的差距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是五十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

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

同日 致信华国锋、李先念：“工大祝词，我又考虑了一下，加改了两段，这是比较重要的改动。”邓小平加改的两段为：一是在原稿的“经济战线不仅需要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之后，加写了一段话：“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中央相信，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利益，全国工人阶级一定会在这些改革中起大公无私的模范先锋作用，各工会组织一定会用深入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积极协助各企业顺利地实现这些改革，为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作出新的杰出贡献。”一是加写了关于厂长负责制的一段话：“我们的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负责制，要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工会要教育全体会员维护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领

导，维护生产指挥系统的高度权威。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克服现在普遍存在的无人负责现象，才能正常地、有秩序地组织生产。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增加利润，同时不断地改善职工生活，从而确实保证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

10月11日 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的致词。指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大大加强企业的专业化，大大提高全体职工的技术水平并且认真实行培训和考核，大大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工会要教育全体会员维护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领导，维护生产指挥系统的高度权威；要教育全体会员积极参加企业的管理；要努力保障工人的福利；要密切联系群众。这个

致词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10月14日 在听取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汇报时说：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实事求是这个问题很重要，不仅领导机关要这样，就是一个小企业、一个生产队也要这样。叶帅说，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印发到全国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是常识，也有人不同意，这样的人还不是太少，甚至连接劳分配也有人说是错的。要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真正做到三不主义。要改变那种看气候、看风向说话的倾向。讲话，错了不要紧，不要怕，这是难免的。过去我们在各个根据地，都是按照中央统一的方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去分析和解决问题，结果都搞好了。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开动机器，不独立思考，那非垮台不可。实事求是问题涉及四个现代化，涉及党风、民风。我们还是要像大庆那样，提倡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在谈到部队揭批“四人帮”运动问题时说：有几条杠杠作为验收运动的标准是很重要的，不然，要进行到底，底在哪里，摸不着。运动不能老搞下去，到一定时候要转入正常。运动搞久了，容易倦烦，还可能打击面宽了。绝大多数转入正常，少数继续搞。部队的运动要求明年基本结束。集中力量在上半年验收，分批进行，先验收百分

之十。

10月22日—29日 访问日本。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23日，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批准书互换仪式并致词。23日、25日，同福田首相进行两次会谈。在会谈中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世界，都是件大事。尽管我们社会制度不同，这没有关系，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形势来说，两国必须搞好关系，扩大一点说，我们两国关系搞好了，对整个国际局势也有重要意义。我相信两国政治家、两国人民都没有低估这个意义。这次由首相阁下决断，园田外相到北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不断地发展。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多次讲到两国要世代友好下去。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发展不是权宜之计，坦率地说，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单就东方来说，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他说：条约签订的意义，很可能超过我们原来的预想。阁下谈到全方位和平外交并不是等距离外交，我们很注意这样的说法。我们双方的环境不同，有不同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钓鱼岛问题。就是有一些看法相同的问题，由于各自的环境不同，处理不同，说法也不同，这是不奇怪的。我

们有了很好的起点，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后，还要取得日本的协助。但是中国对日本也不是无所作为的，我们越发展，对贵国的协作方面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互不干涉内政是我们坚定的、一贯的立场，也理解日本不会干涉我们的内政。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说：我们将在充分尊重台湾的现实的基础上，来解决台湾问题。采用日本方式也是尊重台湾现实的一种表现。美国总希望我们承担义务，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如果这样，反而会成为和平统一台湾的障碍，使之成为不可能。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是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开始的，一直是在邓小平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

11月5日—14日 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6日，在出席泰国总理拉萨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讲话，赞扬东盟坚持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以及加强东盟组织自身团结的立场。10日，在同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会谈时，阐述了对国际局势总的看法。指出：世界整个形势趋向紧张、不安宁，其根源是霸权主义争夺的结果。面对战争爆发的危险，各国政治家除注意提高警惕外，应找一条延缓战争爆发的办法，而不能无所作为。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和分析，中国对外政策除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外，就是怎样能够延缓这个战争的爆发，这是我们处理国际事务的根本依据。12日，在出席李光耀总理举行的欢

迎宴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凌辱弱国。14日，在新加坡接见中国驻新加坡机构主要负责人时说：大家要开动脑筋，有的人总认为自己好。要比就要跟国际上比，不要与国内的比。政治要落实到业务，这是检验政治好不好的重要标准。工厂办得好不好，要看它管理好不好，质量、技术好不好。工厂搞好了，集体福利就要多搞一些，工作搞好了，收入就要多一些。当然差别不能太大。14日，在途经缅甸回国时，同缅甸总统吴奈温会谈。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

11月25日 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团中央几位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指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反映强烈，大家很高兴，热烈拥护，情况是很好的。当然也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要积极引导群众，不能和群众对立。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

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哪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上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能够保持稳定。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搞什么新运动，不要提中央没有提的什么运动。要引导群众向前看。平反工作，中央和各地都在抓紧处理，都是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一些遗留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是为了创造一

个安定团结的稳定局势,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11月26日 会见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就国内形势回答了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提出的问题。在谈到天安门事件问题时指出:过去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是不对的,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是革命行动,这是我们中央批准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央表示的态度。^{〔1〕}不久前,《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国际上反响很大。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天安门事件讲的。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当然,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总要有个过程,现在时机成熟了。有人有一个错觉,以为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又要乱,其实不会,人民是可以信任的。我们的群众经过文化大革命,绝大多数人,包括青年人,辨别是非的能力提高了,关心国家命运,这点是了不起的。过去“四人帮”不让发表不同意见,结果激起了一九七六年清明节人民的义愤。天安门事件

〔1〕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

确实没有任何组织，完全是群众自发的啊！反映了人民的觉悟水平、政治水平。群众是最希望安定团结的局面。现在不但中央的领导，地方的领导也一样，都一心一意要搞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不行的。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他说：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要把过去的问题了结一下，使全国人民向前看。所有错案、冤案，人民和干部不满意的事，一起解决。了结了这些问题，大家心情就舒畅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们全党是百分之百的一致。关于自力更生和接受外援的关系，他说：毛主席历来有两句话，自力更生，力争外援。“四人帮”把第二句话丢掉了，而且说，什么东西中国人都能搞出来，吸收外国的东西就是崇洋媚外，所以把事情搞糟了。但是，人们没有理解为什么毛主席强调自力更生？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条件接收外国的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们搞了二十二年，我们从哪里得到援助啊，谁能给我们援助啊，你不靠自己动手有什么办法？建国以后一九七二年以前，又有什么条件？那时你日本给过我们援助吗？美国能给我们吗？欧洲能给我们吗？我们不强调自力更生怎么办？就是那时，毛主席也是讲两句话，不是一句话。所以，“四人帮”不粉碎，我们就没有这个条件，国际条件有了，国内条件没有。对这个问题要有历史的分析。现在我们的

方针是，尽量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引进资金和技术，加速我们的发展。这个方针现在才可能实行，在这方面我们全党全民是一致的。当然，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资金，这也要量力而行，处理恰当。

11月27日 在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的汇报时，作了插话。指出：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语言可以形容得出来的。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讲马克思、列宁写文章就经常自己修改嘛。对毛主席的缺点错误，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在党内还是讲一讲好。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

同日 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他说：如果站得高一点看，不管中国政治家或美国政治家，都认为两国关系早点实现正常化好，越早越好。如果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因素的话，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比中日条约的意义更大。关于中国现在是否也正在考虑对政治

制度进行某些改革，比如采用西方那种竞选制度、干部通过选举产生等问题，他说：整个制度我们同西方不一样，你们叫议会制，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个制度不会改变。我们现在制度中存在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要改变。比如我们最近决定工厂的车间主任、班组长要通过选举的方法产生。工人参加管理的方式要改进，要用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我相信，现在的制度如果搞得不好，在某些方面加以适当改革，我们这个制度比你们那个制度做起事来要便利得多。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是学苏联的，那些东西看来是落后了。关于中国是否采用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形式的问题，他说：国与国的情况有很多不一样，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发展体制。当然，我们要研究他们的经验，但是不能简单地吸收别人的经验，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决定。根本的一点，是要承认自己落后，承认现在很多方法不对头，需要改，要承认这一点，并且找出适当的方法。关于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他说：中国人民都知道，没有毛泽东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历史是抹不掉的。毛主席从来就提倡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是照抄照搬某句话。毛主席历来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也是一样。你们大概注意到了，我们提倡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因为有些问题毛主席在世时不可能提出。按照马列

主义的原理，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伟大的人物、伟大的领袖每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

11月28日 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说：现在中美关系的焦点恐怕不是三个条件问题。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上，我们最大的让步就是允许采取日本方式，美国可在台湾继续投资，继续保持它的经济利益。我们多次讲过，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

11月29日 在会见由委员长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七次访华团时说：要搞四个现代化，就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气氛，求得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内外广大群众心情舒畅。对过去有些事情，群众不满意的，也确实有错的，要按照毛主席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把它纠正过来，把那些冤案、错案了结了。大的就是天安门事件这样的问题，错了就改嘛，改了就完了。对有些人，过去搞得不对的，搞过了的，要改过来，比如对彭德怀同志的评价。这样去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我们现在议的就是怎么样万众一心搞四个现代化，中心议题就是这个。

11月 对谭震林拟在《红旗》杂志发表的《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文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人？应该卷人。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人本身可能是卷人。

12月1日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的打招呼会议上讲话。指出：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清华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话水平很高。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但后来扩大化了。

12月初 写出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提纲。提纲列了七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强调：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争论的必要。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特别是近一时期。提出：政治与经济的统一，目前一时期主要反对空头政治。主张：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监督）。权力下放，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指出：解决遗留问题要快，要干净利落，时间

不宜长。安定团结十分重要，要大局为重。犯错误的，给机会。总结经验，改了就好。四、克服了官僚主义、人浮于事。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扩大管理人员的权力。党委要善于领导，机构要很小。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干得好的要有物质鼓励。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从引进项目开始，请点专家。七、新的问题。提出：人员考核的标准。多出人员的安置。开辟新的行业。后来邓小平在正式的讲话中将七个问题归纳为四个问题。

12月13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讲话共分四个问题。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说：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他着重讲到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三、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他说，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大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

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有些事要经过长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说：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在管理方法上，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在管理制度上，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他号召全党同志要善于学习。最根本的是要学

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学习经济学、科学技术、管理。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12月13日—15日 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会谈。关于台湾问题，指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16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谈判从一九七八年七月初开始，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

12月18日—22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全会还增选出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1979年

1月1日 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的会议上讲话。指出：一九七九年元旦是个不平凡的日子，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这三个特点，反映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在国内工作和国际事务中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就提出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去年逐渐地形成了。这个情况，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我们党刚刚开过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种风气和局面概括起来就叫作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要把这种风气和局面在全国发扬下去、坚持下去，在党、政、军、民各方面发扬下去、坚持下去，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搞得不好，

民主少了一些，因此，我们更要发扬民主。邓小平是在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八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的。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

1月2日 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军队最根本的、核心的问题，说到底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要创造条件，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军队不是搞什么新的章程，一九七五年关于军队要整顿的两个讲话〔1〕，现在看还是正确的。那两个讲话提出的整顿任务还没有完成，有些问题比那个时候更复杂、更加重了。一九七七年底军委会议和一九七八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制定的方针，今天看无论如何是正确的，问题是都还没有真正扎扎实实地做。主要是抓教育，抓作风，还要认真抓训练。训练内容，要包括干部转业以后，能参加经济建设。这方面的训练要抓紧，确实有大批人要转到地方去。同时要认真抓紧部队实战训练。现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我们军队怎么转移？没有新的章程，就是

〔1〕指一九七五年七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的《军队整顿的任务》的讲话和叶剑英作的《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讲话。

好好做。

同日 在同国家旅游局负责人谈话时说：旅游这个行业，要变成综合性的行业。6日，在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经济建设方针时又说：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要狠抓一下旅游和城市建设。发展旅游要和城市建设结合起来考虑，开始国家要给城市建设投些资，旅游赚了钱，可以拿出一些钱来搞城市建设。

同日 在会见由阿什利率领的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时表示，欢迎包括不赞成中美建交在内的美国朋友都来中国看看，通过访问、接触了解中国，或许有助于他们观点的改变。他说：就拿我个人来说，看法经常改变。毛主席、周总理也是这样。因为世界事务、实践在变化，问题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不断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

1月5日 在会见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特使金永南时说：我们多次讲过，对于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我们是尊重台湾的现实的。台湾的社会制度可以不动，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台湾人民的收入不会减少，只会增加。

同日 在会见美国记者时说：我们多次声明，台湾

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现了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当然，在双方达成建交协议的时候，卡特总统曾表示一种愿望，希望能够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个愿望，但是我们同时也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当然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是究竟可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愿望的实现。

1月17日 同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又不要重犯一九五八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要落实对他们的政策。总之，钱要用起来，人

要用起来。这个谈话的摘要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1月18日 在听取三机部负责人汇报时说：将来打起仗来，没有空军是不行的，没有制空权是不行的。陆军需要空军掩护和支援，海军没有空军的掩护也不行。我们主要是近海作战。没有制空权，敌人的飞机可以横行无阻。不管怎样，今后作战，陆海空军，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要取得制空权。否则，什么仗都打不下来。加强科学研究，这是总的趋势，不仅是航空工业。不搞科研，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化。引进外国大型科研设备，同外国科研机构合作搞科研，加速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个好。引进产品要考虑周到，要配套、搞全，同时要我们的制造结合起来。还可以派人出国，进行技术培训。可以减少一些现在生产的飞机产量，把剩余的钱用来搞科研，搞新产品试制，搞出中国式的更好更新的东西。如果我们能有一定数量的更高级的飞机，那形势就不一样了。

1月24日 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在谈到美苏战略核武器协定时说：我们不反对签订协定。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人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谋求世界和平，签订这些协定，不如中美关系正常

化，也不如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在回答国外有人谈论中国“非毛化”问题时说：最近我们多次讲，不论现在还是以后，毛泽东思想仍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许多基本原则还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确定的。毛主席并不是没有缺点、错误。如果要求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不是马列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思想。有许多事情毛主席生前没有条件提出来。我们现在提出来，这本身不是“非毛化”，根据现实提出问题是完全应该的。我们现在还是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画的蓝图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来实行我们的对外政策。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我们的政策和原则合情合理。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当局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它自己的权力，就是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军队，同外国的贸易、商业关系可以继续，民间交往可以继续，现行的政策、现在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这个问题可以长期来解决。中国的主体，也就是大陆，也会发生变化，也会发展起来。总的要求就是一条——一个中国，不是两个中国，爱国一家。

1月29日—2月5日 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29日，在出

席卡特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祝酒时说：我们两国曾在三十年间相互处于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顺利地达成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不仅如此，还在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地作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30日，在华盛顿对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31日，同美国广播电视界谈话。在谈到国内问题时说：正确政策的持续不是由个人因素可以保证的，关键在于这些政策是否正确，人民是否赞成，对人民是否有好处。如果这些政策是正确的，对人民有好处，又得到人民的支持，政策的持续就有了根本的保证。既然我们现在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采取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都是正确的，可以肯定，这些政策会继续下去。

2月6日—8日 在访美归国途中访问日本。向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通报了访美情况，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形势、亚太地区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这次访问美国和日本，是邓小平最后一次正式出国访问。

3月21日 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我们的方针是大量吸收、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甚至资金，这样做可能快一些。而且，我们还要善于吸收，善于使用，善于管理。但这一切都需要学习，我们有信心，我们可以学会。

3月21日—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九七九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23日，在会上发表讲话。针对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近两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更加严重的情况，指出：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

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要看到困难，把道理讲清楚，把工作做充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钢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钢铁要抓质量，抓尖端的。谈农业，只抓粮食不行，还是要因地制宜，农林牧副渔并举。人口增长要控制。争取到一九八五年把人口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以下，降不到这个水平不行，国家负担不起。在这方面，应该立些法，限制人口增长。他还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准，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

3月27日 为准备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1〕上的讲话稿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民主法制问题，要展开讲。讲民主，要结合分析几个非法组织的活动来讲，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结论

〔1〕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至四月三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举行的。会议对“两个凡是”和思想僵化现象进行了尖锐批评，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是，不搞“四个坚持”行吗？不严肃对待社会上的坏人行吗？这样讲可能比较有力量，针对性较强。空泛的语言多了，就不突出，也缺乏说服力，缺乏动员的力量。要动员群众同这些坏人作斗争。到底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好，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好？只要我们的工作搞得好，按经济规律搞建设，肯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好，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要把少数坏人和群众分开来。受蒙蔽的群众大多是青年人，他们不懂我们党的历史、革命的历史，没有经过艰苦岁月的锻炼，加上“四人帮”的毒害、腐蚀，很多事情不明了，觉悟不高。要教育他们在处理个人的问题、个人的困难、个人的利益时，应该从大局着眼。他们的困难，国家一下子解决不了，应该给国家时间和力量，先把经济调整好，这样才有希望。不然国家就要延缓建设速度。要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人民的智慧，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克服官僚主义、长官意志。但是，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就不能做到这些。讲党的领导，强调要有统一领导，要有权威。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就没有效率。有了党的统一领导，只要这种领导是正确的，我们的调整会快，建设速度会快。不统一，一事无成。列宁非常强调集中统一，强调纪律。我们的革命战争，也是在高度集中、高度纪律下打胜的。没有党中央、国务院，能解决全国性的问题吗？他还指出：思

想理论界应有一个主导思想。理论工作的主导思想、中心任务是要引导人们向前看。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迷恋于算旧账。对全会精神的精神宣传得少，还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提法，甚至是偏激的提法。这样不好，不利于团结一致向前看，不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不利于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为什么不多宣传党的好的传统？如守纪律，艰苦奋斗等。为什么我们的电影不搞这些题材，加以艺术概括？传统教育包括守纪律、勤劳、顾大局的教育。理论要为政治服务。国内现在最大的政治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要使群众做好准备。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理论界去研究，去回答，现在缺少这样的理论家。

3月29日 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他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一九九七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香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的人放心。在会见中，他不同

意麦理浩提出的在一九九七年六月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建议。他说：如果现在肯定香港将来的地位不变，这对我们在国际上的斗争不利。他明确说：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并进一步解释：这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到一九九七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无非一个是收回，一个是保持现状。不管哪种政治解决，都不影响投资者的利益。麦理浩的这次来访，传达了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政府接触，了解中国政府对确定一九九七年后香港地位的态度信息。这次谈话后，中国政府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3月30日 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现在一方面，坚持“左”倾错误的人攻击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党内和社会上产生一种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因此，我们要在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对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批判。他强调：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现在搞建

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我们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批判了“四人帮”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

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四项基本原则，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论证，这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邓小平这篇讲话发表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载入了党章和宪法，成为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4月5日—28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决定从一九七九年起用三年时间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广东省委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表示赞同。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他向中央建议批准广东省委的这一要求。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4月19日 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访华团时说：中美两国关系能够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就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政治基础受到了一些干扰。对

你们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1〕，中国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问题，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还是要保护台湾。美国认为保护台湾是美国的利益，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包括一旦有事美国还要干预。所以说，这个法案实际上否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我奉劝美国朋友注意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不能干了。

5月10日 会见美国商务部长克雷普斯。谈到中国的经济调整问题时说：经济调整本身是为了发展得更快，更好地利用先进的技术和外国资金。还有一个要利用好的，就是人才。技术人才、管理人才，这方面也是

〔1〕《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总统卡特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签署生效的一项立法。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一月二十六日，卡特总统提出《与台湾关系法》议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予以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称：“美国作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以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种期望为基础的；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并提出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的能力”。这个法案继续将台湾当作“国家”对待，违反了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

我们的缺口。这些都属于调整范围，否则引进没有用。调整不影响我们大量的而不是少量的吸收国际资金和引进先进技术及设备。如果说有影响的话，那就是各行各业都伸手，这就要权衡一下，分轻、重、缓、急，看哪些先哪些后。每个具体引进项目都要考虑支付能力。

5月16日 在会见日本时事通讯社代表团时说：国际上很关心我们提出的经济调整问题。人们提出疑问，这个调整是不是改变了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方针？是不是改变了我们的经济开放政策？所谓开放，是指大量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可以明确地说，这个调整方针是为了更加稳妥和更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好地执行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方针和政策。我们除了吸收国际资金、先进技术外，还要学习国际上的管理经验。中国的经济必须要照顾到农业。我们中国人口将近百分之八十是在农村，农业不前进，一定要拖工业的后腿。工业内部有轻工业同重工业的关系，重工业内部也要有适当的比例才能发展。比如我们现在的电力、燃料、动力工业不发展，其他工业就遇到困难，交通不放在优先的地位，也是不行的。所谓调整主要是调整我们中国内部的关系，工业和农业、工业内部的关系，调整得好些，相互比例关系更恰当一些，这样才能更好地建设，比较快地前进。我们国内经济有个先搞什么，后搞什么，哪些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的调

整问题。他说：至于“自由化”，我们从来不提“自由化”。我们从来都提民主集中制，现在这样提，以后也是这样提。过去民主缺乏，民主不够，以后要着重发扬民主，因为没有充分的民主，就没有很好的集中。但不能搞无政府主义。民主集中制和发扬民主不矛盾。“四人帮”搞无政府主义，搞得一切都没有秩序，乱七八糟，那是灾难。现在有些闹事的，实际上是“四人帮”的思想体系，照他们的搞法，又要搞乱的。我们现在需要安定团结，把大家团结起来，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我们要发扬民主，也要加强法制，中国吃了十一二年动乱的苦头。反对少数人的胡作非为，是得人心的，人民是很拥护的。世界上所谓人权问题，各有各的解释。

6月15日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致开幕词。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建国后的三十年中，我国的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我国农民已经是具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工农联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

事业服务。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十三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心向祖国，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在实现统一祖国大业、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加强国际反霸斗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上述各个方面的变化表明，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个开幕词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政协的任务》。

6月25日 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党内负责人会议上讲话。指出：现在无论国内国际，人们十分关切

中国是不是真正安定团结。而我们要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不可能的。国际上愿意帮助我们的人，他们也要看中国有没有这样一个条件。中国人民，吃够了十多年来动乱的苦头。动乱一下，就耽误好多年，不是三年五年能恢复起来的，动不得、乱不得啊！我们搞四个现代化，需要这样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在人民当中，我们要树立一个很好的形象，表明我们是安定团结的。我们制定法律的步伐要加快。确实要搞法制，特别是高级干部要遵守法制。以后，党委领导的作用第一条就是应该保证法律生效、有效。没有立法以前，只能按政策办事；法立了以后，就要坚决按法律办事。我们这次大会要认真立法，大会以后还要立一系列的法。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国际上认为中国有个新的开端，不但指四个现代化，还有加强民主和法制。总之，我们这次会议不要纠缠过去历史上的个别事件，不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另外一面，放松了我们集中解决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概括起来，一个是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一个是民主和法制的问题。要集中解决这些问题，顺利地把这次代表大会开好。

6月26日 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四川代表团讲话。指出：这次大会把阶级斗争问题讲清楚了。概括起来，就是既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又反对阶级斗争扩

大化，不再搞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了。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但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像过去那样干预一切。民主与法制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保障。讲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就要看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要物质极大丰富，满足整个社会需要而有余。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怎么比较？是比生产力的发展，不是比打砸抢。

6月28日 在会见竹入义胜委员长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八次访华团时说：我们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部署，并不是离开四个现代化来搞八字方针。按照八字方针，大约需要三年时间，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有所改进，完全消除还不行。八字方针是为加快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并不影响我们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的既定方针。国际上议论说我们要收缩。这是误解，他们不了解情况。为了明确表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既定方针，我们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个法是不完备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经验。与其说是法，不如说是我们政治意向的声明。以后会再搞一些具体的执行条例、规定来加以补充。所以说，三年调整并不影响我们大量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但是在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项目时我们也要考

虑到轻重缓急。至于吸收外资的方式，有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甚至于外国在中国设厂，我们都欢迎。关于民主和法制问题，他说：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们吃够了动乱的苦头。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要制定一系列法律，这是建立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必要保障。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

7月11日—8月10日 在安徽、上海、山东、天津等地视察。

7月15日 在黄山接见中共安徽省常委时说：黄山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你们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工作人员要实行按劳分配，年终利润多还可以发奖金。九亿人口的收入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总是有的地区先富裕起来，一个地区总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7月21日 在上海接见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时说：大问题是接班问题，任何地方、任何部门都有这个问题。现在就要有意识地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这是党的

战略任务、根本任务。现在老同志要注意，要任人唯贤，选真正好的，不能论资排辈。讲解放思想，这是最大的解放思想。如果说，三中全会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这次就是解决组织路线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一部分干部中一种是崇拜西方世界，反对四个坚持；一种是利用毛主席旗帜，坚持“两个凡是”，这个问题是大量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是非就搞不清楚。思想路线不解决，政治路线是搞不清楚的，必然是摇摇晃晃的。我们的根本问题是要搞四个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搞穷过渡、穷社会主义。否则你吹有什么用。思想路线解决了，政治路线才容易贯彻。归根到底，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三中全会的意义不能低估，这是根本建设，是毛主席延安路线的继续。组织路线，有党规党法问题，有组织纪律问题，但现在最迫切的是班子问题，是找接班人的问题。

7月28日 在青岛接见中共山东省省委常委时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政治路线不能贯彻，说拥护政治路线是假的。现在要明确提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而组织路线最根本的是选择培养接班人。这是根本的问题、百年大计的问题、对党负责的最大问题、组织路线第一位的问题。要从上到下有意识地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真正坚持我们现在政治路线的人、正派的人、党性强的人。现在有人才，

被盖住了，没有发现。人才要放到领导位置上，不然锻炼不出来。现在思想要解放，把庙腾出来，选年轻的。这是党和国家的最大利益，是保证我们路线贯彻执行的中心问题。组织路线有个干部构成问题。现在全国一千七百万干部，“万金油”干部多，专职干部少。还有建立新机构，一开始就要搞得非常精干，不要搞庞然大物，不要搞个大体制。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比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阻力更大。他说：搞现代化就是要加快步伐，搞富的社会主义，不是搞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是最大的阶级斗争。有的人说社会主义不如西方好，如果那样，你这个是什么社会主义？是“四人帮”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不发展，有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如果我们人均收入达到一千美元，就很不错，可以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还可以增加外援。人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要很好控制。

7月29日 在青岛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讲话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我

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确立以后，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组织路线问题，其中最大的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

8月9日 在天津听取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我要讲的还是那些，还是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中央各部门需要解放思想，地方也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能量可大了。发展生产力，不解放思想是不行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增加人民收入，这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否则讲过来讲过去，穷得很，有什么优越性。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不是我提出来的。关于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是在《光明日报》登的，开始我没有注意。后来越争论越大，引起了我的兴趣。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才有真正的思想基础。这个问题意义太大了。组织路线包括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干部合理组成问

题，现在是专业人员少，懂行的少，需要的方面没有人干。这是组织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要培养干部、培养专业人员，还要注意组织建设中的一些制度的规定。摆在我们面前更大的问题是谁接班的问题。现在选接班人，要从四十岁左右、五十岁左右的人中选。标准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一是搞党性不搞派性。新的政治机构一定要精干，不搞荣誉职务，可以搞顾问，但要能顶着干八小时。要真正把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成长，选不准还可以换嘛！这是百年大计，是基本建设。我一路上讲这个问题，这确实是带根本性的问题。总之，不要太天真了，认为三中全会、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以后，天下太平了，没那回事，要注意一下思潮。一是组织上选好接班人，一是政治路线、思想路线要继续进行教育。对一些人要做好转化工作，有些人还是老框框。三中全会以后，全会精神没有很好地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没有很好讨论，因此，必须加强政治思想路线方面的教育。阶级斗争问题不是不提，《政府工作报告》中不是讲了吗？但政治运动要慎重，一个运动搞下来，几年恢复不起来，成灾呀！为什么说安定团结呢？团结大家理解，没有安定的条件不行。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要提到自觉的高度。在谈到经济问题时说：生产要根据市场的需要。建立公司的目的是用经济

办法管理经济。天津的市场要面向全国，而不只是面向全市。

9月1日 在听取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插话。提出要扩大统一战线的范围，他说：新时期统一战线，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爱国者的范围是很宽广的，包括蒋经国在内，只要台湾回归祖国，他就做了爱国的事。现在可以提第三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对象，清楚得很，顾名思义，是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统一战线的性质，叫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就是劳动者与爱国者的联盟。这样范围就宽了，具有广泛的性质。在谈到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子女有无继承权问题时，他说：对遗产要允许有继承权。继承的财产很有限，但如果广东允许，对港澳就会有影响。港澳到内地投资的资本家就提出子女有没有继承权的问题。不允许遗产继承权，即使老子赞成，儿子也反对。我们应该在法律上作出规定，解决继承权问题。在谈到加强统战工作的问题时，他说：加强统战工作是必要的，好多年没有开会，抓一下，对。现在你们提出的更多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題，民族、宗教问题还没有议，这些方面有很多问题。民族问题确有很多问题要引起注意。

9月4日 对修改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提出意见。指出：还是要讲在三十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取得的。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是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功勋的。要讲我们有了正面经验，也有了反面经验。两方面的经验经过总结，教育了我们人民，教育了我们党，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前进的指南。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就站住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也站住了。过去的三十年，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我们的斗争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干扰、破坏，但我们终于克服了这些干扰、破坏，我们始终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要使人看了这个讲话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9月12日 就修改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九月十日稿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说：我们要民主，也要集中，要自由，也要纪律，要个人心情舒畅，也要统一意

志。我们说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就是要使这两个方面都得到保证。现在的情况是，既缺民主和自由也缺集中和纪律，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更缺集中和纪律；既缺个人心情舒畅又缺统一意志，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更缺统一意志。林彪、“四人帮”毒害了一代人。对于这一代人，特别是一些青年，有个再教育的问题。各级干部，包括老干部，也有个再教育的问题。教育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他们尊重集中，遵守纪律，顾全大局，先公后私，并且在全国人民中，逐步恢复和发扬我们曾经有过的好的道德风尚。现在讲话稿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要加进去。要讲加强纪律性、组织性，强调批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现在有的从“左”的方面，也有的从右的方面，来助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两个方面，都值得注意。要分析当前的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讲问题，进行教育和再教育。批评群众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要讲究方式。对多数人的教育工作做好了，就要坚决打击那些专门扰乱社会秩序的极少数人，坚决制止他们的各种不法行为。对于这些人，我们不能允许他们借口保护自己的什么人权，侵犯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利益。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对于人权问题，历来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批评“长官意志”，是说历史发展有自己的规律，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客观的，而不是凭

某个人或某个“长官”的意志，就可以改变和决定的。因此，我们要求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每一个干部、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同志，尤其应当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离开这个基础，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办法，就会是不正确的，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但这并不是说，管理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工作，负责人可以不要意志，搞成“长官”无意志，政府无主意。现在一批评“长官意志”，有些干部就不愿管事，不敢负责，这样不行。对“长官意志”，要进行分析。

10月4日 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提出对经济工作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和原则。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思想路线问题要深入讨论，这个工作不能搞运动，要插到经常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上千美元？等达到一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

能就比较好过了。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细，很具体，很有效。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我们需要培养一些专家、懂行的人，现在不懂行的人太多了，“万金油”干部太多了。当前的经济调整是为了创造条件，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以后要求的速度、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抓质量是调整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现在的调整还要包括一些准备工作。现在不着手，到时候就形不成新的生产能力。我们的经济工作从一九八三年开始要有比较相应的速度，从现在起就要考虑，包括具体的项目。这就要求我们搞计划、考虑问题，面要宽一点，要照顾到三年以后。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引进一个项目，可以带动一些行业的发展。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这有利于发展生产。过去我们统得太死，很不利于发展经济。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银行拨款的制度必须改革。财政体制，现在是集中不够，分散也不够。总的方针是，使地方财政多一点，活动余地大一点。但是中央如果不掌握一定数额的资金，一些关键性的只能由中央投资的项目会受到影响。现在一提就是中

央集中过多下放太少，没有考虑该集中的必须集中的问题。中央必须保证某些集中。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

10月15日 会见格林率领的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并接受电视采访。他说：我们建国以来历来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当然，我们也进行无神论的宣传。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像宗教这样的问题不是用行政方法能够解决的。林彪、“四人帮”破坏了我们一贯的宗教政策，我们现在开始恢复老的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涉及到民族政策，特别是我们中国，一般都是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方面问题最多。我们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在谈到中国的前途问题时，他说：我们有自己的信念，我们正在用这样的信念教育我们的后代。如果说一百年，不说一千年吧，我们希望永远保持社会主义制度，永远不要搞霸权主义，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即使我们比较富的时候，还是属于第三世界。理所当然的是，我们要增加我们的国民的收入，使人民的生活一步步好起来。但是，绝不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产生新的剥削制度。在国际上永远实行国际主义，不搞霸权主义。我们希望若干年后，在下个世纪不长的时间，作为社会主义的、比较富的中国，能够对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尽到符合我们自己身份的国际主义义务。在谈到

人口问题时，他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把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凡是保证只生一个孩子的，我们给予物质奖励。在谈到个人自由问题时，他说：如果说个人对社会主义有充分的理想，有充分地发展他的才能的权利和条件，这些自由是同共产主义毫无矛盾的。但是，如果说个人自由与国家的自由和大多数人民的自由相矛盾，这种自由就不能提倡。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人们也还要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这与自由是不矛盾的。现在的问题是，对人权问题、自由问题，在我们的青年中有一种误解，实际上把这些变成无政府主义，甚至于是变成了极端个人主义。这个问题我们要通过教育的方法来解决。

10月19日 在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的宴会上讲话。指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是我国革命的祖国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容忽视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们具体历史条件和

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优点和特点。这个讲话的节录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10月30日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致祝词，批驳林彪、“四人帮”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战线说成是所谓“黑线专政”的诬蔑，提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任务、方针和原则。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

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他还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这个祝词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11月1日 在中国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茶话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世界科学发展史说明，在科学领域里作出杰出贡献的往往是中年人和青年人。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只要他们做出了贡献，只要他们合乎研究员、教授的标准，哪怕只有三十岁，也要把他们提拔到研究员和教授的岗位上，给他们应有的学位和技术职称。要把学位制度和技术职称赶快建立起来，这有助于发现人才。

11月2日 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作题为《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

报告。针对干部中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中存在的特殊化现象，他强调：我们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高级干部应自觉遵守《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在整顿党风、搞好社会风气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他还提出：老同志和高级干部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选拔干部，选拔人才，只要选得好，选得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要抓紧培养、选拔专业人才，要建立学位制度，也要搞学术和技术职称。要特别注意选拔中年干部。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现在看来，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这个报告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要求各有关部门必须严格执行。

11月26日 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指出：实现现代化确实是一场新的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他说：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

产生剥削阶级。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2月6日 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小康”的概念。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

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说：我们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对台湾，我们的条件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民间交往照旧，这就是说外国可以照旧对台湾投资。即使台湾与祖国统一起来后，外国投资也不受任何影响，我们尊重投资者的利益。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条件只有一条，那就是，台湾要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自治权。这个谈话的节录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

12月29日 在会见新加坡政府代表团时说：你们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当然条件不同，问题也不一样。中国的问题太麻烦，人太多。每个人增加一元钱的收入，就要十亿元。最近大平首相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就向我提了个问题：你们的目标究竟有多大？我说所谓四个现代化，只能搞个“小康之家”，比如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即使我们的经济指标超过所有国家，人均收入仍不会很大。总之，既要有雄心壮志，也要脚踏实地。也许估计放低一点好，目标放低一点可以超过它。

1980年

1月1日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新年茶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八十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在八十年代里，我们最根本的工作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国内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把经济搞好。这就需要我们做好四件事。第一，一定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我们的政治路线或者叫根本任务，就是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第二，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有四个现代化，因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大家就不可能安下心来搞建设。第三，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我们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还很穷、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创业，就是要吃点苦，否则不可能有今后的甜。人民生活只有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才能得到逐步改善。第四，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没有这样一支干部队伍，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他强调：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保证党的领导。我们之所以能经得起风浪，党

的领导是最根本的一条保证。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中带根本性的一条。

1月16日 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讲话提出了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和现代化建设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三件大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加紧经济建设。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四个前提是：第一，要有一条坚定不移、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上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真正

要巩固安定团结，主要地当然还是要依靠积极的、根本的措施，还是要依靠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同时也要依靠完备法制。经济搞好了，教育搞好了，同时法制完备起来，司法工作完善起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整个社会有秩序地前进。要求安定团结，不会妨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当然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在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可能走“捷径”。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我们只有长期的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反对特殊化，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反对特殊化只是艰苦创业中的一个问题。第四，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我们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四个现代化，理所当然的，我们的干部队伍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有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要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纪律。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

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我们选拔干部，必须要注意了解他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关于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他指出：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当然也就没有刚才我们说的三件大事和四个前提。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这几条里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他还指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的、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先进技术和中等技术相结合，合理地利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等等。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2月23日—29日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26日，邓小平在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谈到中央的人事安排时说：以后的人事安排要慢慢年轻化。我们这些人是安排后事的问题，不再放到第一线了。当然，这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可能。我自己定了个奋斗目标，时间定在一九八五年，就是要办一件事，精心

地选拔身体比较好的，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搞事情。这次全会开始注意这件事，但没有做完，还要继续做。28日，在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当汇报到讨论中提出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要不要写刘少奇也犯过错误的问题时，他说：今天倒是议了一个重要原则问题。实事求是可不容易。写上这样的语句不会给人们说这是贬低少奇同志，不可能这样理解。少奇同志与一般人不同，在给他作的平反决议中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容，会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所有错误都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这不是事实。我们犯的错误比少奇同志犯的错误多，总要承认他也有错误就是了。这也是个党风问题。29日，在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关于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他指出：三中全会确立了或者说重申了党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考虑，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的思想路线。我们贯彻这条思想路线，就要反对

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三中全会的提法，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如果像“西单墙”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这次全会在组织路线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决策。但是，就全党来说，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还不少，我们要有清醒的估计。例如，我们现在的体制就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不过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我们党现在确实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关于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他指出：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还是要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但是工作方法不改也不行，更不能因为等体制改革就无所作为。工作方法总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改得好一点，快一

点。我们要发扬民主，同时需要集中。也许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时候，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以便把效率提高一些。二月二十九日的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

3月12日 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体制、制度问题中，很重要的是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要有退休制度，不仅军队要有，地方也要有，国务院也要办这件事。在讲到部队训练问题时说：从排长起，各级军官都必须经过军官学校的训练。这个要制度化。指挥现代化战争需要多方面的知识。要编组合成军，就是要逐步地把部队合成起来，通过平时训练，使大家熟悉这方面的知识，学会这方面的本领。讲话还强调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求军队所有的军事人员、政治人员都要做政治思想工作。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

3月19日 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1〕等问题，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指出：今年要抓好两件大事，一件是写好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件是搞好长期规划。关于起草历史决议问题，他说：中心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要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第一条。在谈到长期规划问题时，他说：一个

〔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负责。从一九八〇年三月到一九八一年六月，邓小平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这个决议。决议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科学的总结，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是能源，包括煤、电、油、水利、沼气、太阳能、风力。要全面进行研究、规划。现在越来越看得清楚，能源问题解决不好，经济建设很难前进。一个是交通运输，包括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海运、空运、港口、码头、货栈、飞机场，也包括邮电通讯。它们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关系极大。三是机械工业。我们机床不少，工厂不少，就是技术水平落后。问题在于要进行改组，进行技术改造。四是农业。要讲经济效益，增加社队收入，使一些社队和农户首先富起来。现在农村情况很好，要继续抓下去。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第一部分。

4月1日 同中央负责人谈《历史决议》起草问题。指出：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他再一次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在这次谈话中，他还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这个谈话的一些内容分为两篇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一篇是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第二部分，一篇是《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第一部分。

4月2日 同中央负责人谈长期规划问题。在谈到建筑业和住宅问题时指出：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看，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过去我们很不重视建筑业，只把它看成是消费领域的问题。但是这种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也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建筑业是赔钱的。应该看到，建筑业是可以赚钱的，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建筑业发展起来，可以解决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可以多盖房，更好地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随着建筑业的发展，也就带动了建材工业的发展。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重要地位。他还说：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十五年付清。住宅出售之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感到买房合算。不同地区的房子，租金应该有所不同。将来房租提高了，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这些政策要联系起来考虑。在谈到能源和交通问题时，他说：长期规划第一位的问题是能源，把

它规划好了，使它真正走在前面，就解决了长期规划一半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各项事业寸步难行。各国解决能源问题，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我们的侧重点，应该是煤的开发和利用。发展商品经济，交通必须走在前面。在谈到农业问题时，他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在这些地区要靠政策，整个农业近几年也要靠政策。政策为农民欢迎了，即使没有多少钱搞农业投资，只要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了，各种形式的经济、副业发展了，农业增产的潜力大得很，发展余地大得很。农业问题，计划不要抠得太细，不一定要那么多投资，还是多从政策上考虑问题。最后，他说：总之，就是要从提高经济效益、增加人民收入方面考虑问题，要按这个精神搞长期规划，这是个最大的问题。

4月12日 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他说：我们的现行政策基本上还是遵循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可以说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还是坚持毛主席制定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当然在处理复杂的国际问题时，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具体问

题。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同欧洲的关系、同日本的关系，就是根据这个思想。我们总结了我们的经验，认识到，不发展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太快。中国建国三十年来，不论农业方面、工业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但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耽误了时间，生产力的发展太慢。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在这一方面我们经过了数次曲折。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问题，要付学费。现在我们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我们相信这方面是有希望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第二部分。

4月15日 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时说：看来国际上还要经历一些风浪，就我个人来说，看远一点，采取有效措施，八十年代的危险可以渡过，不是不能渡过的。我们说争取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这

就需要联合努力，需要行动有力和有效，否则八十年代的危险能不能渡过要打个问号。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当然，这个考虑是有利于中国的。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环境来发展。我们太穷了，要改变面貌。

4月17日 会见以总书记贝林格为团长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在谈到两党的关系问题时，他说：我们一九五九年一起谈过。一九六五年也一起谈过。时间过得真快，一过就是十五年。这十五年是曲折的十五年。有很多变化。我们有变化，国际形势、世界也都在变化，变得我们现在终于坐在一起了。整个国际形势要求我们这样做，世界人民也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党高度赞赏我们两党恢复关系。过去吵架，没关系，统统作废，一起烧掉。有不同意见，不要紧，当然总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双方都把问题讲清楚，有些问题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过去许多争论，并不是我们讲的都是对的，我想你们认为自己讲的也不一定都对。把问题说清楚，就能加深了解。我要说三句话：一是过去的一切一风吹；二是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三是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

4月21日 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

团时说：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我们在这一方面吃的亏太大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十年。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第三部分。

4月29日 接受卢森堡电视组电视采访。在回答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时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必须看到这两个基本特点。中国既然是个大国，完全依靠外国资金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基本原则。就是立足于自己，也要照顾自己的特点，完全按照别的国家的模式来建设中国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建设也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技术，来加速我们的发展。我们欢迎国际资金来帮助我们发展。你们叫多国公司，我们叫合资经营，这种方式。

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当然，这个法律通过以后，据国际反映，认为还不充分。这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以后还要逐步充实起来。我们希望外国朋友不要等我们法律完备以后再同我们合作。在合作中，逐步使我们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完备起来。在回答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时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处理同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我们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道义上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输出或输入的。在回答对欧洲共产主义的看法问题时说：至于欧洲的情况，我们了解不多。欧洲共产主义是一个新事物。我们历来认为，凡是新事物都要通过今后的实践去检验。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毛泽东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尊重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共产党自己的选择。他们应该根据自己国家或地区的特点，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欧洲

共产主义现在究竟怎样，将来实际结果怎样，要通过他们自己实践检验得出结论。

5月5日 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仍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有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要考虑到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才行。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第四部分。

5月20日 同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编制长期规划问题。在谈到生产资料应同生活资料一样，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从根本上改变物资管理办法时，他指

出：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势在必行。方向是彻底改革，工作要分步走。产品积压，军工部门比民用部门更严重。过去说，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民养军、以军为主；现在看，以军为主的口号要取消。以后，军队需要的装备，由军事部门和机械工业部门签订合同，哪个工厂生产合适，就同哪个工厂订合同，签订合同以后，企业必须优先保证军队的需要。没有签订合同的、军队不要的产品，就是企业生产出来了，也不能强迫军队接受。民用产品积压的问题必须解决，通过市场流通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他还说：日本学者对我们编制长期规划提了一些意见，中心是两条。第一，在最近几年内不要追求速度，而是集中力量打好基础，其中包括能源、交通运输、公用设施，也包括现在所说的欠账，还包括教育。高等教育要发展，小学教育要有步骤地普及。这些基础打不好，想快也快不了。第二，认为我们煤炭价格太低，石油的价格也低。这样，人们使用煤、油就不注意节约。要提高煤、油的价格，促使使用单位节约，这实际是保护能源的政策。他们还提出，我们的能源应该主要搞水电。水电建设虽然周期长一些，但不用煤，成本低，利润高。日本学者讲的这两条意见不错，在编制长期计划时应该考虑。现在看来，最近几年内速度快不了，应该把主要力量用在打基础上。在农业问题上，我们采取现在的政策，效果很好，农业的发展速度比我

们原来设想的快。在一些地区和一些问题上，政策应该更加放宽一些。地广人稀的地区，多年来调进粮食，现在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在谈到利用外资问题时，他说：利用外资要及早动手，不要再犹豫拖延了。法国、美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都准备给我们一些贷款，有的已有着落，今后还可能增加。应该抓紧同他们谈判。怎样使用？主要用在打基础上，如搞水电。这些建设要赶快着手，因为不是短期可以见效的，拖下去，到“七五”、“八五”时发挥不了作用。

5月31日 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肯定和支持安徽农村改革经验。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

形式这个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在谈到肃清封建主义影响问题时，他说：前些日子，李维汉同志来找我，从“兴无灭资”谈起，谈了两个多小时。我看，这个口号有缺点，不完全，宣传不要过分，要准确地加以解释，其中包括内容和做法。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现在，党内为什么有人搞特权？这和封建主义影响分不开。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党内生活、社会生活都要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各种制度，都要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角度去考虑，逐步加以改革。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党与党的关系时，他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但是，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总之，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

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这个谈话的一些内容分为两篇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一篇题为《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一篇题为《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

6月13日 在会见由瓦克曼校长率领的美国费城普尔大学代表团时说：你们有一本小说叫《飘》，是写南北战争的。小说写得不错。中国现在对这本书有争论〔1〕，有人说这本书的观点是支持南方庄园主的。我们翻译出版了这本书。出版了也没有关系嘛，大家看一看，评论一下。

6月27日 同中央负责人谈对《历史决议》稿的意见。指出：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重点要放在毛泽东

〔1〕 一九七九年九月，浙江人民出版社为了改变当时文艺读物缺乏的状况，决定重新翻译出版长篇小说《飘》。此书出版后，曾在国内引起一些争论。

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要讲一讲，也要讲得恰当。结语写一段我们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第三部分。

7月11日 从重庆乘轮船顺江而下，考察长江三峡。12日，视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到武汉后，召集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三峡工程问题。指出：修建三峡工程，航运上问题不大，生态变化问题也不大，而防洪作用大，发电效益很大。轻易否定三峡工程不好。

7月16日 视察武汉钢铁公司。在参观刚投产的一米七轧机生产情况后说：我们要学习国际上先进经验，但光跟在别人后边不行，要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

7月22日 在湖北十堰市视察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对“二汽”率先着手在全国组建跨省、区的联合公司表示赞赏。他说：这是保护竞争，促进联合，应当这样搞。不这样搞，不能打破“小而全”。“二汽”这样的

大厂应当作为中心，带动几个省搞专业厂协作，把专业公司组织起来。

8月18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政治上，充分发扬民主；组织上，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在谈到逐步实现领导人员年轻化、专业化的问题时，他指出：人才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在谈到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存在的弊端时，他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方面来说，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

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以往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相信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在谈到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时，他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损失。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必须把肃清封建残余影响的工作，同对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朽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他还指出，中央正在考虑进行几项重大改革，如修改宪法、设立顾问委员会，建立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系统，改变党委领导下的

厂长、经理负责制为厂长、经理负责制，各企事业单位成立工会，各级党委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制度，等等。最后，他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不是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31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讲话。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8月21日、23日 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回答了她提出的问题。在回答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等问题时说：永远要保留下去。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回答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次发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时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

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在回答引进外资是否会在中国形成小资本主义的问题时说：归根到底，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当然，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不可怕。在回答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问题时说：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在回答如何评价周恩来总理的问题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许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

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这两次谈话的国内问题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

8月22日 会见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布什。他说：我们对里根先生最近一个时期发表的一些政见和共和党的执政纲领感到不安。不管你们哪个党执政，都涉及到中美关系是停滞、前进还是后退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历来阐述的观点是，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其他问题不能代替。他请布什向里根转达中国政府的四点正式立场：（一）中国政府希望中美关系发展，不应该停滞，更不应该后退。任何从中美建交公报后退的言论和行动，中国政府都坚决反对。（二）不管美国一九八〇年大选后哪一个党执政，中国政府评价和判断美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对外政策都将把对中国的政策视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战略的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三）如果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对中国政策部分（其中包括对台湾的政策）和里根先生最近发表的有关言论，真的付诸实施的话，这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连停滞都不可能。（四）如果以为中国有求于美国，以致一旦美国共和党竞选纲领中的对华政策和里根

先生发表的有关言论成为美国政府政策付诸实行，中国也只好吞下，别无选择，那完全是妄想。这不只是对共和党执政而言，即使民主党这样搞，也一样。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我把话说清楚，把这几条写成文字交给你，请转告里根先生。

同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小组召集人汇报会上说：现在正在准备搞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是把建国后三十年的历史清理一下。力求在十二大前的中央全会上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问题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作一个结束。十二大就讲新话，讲向前看的话。他指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必须取消。赞成试点，可以分步骤，但是不能慢。党委主要管党，这不是削弱党委领导，而是加强党委领导。其他改革，将来要做很多立法工作，要具体化。一大堆改革摆在我们面前，很迫切。

8月26日 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谈话时说：在西藏，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真正去做，也并不难。只有这件事办好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当然，还要努力发展文化，培养民族干部，使民族干部知识化。为此，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地民族学院都要加强。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

8月28日—9月12日 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举行。28日，邓小平致开幕词。指出：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需要用极大的努力，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的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它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了。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团结，使我国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中，做出积极的贡献。

9月9日 在会见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执行主任萨拉斯一行时指出：我们制定了控制人口的计划，争取到本世纪末不超过十二亿。这个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的经济不能很好地发展，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提高。

9月14日 会见由委员长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九次访华团。他说：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界限，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我国的改革工作刚刚开始，试验证明，各个企业、各个生产单位必须有比较多的自主权，并且要有相互竞争，看怎样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改革，促进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凡是

试验了的都见效，而且效果比原来预想的好得多。改革就是要充分调动职工包括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培养和选拔科学技术和管理等各个方面的人才。通过改革，克服吃“大锅饭”的弊端。吃“大锅饭”，就是干不干一个样，干得好干得不好一个样，没有比较，那有什么积极性？现在一比较、一竞争，就必然要淘汰一些落后部门。这不是一个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也必须要像现在这样干才行。在谈到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时，他指出：现在大体上可以说，“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个错误，因为“文化大革命”确实没有给我们带来一点好处。

9月27日 在为全国政协章程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准备的一个文件上批示：“在修改章程中，不要把政协搞成一个权力机构。政协可以讨论，提出批评和建议，但无权对政府进行质询和监督。它不同于人大，此点请注意。”11月12日，又在乌兰夫、刘澜涛的信上批示：“原来讲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指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而言。对政府实施‘监督’权，有其固定的含义，政协不应拥有这种权限，以不写为好。”

9月29日 在政协章程修改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这是人民政协的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人民政协应当在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充分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人民政协是巩固和扩大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组织，也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我们应当很好地总结经验，使实践中证明是有益的东西，在修改后的章程中得到反映。

10月9日 会见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最高顾问松下幸之助一行。他说：我们在国际交往中的政策没有变，在继续贯彻。不过，我们要清醒地估计我们自己的力量，量力而行。在这方面，原来我们的经验不够，同时，同外国商界合作必须充分估计我们自己的偿还能力。因为我们的基础太薄弱，心里想快，但实际受限制。也许稳步前进在实际上会更快一点。我们把广东、福建当作特殊地区，在广东靠近香港的地方设立一个特区，欢迎各国的资本在那里投资设厂，参与那里的竞争。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利用香港同外界的关系比较容易沟通。我们这也是一种试验，因为香港地盘有限，发展余地不大。在谈到建设与积累的关系问题时，他说：过去我们的计划中积累率太高，有百分之三十几，带来了不平衡、不协调，住宅、城市建设、教育等这些方面的投资少了。所谓骨头和肉的关系，骨头欠肉的账太多。所以，我们下决心把基本建设缩减，把积累率降到百分之二十五，这个现在还办不到，需要几年的时间。这样

搞基本建设，新企业计划缺门的东西、科学教育、住宅、人民生活方面的事情，就可以多花一点钱。

10月15日 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召开的研讨会议上讲话。在讲到当前的国际形势时说：国际形势越来越动荡，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但是，争取一点时间，延缓战争的爆发，是可能的。综合全局来看，甚至比五年多一点时间还有可能。我们的政策是，争取拖长，争取更多一点、更长一点的时间，延缓这个战争的爆发，这样对我们有利，也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现在这件事情，还是我们提出的口号，也就是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叫做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讲到我国未来的反侵略战争采取什么方针时说：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既然是积极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在讲到部队的组成问题时说：过去我们设想过，把一个军组成一个合成军，有炮，有坦克，有导弹，炮包括防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集团军。有一两个集团军作基础，就可以进行合成军的训练，免得战时临时组成，指挥员都不会指挥。练兵也可以接触坦克，接触对空武器，接触导弹，这样就有了现代化作战的知识，军队的素质就可以提高。这个问题要提到我们日程上研究。在讲到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时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提的目标就是争取二十年翻两番。到本世纪

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进入小康社会。这要求我们的军费维持现在的比例。军费搞得太高不可能，肯定影响经济建设。怎么把这个钱用好，把钱更多地用来改进我们的装备，这也是我们考虑的一个战略问题。

10月25日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首先谈了对《历史决议》讨论稿的修改问题。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好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在谈到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说：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十年规划，中心和着重点不要多考虑指标，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优先的地位。知识分子工资问题，价格问题，城市住宅问题，轻工、日用工业品增长问题，也就是消费在国民收

人中占的比例，要逐步提高。所谓基本建设退够，就是积累所占的比例退够，用来增加消费。总之，一定要使人民得到实惠，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从切身经验中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值得爱。经济工作要接受过去的教训。再也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一定要搞扎实。在谈到改善党的领导时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问题在于，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各级组织的权利、任务、工作方式都要改善。从基层来说，要下决心改变党员高于一切群众、支书高于一切党员的状况。党委不能再包揽、干预一切。党的领导要体现在制定和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整个国家是这样，各级党的组织也是这样。党的组织、党员，都要永远站在人民一边，同人民在一起，了解他们的要求，倾听他们的呼声，采取各种办法保护和争取他们的利益。党的组织不是政府，不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要认真考虑党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党的机关、国家机关怎么改革这些问题。要搞个工厂法，很好地规定各种关系。总之，现在愈来愈看得清楚，我们过去的那一套不适应今天和以后的任务，非改不行。这个问题，我还在继续考虑。也请同志们好好考虑一下。要进行试验，取得经验。在谈到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时说：我们过去的提法，是立足于早打、立足于大打、立足于明天就打。这

里包括对世界大战的估计问题。我们还是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但究竟什么时间打？我在一九七五年说过，五年打不起来。五年过去了，没有打。现在看，再有五年或者更多时间，也还是打不起来，因为双方的战略部署都还没有完成。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不能还是建立在过去那种估计的基础上。备战经费，可以挪出一部分来搞经济建设。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第四部分。

11月24日 会见由总书记卡里略率领的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在谈到党与党的关系时说：有两条原则一定要坚持。第一条原则是，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党关系，不是父子党关系；第二条原则是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自己去判断，犯错误也是他们自己犯，他们自己去纠正，不要拿我们自己的观点、模式强加于人。过去我们党对第一条是清醒的，也是受害者。父子党关系，要控制人家，我们是深有感受的。后来我们就强调，国家无论大小，党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但对于第二条原则，应该说，我们觉悟得比较晚。现在回过头看，我们过去并不都是对的，错误也不少。这方面我们自己是有经验的，但还没有总结好。什么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中

国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寻求自己革命的道路，包括方式。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功绩就是这一条。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但我们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觉悟，既然中国是根据自己的实践与马列主义的结合取得胜利，那末其他国家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中国并不是按照十月革命的模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如果这个经验总结得好，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国家（包括落后国家）也按照中国的模式去取得革命胜利。更不能要求发达的欧洲国家采取中国的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采取俄国的模式。世界各国，拿欧洲来说，欧洲的问题只能由欧洲人民自己来解决。每个国家情况不同，甚至一个很小的国家，也有自己的特点。应该说，我们现在才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认识清楚了，党与党之间关系的障碍也就排除了。

12月25日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确定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行进一步的安定的方针。邓小平指出：这次对经济作进一步调整，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更有利于达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次调整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正确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实事求

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为了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要继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和法制教育。要继续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要巩固经济改革已有的成绩。重点是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改革的步骤需要放慢一点，但在方向上有任何改变。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决定和今年中央印发的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文件，已经充分证明行之有效，要继续贯彻执行，大力落实。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重点放在总结经验，巩固提高方面。在调整中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已经从各方面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要继续实行，不能走回头路。仍然要继续把经济搞活，发挥地方、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在讲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时，他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已经作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实现、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摆在全党同志面前。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并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这些影响。同时，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在讲到安定团结问题时，他指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继续巩固还是遭到破坏，是这次调整成败的关键。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在坚定不移地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工作继续做下去的同时，要求全党同志、全国人民高度警惕和坚决打击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和刑事犯罪活动。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

1981年

1月4日 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阐明中国政府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他说：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主要是解决了台湾问题，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取得了中美新关系的建立，并使之继续得到发展。以后能否继续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个问题是焦点。现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的言论中的有些观点如果不加以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我们历来不回避穷和弱，可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第二种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即使现在世界发

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

1月12日 在会见日本参议院议长德永正利一行时说：“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精神上的问题很多，所以搞现代化，要增加精神文明的内容。现在，大公无私、舍己为公、艰苦奋斗等道德观念都遭到了破坏。要恢复是一代人的问题。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如过去，动不动就打、砸、抢，年轻的娃娃甚至动刀子。不讲礼貌了，也不照顾别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但不是说所有一代人都如此，不过在相当一部分年轻娃娃中有这个问题。没有好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即使现代化建设起来了也不好，富起来了也不好。

1月16日 在会见日本众议院副议长冈田春夫和夫人一行时指出：调整国民经济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不调整当前的国民经济，财政继续出现赤字，物价势必上涨。调整国民经济，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是一时的后退，实际上是前进。经过调整，我们就可以在经济发展上迈出更加稳定的、扎实的前进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说，调整经济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1月26日 会见澳大利亚外长斯特里特。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国外对中国领导人变动、审判“四人帮”等问题的种种议论，他说：世界上有好多议论都是一种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猜测。大家知道，我们的总理更迭了才半年。我原来是副总理，还有几位副总理，我们的年龄比较大，因此不当副总理了。这是好事情，表明中国这种人事变动在向健康方向发展。今后还可能有个别的更动。这些更动更有利于中国的安定团结，更有利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更有利于实行我们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过去一些个人专断的现象可以得到更好的纠正，因此也更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更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世界上有人议论，说我们搞“非毛化”。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但毛主席在晚年确实有很大的错误，也要讲清楚。讲清楚的好处是可以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也教育我们自己。但毛主席的历史功绩不能抹煞。毛泽东思想是

历史形成的，是在四十年代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肯定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个财富我们不能丢。既然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怎么能说是“非毛化”？我们要写个文件〔1〕，主要是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肯定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通过这次审判“四人帮”和这个文件的公布，不再纠缠过去的问题。我们十亿人民一心一意向前看，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努力。要把过去讲清楚。即使有人不赞成，也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把这个问题了结了。

2月14日 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作序。这本文集，收集了邓小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九年的部分讲话，内容涉及政治、科学、教育、文艺等几个方面。《序言》中说：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世界历史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激烈的动荡中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也走过了自己的很不寻常的道路。这本文集里的第一篇讲话，即一九五六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发表的时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以其蓬勃的生机和造成中国社会深刻变化

〔1〕指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的巨大成就，为世界人士所瞩目。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人民遭到了一场巨大的浩劫。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本文集里的大部分讲话都属于这一时期。我想，这本小小的文集可能为各国对中国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以及我们几十年来的历史感到兴趣的人，从某些侧面提供一些材料。这就是我同意出版这本文集的原因。《序言》中说：毛泽东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深重的苦难和进行过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忍不拔的斗争。现在，我们正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我深深地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序言》指出：近年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

各方面的发展，使得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如果今天再就本文集中的同样的题目讲话，我也许会讲得更加完备一些。但是，已经客观地存在着的历史，除了不断地加深对于它的认识、理解之外，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因此，我同意照讲话当时的样子全文编入文集，不做任何改动。如果有一天这些讲话失去重新阅读的价值，那就证明社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那有什么不好呢？

3月18日 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指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急了。一些。“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文化大革命”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但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在谈到宪法修改问题时，他说：还是要恢复国家主席。我们是个大国，这样对国家有利。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第五部分。

3月24日 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指出：我们现在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看起来是见效的。比如说农村政策。“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在农村政策这个问题上有很好的思想，他提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要相结合。但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个思想，采取了一些超越我们经济发展阶段的政策，因此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一九七八年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政策上，我们叫解放思想，就是每个公社、每个生产大队和每个生产队，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来考虑问题，要因地制宜，加强责任制，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实行新政策很见效。我们提出这些农村政策，很自然在人民和干部中间提出了一个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四人帮”鼓吹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谬论，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甚至污辱。向穷的方向发展，这不能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要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收入不断增加，当然也包括使整个国家一步一步地富强起来。难道穷就是社会主义吗？农民收入增加是不是资本主义？靠自己的劳动成果增加了收入，这是什么资本主义？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经济交往，但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国内。如果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不发达，没有购买力，那样，哪会有国内市场？我们看到，现在的政策正

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最有效的政策。这就教育了我们那些原来不理解新政策的干部和群众，使他们开始懂得了这些道理。当然，并不是说，这方面没有问题了，问题还是有的。但是，大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

3月26日 在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时说：陈云同志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第六部分。

3月27日 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着重讲了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他说：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多地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

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人人都去作检查，那就会变成运动。当然，不搞运动不等于政治工作没有方向，也不是不要声势。他还指出：最近有一件事做得好，就是大讲精神文明。总政治部提出的“四有、三讲、两不怕”〔1〕的口号很好。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

4月7日 在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决议稿已经经过几轮的讨论。讨论中间有许多好的意见，要接受。也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样说，“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

〔1〕 一九八一年二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和军队的特点，在《关于加强部队青年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一九八三年一月，又根据中共十二大文件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关提法，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内容调整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讲军容、讲礼貌、讲卫生，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

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他还说：我们对已经取得的成绩还要充分肯定，对毛泽东同志，还要维持原来正确的评价。不这样，就是给党、给社会主义制度、给国家抹黑，就会使人民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丧失信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才大大提高，中国人才在世界上站起来了，除台湾外，其他地区才真正实现了统一。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第七部分。

4月14日 会见由会长古井喜实为团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指出：我国的情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好起来了，把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确立起来了，正在坚定不移地奔向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讲四个现代化，开始时候提出的是一个雄心壮志。但我们一摸索，才感到还只能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讲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就是在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不能达到日本、欧洲、美国和第三世界中有些发达国家的水平。一九七九年我跟大平首相说到，在本世纪末，我们只能达到一个小康社会，日子可以过。经过我们的努力，设想十年翻一番，两个十年翻两番，就是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美元。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看来达到一千美元也不容易，比如说八百、九百，就算八

百，也算是一个小康生活了。特别是前一个时期，我们的脑子有点热，对自己的估计不很切合实际，大的项目搞得太多，基本建设战线太长，结果就出现问题了。尽管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没有放弃，只是我们吸取和总结了经验教训，更加量力而行了。想快，这个意图是好的，但欲速则不达，这是中国的古话。步子稳妥一些，也许速度更快一些。

4月18日 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会谈。指出：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在党内、在人民中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党的历史，我们是怎样奋斗的，怎样成功的，他们不清楚。他们只看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因此对毛主席持否定态度。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全党接受了。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是坚持只言片语。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意见很多。经过多次反复，评价毛主席，现在讲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普遍地能接受。至于毛泽东思想，是另一个概念，它是在建党以后，尤其在遵义会议以后逐渐形成的。年轻人不懂得这个历史。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世界也有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思想引导我们取得了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我们党的七大肯定了。那时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

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这个概念。建国后，毛泽东思想还有发展。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像坚持马列主义一样坚持毛泽东思想。

5月1日 在会见联邦德国前总统谢尔一行时说：中国每年都有新的待业人员产生，一年就有七八百万人。除原来没有就业的以外，每年有新的就业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把青年人下放到农村，这条路越走越窄。城市要开辟多种途径解决就业问题，开辟一些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来安排，是见效的。要扩大和改造服务行业，这样每年可以安排七八百万人。

5月19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说：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想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决议的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

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第八部分。

5月23日 会见前来北京同中国有关人士会晤的由北美主席洛克菲勒、日方委员长渡边武、欧洲主席贝图安等三十五人组成的三边委员会成员。在谈到中国提倡精神文明时说：我们在充分注意满足人民需要，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还要注意政治思想工作，其中心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6月12日 会见尼日利亚民族党代表团。他说：我们建国以后，人口增加了将近一倍，大约是百分之九十。人口多也是个负担。现在中国有近十亿人口，娃娃们长大了要就业，一年就有七八百万。世界上都在谈就业问题，我们这里就更复杂。人口多的大国有一定的优越性，但是困难也很多。我们把计划生育问题当作一个战略问题，试图在较短的时期内使人口年增长率不超过千分之五至六。我们有些地方的经验证明这个目标是可

以达到的。其实，即使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也只是争取在本世纪末人口不超过十二亿。我们必须定这个目标，否则，经济的增长就被人口的增长抵消了。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一致愿望。可是我们知识不够，技术力量薄弱，管理水平比较低。现在我们有较好的国际条件，我们可以加强国际合作，同时我们自己努力学习，不仅向外国学，也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学习。毛泽东主席过去讲过，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本身当然不好，给我们带来损失；另一方面，从错误中可以得到教育，改正错误，变聪明了，了解得更多了。这两年我们农业情况比较好，主要是因为政策见效。农村政策的核心是，尊重和扩大生产队、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建立责任制，这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其次是因地制宜，多种经营。过去在一些不适合种粮食而适宜种棉花的土地上硬种粮食。现在改种棉花，收入一下子就增加了两三倍。这是新的政策，总结了过去二三十年经验而制定的，很见成效。有些过去很困难的地方，一二年内翻了身，过去依靠国家贷款，吃返销粮，现在已经能自给。

6月16日 会见美国国务卿黑格及其一行。他说：如果要使中美关系不停滞并且要继续发展，关键是从什么角度来观察和对待中美关系，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对待两国关系，还是从一些暂时的、战术的策略观

点来对待两国关系。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中的一部分。如果就这方面来说，我们又满意又不满意。满意的是我们贸易关系有发展，中美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协调了行动。但中美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发展。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美国仍采取敌对国的态度来处理同中国的贸易、商业、技术转让等问题。当然，摆在我们面前最敏感的问题还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现在台湾海峡形势很平静，有什么必要不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样的问题涉及到中国最大的政策之一，就是要统一祖国，使台湾回归祖国。我们真心诚意地希望我们两国的关系不但不要停止在现阶段的水平上，而且要发展，这对全球战略有益。但现在这样的意愿还不是很稳定，还经常有那么一些事情或因素来干扰这种意愿。我们希望干扰的事情尽量减少，没有更好，至少应该尽量减少。我讲这个是因为中美关系确实存在阴影，干扰我们的战略意图，干扰我们的战略目标。就中国方面来说，希望发展两国的关系。但我们也不回避，不能不想到，假使这个干扰行动太厉害会引起相应的反应，导致中美关系停滞，甚至后退，思想上要有这种准备。

6月22日 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各小组召集人碰头会上讲话。在评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时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

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这次我们不提路线斗争，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这个决议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他说：为什么这次我们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但是，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决议中华国锋同志的名字需要点，因为

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他的工作。同时，按现在的政治动态来说，也有必要。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第九部分。

6月27日—29日 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全会还进行了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29日，邓小平在全会闭幕会上讲话说：这次全会解决的两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好。一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二是人事问题。全会对这两个重大问题采取重大的决策，作出重大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7月1日 在王震建议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信上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代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8月，邓小平在新疆视察期间，到石河子垦区调查研究。回到北京后，他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有必要，组

织形式与军垦农场不同，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10月，在同王恩茂的谈话时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恢复。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

7月2日 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讲话。他说：为什么六中全会之后，又专门把在座的诸位留下来开两天会，讨论陈云同志关于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离休退休这两条建议？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十分迫切，十分重要。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样一个大问题，关键是老同志带头，真正要开明，真正要从大局着眼。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的任务以后，要着手去做。做，要有个目标，要具体化。我希望老干部都把这个任务当作第一位的任务来解决。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

7月3日 会见由董事长哈默率领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代表团，就西方石油公司在石油、煤炭开发及其他领域同中国的合作进行了谈话。会见后，邓小平随即到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讲中外经济合作问题。他说：今天我为什么急着到这里？就是因为，

我们在中外经济合作的问题上如果搞官僚主义（不只是搞官僚主义），始终徘徊，对我们很不利。在国际合作领域里面，我们当然要量力而行，但是，凡是能够办到的，即使有少量困难，我们能够克服的，我们为什么不快上？对我们自己来说，当然要警惕，外国资本家总是资本家，钱他们肯定要赚。但是，他赚，我们也赚，而我们得的益处总比他得的更多。他指出：我们不在调整时期勉强增加速度，还是把比例失调的状况改变过来，中心的任务是调整结构，特别是把工业结构调整好。但是，一定要在今年、明年、后年，每走一步，都要考虑到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大项目我们不要上得太多，但是一千五百万吨的煤矿是大项目，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积极地上。不搞这样的基本建设，将来速度上不去。我们这个时候，脑子里面都是考虑中小项目，考虑改造现在的企业为主体。是不是还是要两条腿走路？总之，对这方面应该考虑得远一点，步子要积极一点。

7月17日 同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话，就当前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谈了意见。他说：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是有显著成绩的，这要肯定。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这也不能否认和忽视。但是，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

自我批评更不容易。党的三大作风有一条讲的是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志之一，但是，现在对不少人来说，这一条很难做到。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绝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不仅文艺界，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谈话列举了思想战线特别是文艺战线存在的问题，严肃批评了《苦恋》等作品的错误。他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有这些现象，而在于我们对待这些现象处置无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当然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我们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在思想文化的指导工作中还存在着“左”的倾向，这也必须纠正和防止。但是，这丝毫不是说可以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

7月18日 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指出：我们为什么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为党内，人民内，接触中国的历史，一个“文化大革命”，一个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问题不能回避。毛主席的问题，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在全世界都有影响，特别是第三世界，在毛主席的影响下进行革命，主要是进行民族革命，当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要总结经验，对历史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分析。不这样的话，思想统一不起来，认识统一不起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写这个决议的目的。有了一个统一的结论性的东西，今后对历史问题就不再说了，一心一意搞建设。他说：搞四化建设，不是不要国家政治生活上的民主，但是极端民主化不可能引导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极端民主化是破坏民主。我们讲四个坚持，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党的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底

子这样薄，怎样取得革命胜利，怎样把国家建设好，离开了党的领导毫无出路。中国近代历史什么时候真正统一过？一百多年来，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除台湾外，国家真正统一了。

8月10日—20日 视察新疆。16日，在同自治区负责人谈话时指出：要把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有民族区域自治法。新疆稳定是大局，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不允许搞分裂，谁搞分裂处理谁。他说，要树立一个选拔民族干部的标准，注意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干部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是干部问题。对思想作风正派，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又有突出工作表现和一定资历的同志要大胆提上来，甚至放到很高的领导位置上来。

8月25日 在会见马里共和国总统特拉奥雷时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国的政治形势开始了真正的转变。这次会议确定了现行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并确定了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总的说，现在是六十年代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最稳定的时期，只要把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我们的事业就一定有希望。

8月26日 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傅朝枢，进一步阐述了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政策。指出：台湾不搞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国资本不动，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我们要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是也不能排除在某种情况下被迫使用武力。即使使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现状也可以不变。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一个区，还保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两岸实现“三通”没有先决条件。“三通”就是说先来往，增加彼此了解，增加人民之间的了解，这是促进谈判的一种方式。所有国际朋友如果是真心要促进中国统一的，我们欢迎，归根到底，中国的统一这件事要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 and 人民来决定。首先希望两岸的领导人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来做这件好事，这在历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希望台湾的一些领导人把眼界放宽一点，放远一点。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祖国的统一富强，国家的希望，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什么谈判啊、“三通”啊，都谈不上。

9月9日 会见由委员长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十次访华代表团。在谈到修改宪法问题时说：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已经确立下来，而且已经见效了。两年多

的时间证明，这套路线、方针、政策合乎中国的国情，是行之有效的，当然可以反映到宪法中去。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宪法中要肯定这一点。要建设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四个现代化，特别是高度民主、高度文明，过去没有反映到宪法里，这次要反映进去。“四人帮”搞的不是民主，实际上是提倡无政府主义，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发作。所以，什么叫民主，民主和法制的关系是什么，这些要弄清楚。我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同时也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若是民主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还有什么社会秩序、社会安定和社会团结？所以，没有法制不行。我们历史上的缺点就是法太少。还有精神文明，就是社会风尚，人民的理想、道德，精神面貌，包括讲礼貌在内。这些很重要。“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年轻一代人的思想混乱，其中一点就是盲目崇拜西方。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精神面貌、道德风尚是很好的，人民有理想、有奔头，着眼于更远的目标，照顾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照顾左邻右舍。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文明，我们在延安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大家过得非常愉快，什么困难也压不倒我们，我们把它叫作“延安精神”。六十年代初，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我们下放了职工两千多万，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当时，我们物资非常贫乏，商品严重短

缺，但人民精神面貌很好。三年调整是非常困难的，但很顺利地完成了，而且把欠苏联的债也还清了。回想历史，感到精神文明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搞四化，情况会逐步好起来，但是好起来也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实现四化是相当大的目标，要相当长的时间。本世纪末也只能搞一个小康社会，要达到西方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要再加上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恐怕要到二十一世纪末。在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中，还不能浪费，不能把经济发展的成果通通分掉，那样再生产、再发展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们要教育人民，生活只能逐步改善。如果没有远大的理想，只追求物质享受，以后的发展就没有希望。这也属于精神文明范围的问题。关于经济改革，我们现行的政策就是解放思想，从许多束缚中解放出来，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中国农村实行这个政策以后，普遍好起来了。他还说：人民公社建立以后，我们已经感到“一大二公”的目标并不是很快能实现的，那时毛主席还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后来毛主席经过多次调查研究，提出要搞三级所有制，即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以生产队为基础。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公社制度问题，这还是一个探索的问题。现在的中心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概括起来就是建立责任制，在建立责任制的基础上真正体现按劳分配。农村的经验今

年要推广到工厂，现在凡是那样搞的，都见效。这就关系到农村和工矿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

9月19日 观看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的合成军军事演习。在检阅演习部队时发表讲话，强调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10月2日 会见意大利众议院议长约蒂。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台湾问题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统一大业的事情。叶剑英委员长最近阐述的九条〔1〕是我们根据现实情况提出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合情合理的方针政策。这九条在国际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反应，也一定会得到台湾人民的赞成。

10月28日 会见由会长茅诚司率领的日中协会第三次访华团。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台湾当局总是讲凡

〔1〕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九条建议和主张。

是搞统一、合作，都是他们倒霉、吃亏，共产党占便宜，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两次国共合作，对彼此都带来很大好处，主要是给民族、给人民带来好处。第一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北伐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符合民族利益、符合人民利益，也合乎两党利益。第二次合作是对付日本军国主义。抗战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也合乎两党利益。合作后来破裂，破裂的责任，我们不去算老账了，实际上两次破裂的责任都在国民党方面。他们又讲，两次他们都吃亏，这不对。我们不去算这个账，要从长远的观点，从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着眼，也要从世界和平和安全来想，去看待第三次合作的需要。

11月2日 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我们对台湾的九条建议，现在台湾的反应是拒绝了，我们知道，它的第一个反应会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昼夜就可以解决的，需要时间。我们并不想“屈人之兵”，我们绝不是要使台湾处于投降、屈服的地位，我们提出的是对等谈判。相信总会有变化的。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但美国卖武器给台湾，实际上就干预、插手了中国的内政，给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造成了障碍。美国国务卿黑格六月来访问时，我同他说，我们的头脑中始终存在着中美关系可能停滞或者后退这样一个问题。导致停滞或者后退，那

不是中国干的事。我们的话说得很明白。至于台湾问题，我相信美国，还有日本以及其他很多朋友都可以做好多事情，来推动谈判。就美国来说，促进这个谈判，至少是推动接触，实际上就是维护亚太地区局势的稳定。而出卖武器、装备台湾，是出于什么意图呢？实际上是否定了我们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这对全球战略格局是一种破坏，至少是一个损伤。

11月11日 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书记丘拉菲奇。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内的政治生活总的说是很好的。“文化大革命”和过去长期的“左”的指导思想反映在各个方面，还需要纠正。这需要很多时间。我们很高兴的是，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见效了，特别是在农村，农业情况不错。工业方面问题还多。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官僚主义，它反映在我们上层建筑臃肿不堪，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耽误事情。这些弊端有它的历史原因，因此要纠正可不是简单的事。现在正在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用简单的改良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恐怕不行，但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事业很难顺利发展。我们正准备着手采取比较有效的办法，甚至以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干部对这个问题有共同的认识，这是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我们国内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青年人的教育问题，资产阶级

自由化倾向的问题，“左”的错误还没有完全肃清的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上层建筑的改革问题。只要我们下决心把上层建筑的问题解决好，以后的步子会走得比较顺利。

11月13日 会见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雅奈科维奇。指出：我们一直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从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我们党和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理论，特别是在党的作风、路线、方针、政策方面。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时代，从哲学到政治、经济以及党的建设方面，毛泽东同志有很大的创造性。但是，很遗憾，他晚年犯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本身也违背了他过去的思想。现在我们所做的就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自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强调的是集体领导。特别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根据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新情况，提出新问题，是有些新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当然，也不否认个人的作用，比如说，我个人在里面起了我自己应该起的作用。许多具体政策、具体问题，有的是这个同志提出的，有的是那个同志提出的，并不都是我一个人提出的。可以这样

说，问题都经过集体讨论，最后是集体决定的。我们也有一条经验，个人干预问题过多并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也与此有关。他还说：一九七四年，周恩来总理在病中，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我主持起草的，这是一个转折，即要把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方面来。过去由于各种干扰，特别是政治运动的干扰，始终没有贯彻下去，形成了历史上的曲折。现在我们说，除了国际风云发生激烈变化，例如发生战争之外，我们始终一心一意搞建设。这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情，至少要三四代人来干这件事。这个转折是我们一九七八年底的三中全会实现的。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转折，而是整个党、国家和人民的转折。

11月17日 会见美国财政部长里甘。在谈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时说：我们冷静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根据现在的情况到本世纪末，可以实现一个“小康之家”的现代化，我们不能主观地求快。一九七八年我们设想可以搞快一点，但我们想错了。因为中国底子薄，人口太多。所以，我们紧接着总结了经验，提出搞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基础不能同西方比。日本大平首相一九七九年访问中国时向我提出，你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个什么样的现代化。我想了一下，说，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千美

元。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就要超过一万二千亿美元，因为到那时我们人口至少有十二亿。现在我们经过摸索、计算和研究各种条件，包括国际合作的条件，争取人均达到一千美元，最低达到八百美元。中国底子薄，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这个目标不能达到。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新提法就是建立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谓高度文明，就是人民要有理想，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要守纪律，要有道德，要坚持我们历来的艰苦奋斗的传统。否则我们的事业是不会有希望的。这件事不容易。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文化大革命”前是很好的。那时我们是延安传统、延安精神。我们在延安时，什么都困难，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棉花，穿衣服都发生困难，连盐、火柴都没有。就是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自己拿锄头开荒，种粮食，结果所有的困难都克服了，过得很好。那种精神现在中国仍然需要。

11月19日 在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第一副总理扬·丁卡时说：现在我们农村的情况最好。农业政策的见效主要是把权力下放，使生产队有自主权。这几年并没有增加机器，也没有增加投资，但政策对头，农民收入确实成倍增加。农业生

产实行因地制宜，尊重科学，同样是一块土地，收入就会增加三倍甚至四倍。过去把吃大锅饭理解为社会主义，农民的眼睛就看着国家，困难了，靠国家补助。工业方面，根据农村的经验，我们也在逐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加强生产责任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特别是工业管理体制不好，人也太多。现在我们考虑照顾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要考虑到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适应，也要考虑到长远发展的利益，为以后打下更好的基础。

11月23日 会见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兼国际事业部部长金永南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在谈到国内情况时说：我们国内总的情况是好的。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体制改革。现在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是发展而不是减少，解决问题困难重重。问题不仅是中央一级、省市一级，企业也有这个问题。企业改革首先是企业体制改革。一个企业本来一千人就可以了，可它有两三千人。现在我们准备把企业改革一下，该多少人就多少人，多的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安排学习，工资照拿。我们开始试验一些方式，这样做的都见效。这也要花时间，要做大量的组织工作，主要是大量的思想工作。不过，现在大家不管对自己有什么影响，赞成不赞成，对通病有共同的认识。但

治这个病用什么药就复杂了，太急的药不行，太温和的药也不行。

12月12日 会见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副书记、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主席科隆博。在谈到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问题时指出：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是梵蒂冈与台湾的关系问题。如果梵蒂冈解决了这个问题，承认一个中国，我们同梵蒂冈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第二，是梵蒂冈必须尊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独立自主、自传、自办教会的政策，这是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必然要提出的政策。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教会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在谈到国内情况时，他说：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要注意避免两极分化。要逐步增加人民收入，不允许产生剥削阶级，也不赞成平均主义。这涉及吸收外资问题。我们欢迎外国来中国投资、设厂，这里面有剥削，但这只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补充。西方有人认为我们放弃了基本立场和信仰，这不确实。马克思主义有很多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贫困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以前我们犯过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错误，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

1982年

1月1日 会见由财政部长亚拉为团长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时指出：我们以往的错误常常是过急，“左”的东西多，不是量力而行，而是超过了客观条件。急着摆脱贫穷落后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经验值得总结。要根据本国的特点制定发展政策。只要政策符合实际情况，经济发展就可以快一些。这几年，我们总结了经验，发展经济不那么急了，发展速度实际上较过去还快些。发展速度不能光看增长了百分之几，而要看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调整经济就是要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在谈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与发展问题时指出：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自己也是一场战斗。超级大国、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都不希望我们发展。为了发展的需要，我们还是应该同它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实际上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局势的发展提出一个新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加强他们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开辟更广泛的合作领域。过去提出“南北”对话，“南南”合作是新提法，这个提法好，应该给发明者一枚勋章。不仅仅有“南北”、“东西”问

题，还有“南南”合作问题。“南南”合作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发展的方向。

1月11日 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那个制度。国家的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这不仅有利于子孙后代，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们是从这样的角度着想和对待这个问题。说什么“统战手法”，我们不搞。我们讲大政方针。没有这样的气度不行。

1月1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的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下面的干部。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所有老干部都要认识到，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

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亡党亡国。如果不进行这场革命,不论党和政府的整个方针、政策怎样正确,工作怎样有成绩,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党和政府的机构这样缺少朝气、缺少效率,正确的方针、政策不能充分贯彻,工作不能得到更大的成绩,我们怎能得到人民的谅解,我们自己又怎能安心?他强调:这个问题要涉及几百万人。问题很大。正因为大,工作就要做细。但是,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他还指出:这一次革命,不但要注意出的问题,还特别要注意进的问题。第一位应该着眼于进。包括军队也是这个问题最重要。选人要选好,要选贤任能。选贤任能这个话就有德才资的问题。贤就是德,能无非是专业化、知识化,有实际经验,身体能够顶得住。进,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轻的。精简是革命,选贤任能也是革命。出要解决好,更重要的是解决进。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邓小平的讲话,并于1月19日把这个讲话印发给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要求认真贯彻落实。随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工作开始进行。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2月3日—11日 解放军总后勤部召开全军绿化工作座谈会。会上传达了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指示:“军队在

植树造林中，要积极地多做工作，除搞好营区植树造林外，营区外十公里范围内，要与地方共同协商搞好植树造林。”座谈会强调，今年是开展全民植树造林运动的第一年，全军要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在植树造林中带个好头。11月，邓小平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题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这个题词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植树造林》的第一部分。

2月18日 在会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指出：我们正在搞体制改革。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必须消除。干部老化问题也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把它当作一场革命，当然这是对体制的革命，而不是对人的革命。从一个月的实践看，这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可以行得通。我们能够顺利地进行体制改革工作，是因为这几年我们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 and 政策的连续性。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差不多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算是第一个试验。

2月25日 在会见摩洛哥王国首相布阿比德时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根本方针是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摆脱落后状态。这几年所做的事都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并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这些政策已经见效。特别是在农村效果更显著一些。现在农村扩大农民自主权，提倡责任制，绝大多数地区收入成倍增加。

在谈到对外开放问题时说：中国将继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我们主要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吸收对我们有用的资金。但是，贪污、盗窃、贿赂、走私这些资本主义世界腐朽的东西决不能引进来。这些事在资本主义世界不奇怪。既然开放，接触多了总会有影响，问题是你能否消除这些影响。这需要有清醒的头脑，既不要大惊小怪，又要认真抵制，采取有效的手段包括法律手段，消除这些坏的东西。我们要提倡精神文明，在这方面我们有自己的传统，要教育我们的后代有理想，有道德，讲礼貌，守纪律，要艰苦奋斗。我们国家的每个人包括娃娃都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有民族自尊心，这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密切相联的。

3月25日 在会见巴西外长格雷罗时说：尽管我们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进步，但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看不起我们，想欺侮我们，因此我们要十分重视发展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在发展中国家都有些彼此可以借鉴的东西，这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在较新的科学技术方面，没有发达国家的合作不行，而在其他很广泛的方面，通过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却可以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解决。这对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一环。他还说：中国为推进四化建设，当前正在抓两件大事。一是搞体制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精简机构，就是“拆庙搬菩萨”。这件事搞不好，我们就

会丧失民心，四化也没有希望。从这两个月的情况看，我们的老干部顾大局，是经得起考验的。二是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不严肃处理，我们的开放政策就不能继续下去。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是提倡精神文明，提倡人民要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我们面临的问题成堆，有些问题很复杂，但是可以解决的。总之，中国的情况可以归结为两句话：一是很落后，二是有希望。

3月26日 在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时说：你与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有几十年了，从二十几岁与列宁打交道算起已有六十年了。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些经验，通过与你们合作，可以学到一些克服官僚主义的办法。美国有个最大特点是讲求实际，现在是不是比过去差一点了。你是第一个与列宁接触的美国人，从你二十三岁小伙子时看到美国讲求实际的精神。我们要把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到制定政策、实行政策的各个方面。过去空话太多，没有益处。哈默在谈话中提出，中国要把农业搞上去，就必须使用高效肥料。他还就同中国在农业、畜牧业方面的合作提出了意见。邓小平说：这些都是我感兴趣的事，特别是肥料。会见哈默后，他对陪同的煤炭部、化工部负责人说：肥料问题很重要。我们落实了农村政策，农业形势很好，但靠政策只能解决一段时间的问题，农业还要靠科学，要尽快解决肥料问题。

4月6日 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希思问：我记得一九七四年五月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时，你也在座，我们讨论了香港问题。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一九九七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一九九七年只有十五年的时间了，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香港问题的？因为很多人都要在香港投资，怎样才能使投资者不担心呢？邓小平回答说：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参加，可以作政府雇员嘛，甚至成为香港政府的成员都可以考虑。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到那时可能还保留护照。对英国来说，商业方面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还可以发展。在谈到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问题时，指出：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希思说：这个问题条约里写得很清楚。邓小平回答说：新界的租借，香港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

4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

并讲话。指出：《决定》是一个重要的文件。这是讲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实际上我们要看得更深一点。对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以来出现的经济犯罪活动，要有足够的估计。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应该提得更高一点，看得更深一点。现在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有一部分同志遇事手软，下不了手。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当作一般性质的问题来对待。现在刹这个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没有一点气势不行啊。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我们说不搞运动，但是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至少是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一天。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

4月16日 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

总统齐奥塞斯库。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我们除了对他骂我们的话表示拒绝外，对其他的我们表示注意到了。我们的立场在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里都讲了。我们重视实际行动。邓小平请齐奥塞斯库见到勃列日涅夫的时候带一个话，告诉他：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出它的军队也可以。先从一两件事做起，没有这样的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都不会赞成。关于党与党的关系，他说：每个党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现在采取向前看的态度，过去的事一风吹。毛主席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是合适的，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对一个小国，即使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就不一定合适，更不用说对发达国家了，那里农村人口只占百分之十几。欧洲问题欧洲人最了解，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人家犯了错误，让人家自己去改正。在所有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是不存在的，即使意见完全一致，表达的方式和程度也会不同。

5月6日 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向客人介绍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指出：我们现在正一心一意搞建设，力争经济有较快的发展。目前，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争取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这一政策已开始有些效果。但是，从

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再就是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搞工业，规模也不要太大，可搞些中、小型项目。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现在要发展经济，还是要靠自力更生、量力而行这个原则。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

5月8日 会见美国副总统布什。指出：一九八〇年你访华时，我们在交谈中主要谈了中美关系的一些原则，即中美关系不管你们哪个党执政，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要发展，而不要停滞，更不应该倒退。中美之间的中心问题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它是检验中美关系稳固性的准则。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可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两国关系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发展。《与台湾关系法》是发展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里根政府多次声称，只有一个中国，美

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但这要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来，首先是在售台武器问题上表现出来，因为这不仅牵扯十亿人民感情，而且是侵犯中国主权、阻挠中国和平统一的问题。美国领导人要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可以商量，公报的措词可以研究。但我们一定要达成谅解或协议，内部一定要肯定这一点。在讨论中，你们要求把售台武器问题与台湾海峡局势联系起来，我在访美时曾对参众议员和卡特总统讲过，虽然我们制订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力争用和平方式实现台湾回归祖国，但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如果美国政府无限期地、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实际上是给台湾提供保护伞。

6月12日 在会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时说：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现在我们可以说能够安下心来搞建设了。搞建设是件不容易的事，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不善于管理企业，一些重大的政策可行不可行、可靠不可靠也还不是完全有把握。但我们慢慢积累了一些经验，比过去好一些了。我们想加快步伐，提高生产发展的速度，所以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对外开放的同时，也会进来一些西方不好的东西，特别是一些青年人，没有理想，觉得什么都是西方的好。青年的教育很重要。青年人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是危险的。这是关系到下一代的问题。

6月29日 会见马耳他总理明托夫。当明托夫提出希望中国能成为不结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邓小平说：这我不赞成。千万不要想当什么头，兄弟关系、朋友关系比那个牢靠得多。

7月4日 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最近我有两次讲话，讲了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搞好现代化建设的四个保证。第一是体制改革，目前进行机构改革。第二是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三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或者叫打击经济犯罪分子。第四是党的建设，党的组织和作风的整顿。这四件事情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长期搞下去。我们不搞运动，但是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要坚持四个保证，一天也不要丢掉，要把它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工作和斗争。这四件事情当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有阶级斗争。邓小平就军队体制改革问题着重讲了两点。一是提高工作效率。军队就是提高战斗力。另外一点，体制改革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有利于选拔人才。过去那样臃肿，根本无法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干部年轻化，要当作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目标。不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我们交不了班，历史会给我们写下一笔。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

7月14日 在林业部党组关于飞播造林情况和设

想的报告〔1〕上批示：“每年四千万，为数不大。完全纳入国家计划。地方做好规划和地面工作，保证质量。这个方针，坚持二十年，可能得到较大实效。”

7月26日 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指出：集中使用资金势在必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苏联在这方面也没有解决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决心要下，明年就要开始。现在资金太散。我们历来解决困难，最后落实到集中统一。要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你们提出一批重大勘察设计项目，准备提前做好建设的前期工作，这件事要认真落实。要列出时间表，什么时间勘探清楚，什么时间拿出设计，专人负责包干，充分准备，并且要抓紧。大的建设项目要加快前期工作。煤、电、油这些能源项目，还有交通项目前期工作要抓紧，晚了不行。企业的技术改造计划要专门搞，这个工作量很大。有些要引进外国

〔1〕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对林业部部长杨钟说：小平同志很关心飞播造林，你们要认真抓好。为此，林业部党组作了专题研究，并向国务院作了关于飞播造林情况和设想的报告。

技术。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方面，因为经验还不多，要组织人专门研究，提出计划。在谈到科学技术工作和人才培养使用工作时指出：我看最难的是这一条。没有一套办法，怎么能把几百万知识分子骨干用起来？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起来。说缺乏经验，只有使用他，才能使他积累经验。体制改革，中心应当抓住两条。第一条是建立起管理体制、责任制，制定出规章制度、定额等等；第二条是解决好领导班子，选出“明白人”组成领导班子，这一条可能比第一条更重要。没有“明白人”出来当家，一个单位搞不出什么成绩出来。现在是应该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明白的时候了。衡量一个单位改革是否见效，不仅看它定了什么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看它选的人好不好，这是问题的核心，二十年规划能否实现，关键就在这里。现在要聚精会神把长远规划搞好。长远规划搞好的关键，是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这个谈话的一些内容与邓小平十月十四日同国家计委负责人的谈话要点整理为一篇，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

7月3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上发

〔1〕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稿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并决定把这两个文件提交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审议。

表讲话。指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这次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的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少，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些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

8月2日 在会见法国外长谢松时说：我们历来欣赏法国在国际事务中所采取的独立政策。这不是今天说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世时就是这么评价的。中国也奉行独立政策。我们之间对个别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区别，这没有关系，是正常的，不可能什么都一样。

8月6日 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时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做了不少事情。我们取得的第一个成就就是农村政策见效，农民收入普遍增加，农村空前安定。其次，我国在工业、商业等方面贯彻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看来这是十分必要的。特别要抓能源、交通，也包括通讯、科学和教育。我们要达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必须有正确的政策，光讲空话不行。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们的方针和政策。有一个问题是，到本世纪末，四个现代化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现代化这个名词很好。什么是现代化？一九七九年我回答日本大平首相说，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达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我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觉得可能一千美元还是高了一点，因为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所以我们把本世纪末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放在争取达到八百美元的水平上。到下一个世纪，再花三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包括对外开放在内的一些政策。我们要不断地利用自己的力量，也要利用国际力量。我们建国以后长期处于孤立的地位。几乎是关起门来搞建设。现在情况不同了，国际条件不同了，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同发达国家建立联系。但是不管怎样，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搞四个现代化，基本点还

是立足于自力更生。与过去不同的是，我们要充分利用国际条件，实行开放政策，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同许多国家在许多方面进行合作，其中包括改造我们现有的企业。在弗雷泽讲到目前世界经济很不景气时，邓小平说：关于市场问题，国际上有这个问题，中国不担心这个问题，中国有最大的国内市场。

8月10日 同邓颖超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陈树柏等人。在谈到中国的发展目标时说：我们提出二十年改变面貌，不是胡思乱想，海阔天空的变化，只是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变化，这是有把握的。本世纪末有了这个基础，再花二三十年可能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不能说超过。搞了一二年，看来小康目标能够实现。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跑得快一点。二十年翻两番，十年翻一番，但前十年翻不了一番，因为比例失调的情况严重。前十年要把比例失调解决，搞好农业、能源、交通、科学教育。其他方面不可能太快。农业第一靠政策，第二靠科学。在谈到精神文明建设时说：精神文明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是正确的，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世界上腐朽的东西、中国老的东西重新出现，而且已经出现。没有理想，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行，精神面貌可以直接影响物质。延安时候我们有什么？物质条件很差，就靠精神文明，靠有理想，靠坚强的信念，什么困

难都能克服。在某种情况下,这种精神有决定意义。

8月17日 在中美联合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发表前会见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他首先对中美联合公报即将发表表示祝贺。他说:我们很高兴公报的发表。有人把它称为第二个“上海公报”,这说明它是一个重要的声明,有极大的可能带来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但在执行这一公报中如果出现新的阴影,就会旧话重提。双方都已确定发表这个声明,在声明即将发表时,有些话说一说有好处。希望双方都珍视经过十年积累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他宣读了致里根总统的口信,并说:我这个人讲话从来不用稿子,但为了郑重其事,这次外交部还是给我写了这么一个稿子,是我的意思就是了。我想讲三点:一、公报只是一个良好的新的开端,但重要的还要看今后美国的实际行动。根据中美建交公报规定的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美国本来早就应该完全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由于考虑到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中方才同意逐步予以解决。希望售台武器能够逐步地但是明显地减少,能够尽早地停止,这对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都将有直接关系。二、关于台湾问题,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在公报里,中国重申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决不意味中国向美国或任何人作出什么承诺,也决不允许曲解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要以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为前提。三、中国重视中美关系,愿为

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与美方一起作出努力；但在两国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一片乌云，这就是《与台湾关系法》，希望美国能正视这个问题。

8月21日 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指出：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为什么现在我特别强调第三世界这一点，因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第三世界有特殊的意义。霸权主义的直接受害者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这就决定了有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他说：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是提出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从联合国的角度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

平。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中国的对外政策》。

9月1日—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1日，邓小平致开幕词，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简要地回顾了自中共七大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后指出：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八大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他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

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他重申了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提出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这个开幕词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这次大会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确定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十二届一中全会选

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决定他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9月8日 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尼克松十年前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所作的贡献表示赞赏。指出：你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到中国来的。反过来中国同美国改善和加强关系，也是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的。在谈到不久前发表的中美“八一七公报”时，他指出：当然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这个问题上，要看今后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应该冷静地承认，发展两国关系并不是没有障碍，障碍还很多。最大的障碍还不是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比这更具有长期影响的还是《与台湾关系法》。中美关系还有漏洞。应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来堵塞这些漏洞。真正从全球战略出发，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要做许多事情。中美关系发展，不只是在台湾问题上，还有全球战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贸易方面以及文化、科技合作方面，领域宽得很。关心中美战略关系，热心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人，还要做许多工作。十年来建立的这种关系来之不易。我们党的十二大肯定了我们的对外关系，包括对美国的关系。但问题是还要走着看。

9月13日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对中顾委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作了论述。指出：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

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他提出，顾问委员会的工作，总的说就是要按照新党章办事。顾问委员会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第二，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第三，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以身作则。搞精神文明，关键也是以身作则。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9月18日 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访问四川，在途中谈话时说：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才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他还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在谈到中国经济

发展的战略重点时，他说：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这是关键。“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一心一意搞建设》。

9月22日 从成都返回北京途中，在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关于建设二滩水电站问题时说：建设二滩水电站，已经讲了很久了，我赞成。不只二滩水电站，还有一批项目要上。要搞现代化，没有大的骨干项目办不到，没有骨干工程，小项目再多也顶不了事。这些项目，包括鞍钢的改造，都需要很长的建设周期，应该早一点动手。不要徘徊，一徘徊，一年两年就过去了。

9月24日 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指出：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他强调：中国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否则，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

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中英两国应该合作，共同来处理好香港问题。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后，在中国管辖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针对有人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他说：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我们对香

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9月28日 在会见日本首相铃木善幸时说：中日关系有很多话要说，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我们党的十二大强调这一点，说明是中国长期的国策。当然，中日两国也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的看法都完全一样。这也是正常的。类似教科书这样的问题今后还会有，还是要在相互谅解的精神下，继续解决发生的问题。在经济合作方面，我们希望能做更多的事。中国有资源，日本有技术，这个合作就了不起。我们历来强调，中日经济合作要从政治角度来考虑。这种合作单单在政府间还不够，民间也要进行，希望日本政府对民间多做一些工作。

9月30日 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说：我现在是把自己放到顾问委员会里边去，就是说，让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到第一线来。我退到第二线这样的事要早安排好。在谈到国内情况时说：实际上我一九七四年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主持了党和政府的工作。一年时间我就垮下来了。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这十年的波折启发了我们。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十一大又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继续过去的“左”的政策和思想，所以有两年的徘徊。真正的转折点是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二大肯定了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并将继续加以贯彻。十二大的最大特点是人事安排体现了三中全会政策的连续性，包括对外政策。这项工作还没结束，解决干部老化问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继续做下去，但要有耐心。

10月14日 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指出：哪些项目早上，哪些晚上，要有个安排，不能挤到一起。能早上的就集中资金早上，早上一年早得利一年，不然要拖到下个世纪去了。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在谈到科技队伍的管理问题时指出：我们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们组织和使用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第一位的就是科技队伍的管理使用问题。这个问题应当抓紧解决了。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在工资级别上破格提高。招聘也是个办法。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断涌现，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这条路还没有开出来，各行各业，包括企业，都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谈话的要点与邓小平七月二十六日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话的一些内容整理为一篇，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前十年为后

十年做好准备)。

10月22日 会见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指出：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很大，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双方都应该做些事情来恢复五十年代的友谊。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我看是不难解决的。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加强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他还说：我们很高兴第三世界的国家提出南南合作问题。当然南北问题也应该解决。第三世界仅寄希望于南北问题的解决是不够的，南南之间还要进行合作。在可能的范围内，通过这种合作总能解决一些问题。这些年来第三世界有一些发展，各国都有一些好的东西，可以相互交流与合作。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增进中印友谊，加强南南合作》。

10月24日 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谈到日本“教科书”问题时说：我们为什么对“教科书”问题这么注意？因为在“教科书”问题上有一个教育日本后代的问题。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实际上是用军

国主义的精神教育后代，这样，怎么谈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呢？所谓世代友好，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也不只是下一代，还有好多好多代嘛！所以，我们提醒日本，有那么一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兴风作浪，我们双方都值得警惕。

10月28日 会见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介绍了中国对核武器的政策：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二、达成协议，逐步减少、以至最后销毁核武器。邓小平说：我们有一点核武器是为了更有利于达到这一战略目标。核武器方面的合作是干不得的。我们可以在别的方面同超级大国斗争、较量，在核武器方面不能同他们较量。第三世界国家在这方面进行战略合作，有百害而无一利。

11月15日 会见前来北京参加中美能源、自然资源和环境会议的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指出：中国正在解决能源问题。要搞四个现代化，能源方面搞不好就会耽误。所以这次会议对我们很有益处。中国最多的资源第一是水力。第二大资源是煤，但是开采起来要花钱。我们准备坚持植树造林，坚持他二十年五十年。今年才算是认真开始，这件事情耽误了。特别是在我国西北，黄土高原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所以叫“黄河”，就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

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在谈到中国经济改革情况时，他说：工业方面的改革比农业方面晚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可以说现在才开始。人们头脑里的旧框框太多。但是农业改革会给工业一种启发。拿农业来说，强调了责任制，工业方面凡是向这方面努力强调责任制的，就都见效。我们三中全会强调要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我们提出要解放思想，但在当时有股思潮，有些年轻人以为解放思想就是要搞自由化。我们纠正了这种倾向。解放思想就是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农业问题的解决，农民自己总结：第一靠政策，包括因地制宜，实行自主权、责任制这些政策；第二靠科学。现在看来，我们的政策是对的，要继续贯彻下去。科学方面的潜力很大。中国不管怎样，由于人多，粮食还是首要问题。在谈到世界经济萧条问题时，他说：是不是有一个南北关系问题，就是北方的发达国家和南方一大批穷国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不管是这种形式还是那种形式，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取得的“发达”，总是带有对穷国、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关系。这个关系使得富的国家越富，穷的国家越穷。

11月20日 在会见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时说：中国同东盟各国搞好关系，不是权宜之计。发展同东盟

国家的关系是我们的长期战略。

11月24日 在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时说：这次会议是五届政协的最后一次会议。五年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统一战线工作和人民政协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局面。我们的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扩大了，不仅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还包括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前程远大，大有可为。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一切爱国的党外朋友们的合作，共同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开创爱国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为开创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12月8日 在会见约旦国王塔拉勒时说：中国支持阿拉伯人民事业的立场是一贯的。中东地区是世界上最敏感的地区之一。那里有丰富的战略资源石油，这是你们的幸运。但因此给你们带来了麻烦，那就是两霸争夺。麻烦和幸运联结在一起。我们都是第三世界，都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共同的经历。我们衷心希望阿拉伯国家能团结起来。一旦你们联合起来对付霸权主义的挑战，你们那个地区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在历史上，中

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都对世界文化作出过伟大贡献。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利害冲突，没有任何矛盾。剩下的就是友谊、相互支持和合作。中国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都是如此。

12月9日 会见美国莱曼兄弟公司高级顾问、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等。指出：我是主张中美交朋友的，这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尽管美方搞了许多小动作，但我们的这个方针和立场没有改变。两国关系正如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时所说的，合乎两国自身利益。这是一个基本的观点。维护和发展这种用十年时间建立的关系，关键是要互相信任。如果出现一些造成彼此不信任的事情，那就很难了。他说：中国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中国的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12月14日 会见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新增选的政协常委马璧〔1〕、范寿康〔2〕。指出：你们的行动要产生深远的影响。国家总是要统一的，你们带了头，这很重要。你们在内地要交点朋友。我们的风气也变了，过去“左”对交往造成困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清理了

〔1〕 马璧原任台湾《政治评论》月刊社社长，一九八一年回内地定居。

〔2〕 范寿康原任台湾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一九八二年从美国回国定居。

这方面的错误。讲话不要有什么顾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真正搞“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至于孙中山的研究问题还可以继续搞，有益处。有些文章北京不便发表，可以在香港发表。台湾讲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有各种解释，真正实现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是我们。你们会熟悉建国以来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熟悉这方面情况很重要，我们走的路是曲折的。现在可以说，三中全会以来走的路证明是对的，十二大肯定了，现在又体现在宪法中，起码到本世纪末，不会再有波折。人民害怕波折，波折会耽误我们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还叫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不只是名词好听，而是生产力发展速度要超过资本主义。现在看来有希望。小的波折还会有，小的错误还会犯，大的波折，大的错误不会有。只要没有大的波折，中小波折没有关系，不会妨碍我们沿这条道路走到底。关于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经过仔细研究是可能的。关键是重视科学，肯定这一点，就有希望。马克思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我们过去对这个思想理解得很不够。他指出：发展生产力是很重要的革命，改革上层建筑、改革体制也都是革命。体制改革要当成革命来进行。

12月15日 在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夫伦时说：中土两国以后要加强交往，增进相互了解，相互了解是加强

合作的基础。在全球战略中，土耳其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你们的位置最敏感。从沙俄时代起，土耳其就是沙俄南下的首要目标。你们那个海峡，一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个达达尼尔海峡，厉害得很哪！在讲到中苏关系时说：我们同苏联既然是邻国，争取改善彼此的关系这件事还是要做的，但要有原则。所以，我们恢复了中苏对话，但目标不是恢复到一九六四年以前的关系，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关系。就是说中苏关系改善的基础是，苏联必须改变以至放弃其霸权主义政策。

12月26日 在林业部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情况报告上批示：“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这个批示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植树造林》的第二部分。

1983年

1月11日 会见由总书记戈麦斯率领的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他说：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会谈我一直参加的，多数是我当团长，对手主要是苏斯洛夫，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们有我们的一套。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的那套东西是不行的，中心就是发号施令、以他们为主。我们有些东西今天看来也站不住脚。现在有两个问题他们还没有搞通，一个是平等相处，一个是独立自主。平等就是没有老子党。老子、儿子的关系实际上是否认了独立自主。国际共运历史的根本经验教训就是，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决定自己的政策，才能取得成功。列宁干成了十月革命，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他是根据俄国的特点来实行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根据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政策，所以干成了十月革命，所以有列宁主义。如果列宁不按照俄国的实际情况，而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语言，能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吗？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十月革命后国际共运中最重大的事件，如果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语言，而不是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把

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际决定自己的革命道路，采取自己的斗争方式，结果会怎么样呢？那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历史经验教训就是，一个党对别的党指手画脚是不行的。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道路和走这条道路的方式，这就是独立自主。犯错误是难免的，但犯了错误自己总结经验，这个经验才可靠。在谈到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时说：建设量力而行，这是我们的方针。宁肯速度不要太快，也不要欠太多的债，借债必须放在有能力偿还的基础上。

1月12日 同国家计委、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人谈话。在谈到计划问题时说：总结历史经验，计划定得过高，冒了，教训是很深刻的，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今后还要注意。现在我们要注意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年度计划定低了，而实际增长速度高出很多，会产生什么影响？对这个问题，要抓紧调查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总之，制定计划遵循的原则，应该是积极的、留有余地的、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在谈到粮食生产和农业翻番问题时说：一号文件〔1〕很好，

〔1〕指一九八三年一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指出，以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形式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政策问题解决了。农业要有全面规划，首先要增产粮食。二〇〇〇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要从各方面努力，在规划中要确定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农业翻番不能只靠粮食，主要靠多种经营。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在谈到如何看待目前出现的一些新事物时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月5日 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谈到两国之间信任问题时说：我们深感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人事变迁对美国政策的连贯性有很大影响。我们两国之间现在的问题是重新认识，是怎样才能建立相互信任关系的问题。中美关系要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相互信任。中美之间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台湾问题，一是技术转让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美国对台政策是否还存在杜勒斯的影子？中美关系一谈互相信任就要接触这个问题。关于技术转让，中国希望彼

此把对方放在适当的地位，中国不乞求任何东西。但中国人懂得，这样的问题是从政治角度来衡量相互关系的标准。现在看来并未建立起这种相互信任。在谈到中国政府不接受美国法律管辖问题时指出：湖广铁路债券问题，我们外长已交一份备忘录〔1〕给你，这是我们的最后态度，不会有什么改变了。如果中国承认了这件事，就等于承认了你们的治外法权，你们的法庭就要管着我们。中国不受任何外国政府、法庭、议会的干涉，不管后果如何，我们都不能接受。这些问题还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为好。还有胡娜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这是个危险的先例，此例一开，就会有连锁反应，最终会形成影响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如果跟你们一样利用法庭，我们可以举出一百多年来中国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那不是什么都谈不成了？我正式告诉阁下，美国法庭对中国没有用处。你们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对中国没有用处。《与台湾关系法》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如不改变此法，中美关系恐怕很难有明显的、满意的发展。我们希望美国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能够做朋友，建立比较长期相互信任的关系。

〔1〕一九八三年二月二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向美国国务卿舒尔茨递交了就美国地方法院对所谓湖广铁路债券案作出“缺席审判”一事的备忘录，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

2月6日 新华社报道：邓小平为纪念“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题词：“中国工人阶级要发扬二七革命传统，为把我国建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

2月6日—9日 在江苏省苏州市视察，了解苏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当听到苏州社队企业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得到成长和发展时说：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

2月9日—14日 在浙江省视察，了解浙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在同浙江省负责人谈话时说：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美元，社会是个什么面貌呢？吃穿没有问题，用也基本上没有问题，文化有了很大发展，教师的待遇也不低。浙江能否多翻一点呢？像宁夏、甘肃翻两番就难了。

3月2日 视察江苏、浙江、上海回北京后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指出：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他列举苏州例子，从六个方面说明实现翻两番后的社会面貌和发展前景。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现在看，担

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他还指出：搞经济协作区，这个路子是很对的。我主张不只是搞上海和山西两个经济协作区，也不要老是试点。经济协作有许多思想问题要统一，但现在要开步走。智力开发是很重要的，包括职工教育在内的智力开发。大专院校要发展。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

3月12日 到北京十三陵参加义务植树劳动时对中直机关干部说：“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

3月17日 在听取国家计委、经委党组关于当前经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汇报时说：一九八〇年那次关于调整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进一步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我记得那次我也讲了八个字的核心是调整。那以前，“左”，包括我们这些同志在内，头脑发热。现在看起来，没有那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八字方针，而且以调整为核心，就没有今天的形势。但是，现在我们又要避免出现头脑发热。既然一九八〇年那次会议以及以后确定的一系列对于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办法和一些具体措施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在谈

到集中资金问题时说：这个是非做不可的。不把资金集中起来搞一些骨干项目，搞再多的小企业、小东西，也解决不了问题，而这正是解决后十年的问题，因为所有这些骨干项目都是后十年用的。

3月30日 在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奥尼尔时说：随着美国政府的更迭，提出的新问题，就是存在着中美是否能建立一个相互信任的关系问题。从全球战略角度来说，中美有广泛的相似的地方，当然这不是说全部。我们两国都需要有一种政策的连续性。他说：我们已经宣布中国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实际不只限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以后都还必须坚持这三大任务。这是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考虑和坚持的三大任务。希望美国朋友充分理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充分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坦率地说，《与台湾关系法》还是杜勒斯主义的产物。美国人可能感到这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中国人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中国人看来，这不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吗？美国的议会通过一个什么法来强加给中国人民，这是什么主义？

4月1日 为北京育才学校编写的校史题词：“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

4月4日 在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案〔1〕上批示：“我看可以，兹事体大，建议政治局讨论。”

4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审议并原则批准了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修改方案。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指出：这个“十二条”，是我们下个月开始同英国谈判的基本方针。谈判首先要确定前提，就是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这个问题是不容讨论的。第二是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之后，香港怎么办？怎么样保持香港的繁荣？保持繁荣的办法就是若干不变。第三是从现在起到一九九七年这十四年过渡时期中，怎么保证香港不出乱子，双方都不做损害香港繁荣的事情，怎么做到顺利交接，确定香港人怎么样在各行各业，特别是政治、经济、法律、对外等方面逐步参与的方式。他说：谈判可能谈好，也可能谈不好，如果谈不好，明年九月，我们也要单方面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并同

〔1〕一九八一年初，邓小平指示：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和态度。请有关部门提出方案，并尽快整理出材料，供中央参考。遵照邓小平的这个指示，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等有关部门着手进行调查研究，于一九八二年三月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政策上报中共中央。邓小平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拟原则同意。方案待与各方面人士交换意见之后，再作修改。”后来中国对香港的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就是在这十二条政策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而形成的，并写进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时宣布中国收回香港以后的一系列政策，就是这“十二条”。“十二条”里面有个“五十年不变”，这样规定可以使香港人放心，减少他们的疑虑；可以使人们更感到我们政策的连续性、可靠性，有利于我们和英国谈判，有利于顺利收回香港和保持香港的繁荣。所以，“五十年不变”是个大问题。

4月29日 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指出：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一个党犯错误是难免的，就是犯了错误，也要由自己去总结，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样才靠得住。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四年多的实践证明，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当然还需要继续通过实践来加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5月11日 在会见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时说：“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给我国带来很多问题，很大困难，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考虑应该怎么办。但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两年又出现了徘徊，这两年基本上是“左”的思想作指导。直到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把局势扭转过来，制定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现在看起来，我们的路走对了。四年多来，中国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一月比一月好。但遗留的问题很多，总得要十来年的努力才能纳入正确的轨道。可以说，我们是有希望的，但还要走非常艰苦的道路。

5月22日 会见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在谈到国内经济问题时说：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比较落后。每年达到就业年龄的娃娃就有七八百万之多，解决这么多人的就业问题是不容易的。当然，我们的就业问题和欧美、日本的情况不一样。搞单一经济有很多问题不好办，很难解决就业问题，很难摆脱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我国农村过去十分贫困，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搞“以粮为纲”。当前，我国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实行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方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仅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农村面貌就大大改观，大多数农民开始摆脱贫困，成效是显著的。粮食不仅没有减产，反而有较大的增加。在谈到农村人民公社问题时

说：人民公社制度的试验也不那么理想。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与我国农村目前很低的生产水平不相适应。我国农村过去是“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治组织。现在我们把农村的经济和政治分开，但在实行过程中，要进行充分试验，逐步进行。凡是已进行试验的地方都证明，政社分开是正确的。他最后说：我们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本国的方针、政策、目标和计划。过去，我们没有这样做，犯错误就犯在这里；这几年成功，原因也在这里。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事情。

6月7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讨论计委、财政部提出的“七五”基本建设规模的初步测算和财政问题的会议上发言。在谈到重点建设问题时说：现在的状态是资金太分散，这样下去日子怎么能过？有些东西硬是要停下来，这可能要损失一些，宁可损失一些也要停下来。要搞重点。要想今后二十年能够搞上去，现在不搞重点不行。特别是能源、交通，现在不抓，以后其他别的事情想干也干不成。保证重点，要搞狠一点，这关系到以后的发展速度问题。资金，一个用到重点建设，一个用到老企业技术改造，这个路子是对的。技术改造问题也可以通过同东欧发展关系来解

决，他们好多东西比起西方更接近我们。中国这个市场潜力是很大的，我们越发展，市场越大。

6月11日 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局书记金正日时说：中国的特点是落后，贫穷，地方很大，人口太多，问题十分复杂。处理每一个问题，都牵扯到成千万以至成亿的人口。比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首先处理农村问题，这是牵扯到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问题。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在农业问题上的做法十分正确。同样，处理工人问题、干部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都要牵扯到左邻右舍，有时是要吵架的。在这次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基本建设项目问题，不容易解决，如果光照顾地方，那末国家要建设的大项目、要干的大事就没有钱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的问题很多。由于问题很多，我们要经常调整各种政策，要处理好执行这些政策的结果所引起的同其他方面的关系。即使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今后也还会有失误，不可避免地还会犯错误。不过现在我们可以说，今后我们可以避免犯大错误。当前，我们要集中力量抓好两件大事，第一是把经济工作搞好，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核心；第二是使干部逐渐年轻化、知识化。

6月18日 会见参加一九八三年北京科学技术政

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路子走窄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走回头路，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他说：打破“大锅饭”的政策不会变。工业有工业的特点，农业有农业的特点，具体经验不能搬用，但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

6月21日 会见民主柬埔寨领导人。在谈到中国统一问题时说：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有不同的社会制度，这是史无前例的。实际上，真正统一了，台湾一个制度，香港一个制度，大陆一个制度，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国家包含不同的制度，马克思没有讲过这个问题，我们大胆地提了，如果不这样设想，绝对不可能统一。这样的设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符合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精神的。历史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最好的是列宁和毛泽东，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把本国革命引向胜利，核心就是实事求是。

6月25日 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发表讲话。指出：为了照顾英国，我们谈判可能不从收回香港问题开始，而先从一九九七年后香港实行什么制度、什么政策谈起。这个政策充分照顾外国人首先是英国人的利益。不仅保护中国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外国人的利益也不受损害。他说：港人治港要有什么条件？只要一个条件，就是爱国者。什么是爱国者？赞成、主张祖国统一的就是爱国者。人们担心变。一九九七年以后我们谈的这一套会不会变？我们说不变。只讲不变还是空的。我们考虑定个年限，总是保持香港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有法律等等。我们先来个五十年不变好不好？五十年够长了。讲五十年比不讲年限好，更能使大家放心。今天讲的有一点新话，就是五十年。中国根基在大陆，不在台湾，不在香港。四化建设，香港出了点力。以后甚至出力更小也有可能，但我们不希望小。中国的建设不能依靠“统一”来搞，主要靠自力更生，靠大陆的基础。当然还要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资，但主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所以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不要担心统一以后大陆会向你们伸手，不会的。最近港币贬值是有人为因素的。我们一定要使英国人承担责任，不要做损害香港的事。在十四年过渡期内双方不要捣乱，文明点讲，双方都不要做损害香港繁荣

的事情。中国政府不会捣乱，英国人就难说了。谈判的焦点可能是这个问题。英国对我们一九九七年后的政策的可行性、可靠性问题明了了，确实相信我们一九九七年后的政策不变，问题就好办。香港要培养人才，逐步参与他们的管理，行政也好，司法也好，财政各方面都要参与，搞好交替。香港的爱国者要考虑怎么样推荐和培养一批合格的人，特别是年轻人，逐步参与，将来才能把香港管好。在过渡时期，中央政府还准备采取措施参与香港的经济活动。这是增强港人信心的重要措施。一九九七年以后北京不派总督，不派头头。将来香港采取什么形式，由你们香港人去定。名字叫特别行政区。我们派个小军队去，不要香港负担费用。

6月26日 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进一步阐明实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和

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

6月30日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主要讨论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问题。邓小平指出：这次会议应该解决的问题都提出来了，最重要的是集中。一个是集中资金搞重点建设；一个是集中精力搞技术改造。体制改革是为了实现这两点。在谈到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时说：我们提出翻两番，每年增长多少，都必须是没有水分的。如果“六五”达到百分之六以上的速度，“七五”达到百分之七以上，而且在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等方面为今后十年打好基础，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那我们就能更有把握地说，后十年达到百分之八以上是可能的。这并不是冒险的计划，而是讲求实际的可行的能够达到的计划。但是，搞得不好，有可能改变十二大的决议。那就严重了！这不但在国内是个政治问题，在国际上也是个大的政治问题。不搞重点建设没有希望。能源、交通等重点项目，都是十年八年才见效的。比如三峡工程、长江上游的二滩工程，应

该搞哪个，不要再犹豫了，犹豫一年就多耽误一年。外国人说我们翻两番靠不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计划中电力只能翻一番多，光这条就断言我们翻两番要落空。我们加强了这方面。如果不搞点重点，到那时什么也上不去。所以这个决策十分重要。在谈到加强财经纪律问题时指出：这几年我们暴露出很多问题，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我们过去提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是正确的，但是必须有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政策，这个不能变，要变，只能是越变越开放。另一手是必须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后来加了个“其他犯罪行为”。这件事情，一年多来我们做得有成绩，但不能说做够了，手不是那么狠，以后还要经常注意。书记处、国务院把这件事作为经常性的工作，我赞成。这本来就要一直贯彻到底，不能松，但是，如果作为经常性的工作就没人管了，就等于不搞了，那不行。要强调财经纪律，有些违反纪律的行为，本来是犯罪行为，现在我们没提那么高，因为有些事情我们没有讲清楚。这次讲清楚以后，就要提到法律的角度来看问题。我看经济立法工作还要加强。在谈到人才问题时指出：经济方面、体制方面的改革问题很多，但是有个核心的问题，就是选用人才。事情总是要人做。我们好多事情就是领导人不得力，浪费很大。所以选人要选对。一个企业改造得好不好，就看选人选得对不对。再一个问题是

要加强责任制。选对了人，还要叫他承担责任。选用人才同搞责任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还提到各地都要学习引滦工程提供的经验。就是注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利用各方面的力量，包括军队的力量，只要能为国家省点钱的，都可以用上。他说：不仅引滦工程军队出了力，植树造林军队也出了力，而且成绩不小，其中包括空军飞机播种在内。这个事要坚持他几十年。

7月1日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文选》收入了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一月至一九八二年九月期间的四十七篇重要讲话、谈话，多数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12日，中共中央就学习《邓小平文选》问题向全党发出通知。通知指出，《邓小平文选》系统地反映了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党的这个伟大转折时期的历史，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由来和发展，认识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主要内容和主要保证，认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新成果。通知强调，学习《邓小平文选》，是即将开始的全面整党的重要思想准备，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学习的领导。

7月8日 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提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同东欧国家合作，也有文章可做。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

7月19日 在北戴河同公安部负责人谈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问题。指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主要原因是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他强调：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7月27日 新华社报道，中央领导人最近题词号

召向朱伯儒同志学习。邓小平的题词是：“学习朱伯儒同志，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8月1日 在“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展览”上，展出了邓小平的题词：“发扬我军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日，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展览”上，展出了邓小平的题词：“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

8月27日 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在谈到中苏关系问题时说：昨天安德罗波夫发表了一个对外政策的讲话，讲话的末尾说，中苏关系的改善不能涉及第三国，这就把改善中苏关系的话统统推倒了。我们提出，要改善中苏关系，必须消除三大障碍。它侵略阿富汗，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苏边境摆了一百万军队和三分之一的导弹，还在蒙古驻军，这些都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这是第三国吗？所以通篇讲话中，仅这一句就拒绝了中苏谈判的基础。中苏关系的前景，我还看不出来。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根本的问题。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始终着眼于用和平方式。最近我出面谈了一篇和平统一的方案，实际还是过去的九条，内容是一致

的，只是更具体、更明确一点。我们的底全部亮出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要做损害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事。现在美国继续售台武器，卖得那么多，这就是损害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一种动作。美国作出的决定，实际上是不希望中国统一。现在大陆和台湾统一的条件是有的。中国统一了，对世界和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少太平洋会比较太平。从全球战略角度来看，美国究竟把中国摆在什么位置还没有搞清楚。美国决策人曾一度说，中国只能起地区性的作用，对全球无足轻重。我们对这样的判断并不在意，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中国看成是了不起的力量，但是我们也不认为中国对国际安全和稳定是无足轻重的。美国要真正同中国改善关系，必须从全球战略来认识这个问题。如果始终抱着杜勒斯主义不放，把台湾当作美国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中美关系迟早要破裂。希望美国在决策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战略利益，不仅是台湾问题，而且在处理其他问题上都要从战略角度来考虑。

9月2日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举行庆祝成立三十一周年大会。邓小平题词：“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设得更快些更好些。”

9月10日 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在谈到国内问题时说：农业问题同工业问题不一样，工业问题更复

杂。农村的责任制可以用到城市，用到工业。但基本经验还是要城市自己来积累。现在开始一些试点，还是有希望的。这不能一哄而起，要走一步看一步。现在，有些国际朋友感觉到我们搞得慢，提高效益好像不那么显著。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太快不行。我们过去的失误都是由于走得太快。就拿农村政策来说，过去由初级社到高级社就是太快了点。其后，又由高级社进到人民公社，现在看来不是一个成功的试验。工业方面搞“大跃进”，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错误。粉碎“四人帮”后，我们也想快点，现在看来我们是错了。我们过去许多东西是学苏联的，当然有些东西不错，那是就当时的水平来说，但基本的经验是不成功。我们经常说积重难返，就是说时间太长，一下子很难改过来。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是台湾问题。这里的根本问题不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与台湾关系法》。只要这个东西存在，中美关系就有不知在哪一天破裂的危险。美国政府要修改这个法不容易，但美国总统有权选择对这个法执行到什么程度，如果像前一时期那样执行，两国关系就有破裂的危险。在谈到日本扩大防御计划问题时说：我们历来不反对日本拥有自卫力量，但应该有个限度，日本应该知道的历史。它现在已是经济大国，还进一步提出要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政治大国也可以，但军事大国的含义是什么？日本想在一

千海里内承担军事义务，性质就变了。如果那样，不仅中国，整个东南亚人民都会提出问题的。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希望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在香港问题上，希望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中国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不会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还有十四年，这十四年要过渡好，核心是一九九七年能顺利收回香港，不会引起动荡。比较顺当地交接对各方面都有好处。过渡期有个香港人参与管理的问题。参与管理，不当主角可以，但要开始知道哪些方面的管理。无论政治、经济、商业和金融方面等等，不知道怎么行，一下子拿过来怎么行！所以要逐步熟悉、参与，整个过程就完满了。他最后表示：希望本月二十二日开始的中英第四次会谈，英方不要再纠缠主权换治权问题，要扎扎实实地商量香港以后怎么办，过渡时期怎么办。这对彼此最有益处。

9月20日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在谈到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问题时说：关于“三种人”，很多地方都提出，“文化大革命”中间反复很多，情况很复杂，对于跟着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各有各的理解。这个问题，

话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实际上办起来也很好办。我同意这个意见：十年中间各种人都有变化，有的是越变越坏，有的是时好时坏，要进行历史的分析。一直坏到底的，和中间有变化的，政策上要有所区别。“三种人”大多数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年轻人，也有老干部，是少数。“三种人”容易辨别，实际上，其中大多数人的政治面貌，我们也都清楚。对这些人的能量，对这些人对于我们党的危险性、危害性，千万不能低估。对这些人绝对不能信任。

10月1日 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个题词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为景山学校题词》。

10月12日 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着重讲了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针对党内存在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问题，指出必须下定决心，用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进行这次整党，通过搞好这次整党，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他针对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的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

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抓到底。解决思想战线混乱问题的主要方法，仍然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他最后强调指出：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在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10月30日 在会见西班牙外交大臣莫兰时说：香港问题和直布罗陀问题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我们相

互都能理解彼此的立场。中英两国政府正在进行谈判，但谈判的前提是一九九七年中国必须收回香港。不管英国人怎么打算，到一九九七年必须收回。三个条约〔1〕都得作废。最近，英国人又提出，不讲治权，讲某种程度的参与管理，我们说，还是不行。英国人在谈判中搞了一些手脚，前不久港币贬值，这就是英国人搞的，这是一种威胁，这个吓不倒我们。我坦率地告诉了撒切尔夫人，如果在解决香港问题的十几年过程中，香港出现不能收拾的局面，中国政府将重新考虑收回的时间和方式。

11月6日 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他说：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制定了新的纲领、方针和政策，制定了新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1〕一八四〇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一八四二年签订《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一八五六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六〇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缔结《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一八九八年英国又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二百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九十九年，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期满。中国人民一直反对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个问题，未解决前暂维持现状。

新的思想路线是把毛主席生前正确的东西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谈到中国党的历史时，他说：我们很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老党。我们党的整个历史的确是光荣的，经过那样艰巨的斗争才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前毛主席的领导一直非常正确，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来说，的确是光辉的。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他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但是从五十年代开始，严格地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他的确是有些地方不行了。概括说来，就是一个“左”字。同一些老同志、党的骨干的关系也不好了。这样的问题不能归咎于毛主席一个人。因为这与党的生活和制度也有关系。延安时期我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建党思想非常好，但是没有形成一套制度。这样的问题还很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开始总结经验，注意制度改革，废除终身制，注意革命的连续性和后继有人等问题。在谈到党的思想路线时，他说：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两个凡是”展开了辩论。三中全会以前党内对“两个凡是”就有意见。一九七七年二月我住在西山，看到有关“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感到不对，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我的文选中那篇文章很短，题目是《“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我讲的意思很简单，按照“两个凡是”办事，我

就不可能出来工作。现在思想界有人抓我提出的解放思想，认为这就是自由化。我讲的是真正解放思想，也就是实事求是。当时我提出解放思想时，是指任何单位、地区都应该从实际出发，小到生产队，也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发展自己的经济，搞多种经营。不解放思想，什么事情只搬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词句和语言，我们进行的事业就不可能得到提高和发展。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时，他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还是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主要是这个问题。至于这个观点、那个观点，都可以争论。关于国际共运如何处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我们也改变了。对兄弟党，不要指手画脚，否则是很危险的。如果中国要对国际共运、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话，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国际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比重的增加，而且要体现在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

同日 在听取关于接待希尔和回答他的问题的情况汇报时，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有效。指出：不要专政不行，无产阶级不搞专政，社

会主义一天也维持不下去。无论那个阶级都搞专政，资产阶级也搞资产阶级专政。

11月23日 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理德斯克列斯库时说：战争的危險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讲了多少年了。但我看至少五年内打不起来。我们要利用这样的有利条件来发展自己，如果争取到十年不发生战争，那对我们是最有利的，看来还是有可能的。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总是利用时间发展自己。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各个领域包括工业战线很不协调，尤其是能源、交通。如果说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协调，那就是科学技术水平不能适应，人才不够。他说：根据我们总结的经验，发展速度定得低一点、争取高一点比较好。我们到本世纪末要翻两番，前十年增长速度低一些，后十年高一点。翻两番就意味着增长率是百分之七点二。我们这个五年计划因为要调整，要改变比例关系不协调的状况，所以只定到百分之五。去年、前年超过了，今年也会超过。但这个超过有水分。比如去年超过百分之六，但一些产品不适用，放到仓库里，没有市场，这等于是一种浪费，所以叫水分。八十年代还有七年。这七年我们要逐步解决企业的改造，特别是能源、交通方面。如果前十年能达到百分之六点五，到本世纪末任务就可以完成，也就是说后十年达到百分之八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是有信心的，有希望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快

五年了，这五年来增加了我们的信心。

11月29日 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谈到防止核扩散问题时说：我们不搞核扩散，我们也没有这个本事。我们的立场是要发展一点，但是有限的。我们的钱要花在工业、农业、教育和科学事业方面。从长远来看，中国拥有核武器只是象征性的。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花的力量太多，也会削弱自己。在谈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时强调：我们这样的一些国家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从六十年代我们就一直赞赏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七十年代，我们认为战争的危險主要来自苏联，当时我们同西方，包括美国、欧洲采取了更接近的政策，这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近几年有点变化，苏联还是咄咄逼人，但美国最近的几手表明，对美国也不能忽略。对美国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这几年它搞的几手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认为，有资格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没有别人。这是近几年我们对事物观察后的看法。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有利于争取和平。

12月1日 会见美国阿科公司董事长安德森后，邓小平对石油部负责人说：与美方合作开发南海油气田这样的好事，应坚决干，赶快干，一年可增加不少化肥产量，还可以把海南炼铁业搞起来，搞大一点。

12月22日 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指出：今年粮食、棉花产量提前两年达到了一九八五年的计划指标，这很好。我国农业这几年持续丰收，增长这么快，很简单，这对世界有震动。粮食多了，不一定着眼于出口，要着眼于发展饲养业。农业增产还有潜力，特别是科学种田方面大有潜力。今后要进一步提倡科学种田，还要大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我们有大量中学生，要把他们培养成土专家，让他们在农村发挥作用。雇工问题，先不要随便发表意见，现在问题还不十分严重，可以稍微缓一缓，等两年再说。关于集中财力，这是大事情，这是明明白白的东西，中央手上没有钱，就办不成大事，钱在地方手里，他就不一定听你的。中央财政收入要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利改税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件事能不能两年做到？搞能源、交通、钢材、水泥、木材等，都是十分重要的事情，该上的就得上，不搞这些，以后经济还是上不去。电力建设一定要超前一些。钱不够，要想办法借点外债。我们现在借的外债不算多，还可以借一点。多借一点没什么大的风险。经济发展，现在快点慢点并不重要，问题是有没有后劲，为以后准备得怎么样。“七五”、“八五”、“九五”能不能搞上去，我看要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能源，二是交通，三是原材料，四是智力开发。一定要抓好这四个方面的工作，这些方面的

骨干项目不上去不行。看来，宝钢二期要搞，能不能提前上，可否定下来？如果能解决三百万吨钢材，那也是很大的事情。对外谈判工作也要抓紧。也得有个谈法，不要因为舍不得一点小利而耽误了时间。小的方面可能受些损失，吃点亏，关键是争取了时间。三峡工程怎么样？能不能上？投资安排不可能那么准确，要安排得十分科学不可能，重要的是要争取时间，要把争取时间放在首位。这方面要勇敢点，太稳了不行。没点闯劲，翻两番翻不起来。从前三年的情况看很有希望。这几年要争取时间，把企业改造好，整顿好。基本建设要很好总结，运用京秦线和引滦工程的经验，集中力量，缩短工期。过去修建人民大会堂也是这样做的。在谈到出国问题时说：现在出国的代表团太多，好多是游山玩水的，能不能归口管起来，把出国的审批权收回来。当然，要管得合情合理。对出国人员要实行责任制，出国一定要办成几件事，不是出去游山玩水。

1984年

1月24日—2月10日 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视察期间，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为珠海经济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2月11日—16日 视察上海。在听取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说：我这次看了几个特区，看了几个饭店。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现在我们的建筑体制，特别是住宅的建设，住房商品化，一下子还改不过来。我们的建筑施工速度慢得很，像蜗牛爬。我看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快，几天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法改了一下。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行。在谈到宝钢建设时说：宝钢二期必须上，不要等“七五”，今年就上。不上是个浪费，要争取时间。中国借二三百亿美元的外汇不会有什么问题，还得起。在谈到财政问题时说：现在一个大问题是中央财政收入少，大项目上不去。要恢复到中央掌握百分之七十，地方百分之三

十，方针已经定了，说是三年做到，可不可以两年就搞成。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些大项目就可以上得快一点，也可以给你们上海解决一些问题。这是历年来的一个矛盾。我作总书记时就是这样办的。要把地方的钱收一些上来。在视察建设中的宝山钢铁总厂时，为宝钢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在参观上海市微电子技术及其应用汇报展览时指出：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

2月22日 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

2月24日 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最近，

我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三个经济特区，还到上海，看了看宝钢，有了点感性认识。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他指出：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他还说：如果将来沿海地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有了条件，收入就可以高一点，消费就可以增加一点，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

3月14日 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在谈到同外国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问题时指出：政治问题上要维持和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对他们的理论、思想观点，我们国内不替他们宣传。他们自己宣传什么，主张什么，我们不作评论，不同他们争论，更不要像过去那样公开地批评他们。是对是错，由他们自己去判断。在

谈到翻译世界名著问题时说：这个工作很重要，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除了组织国内人力进行翻译，还可以在英国、日本、西欧分别成立编辑部，组织外籍华人和华侨中的学者进行这一工作，订立合同，稿费从优。在谈到改进大学政治课教学问题时说：在青年中发现和培养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现在发现的还少。大学、中学的政治课都要认真改进。在谈到农村问题时说：农村政策很见效，农村状况确实很好。我们要继续采取措施，使形势更好。在农村，我们终归还是要让农民搞集体经济。这个意见，我在一九八〇年有个谈话，已经收到我的文选里去了，文中说了四个条件。

3月25日 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去年我们两国领导人在东京作出了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到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在谈到两国经济合作问题时指出：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中日关系发展到现在的水平，我想我们双方都是满意的。但双方关系发展得还不足，两国的民间经济技术合作还很薄弱。我们欢迎贵国的大中小企业加强同我们的合作。希望日本政府对他们做点工作，劝他们看得远一点。现在到中国来投资，对日本的将来最有利。在谈到中国“翻

两番”目标时说：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翻两番分成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主要是为后十年的更快发展做准备。这种准备包括四个方面，一个是能源，一个是交通，一个是原材料，一个是智力。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很缺乏，所以必须坚持开放政策，欢迎国际资金的合作。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

4月18日 会见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杰弗里·豪。指出：我们已经多次宣布，一九九七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香港的现行制度五十年不变。我们采取这一主张是同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长远目标联系起来考虑的。解决香港问题是中英两国之间的事，与其他国家无关。香港问题只能由我们两家解决。双方的协议应该更原则一些，太烦琐了往往会出差错，不合实际，也会束缚一九九七年后香港特区的自治权。解决香港问题将是中英合作的一个范例，这不仅会增强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且会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

4月28日 在会见美国总统里根时说：和平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世界局势不稳定，但争取和平的前景良好。有资格发动世界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美国应从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中走出来，否则将同世界上

十几亿人口结成疙瘩。中美关系前一段吵了一架，近来是好的。但说中美关系已进入了“成熟阶段”，这种判断不准确。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还是台湾问题。希望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不要做使蒋经国翘尾巴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准备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一个国家有两种制度。海峡两岸可以从逐步增加接触到谈判和平统一。如果美国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对待台湾，不知哪一天，台湾又成为爆炸性问题。中国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利。中美两国在国际问题上有许多共同点，也有不少分歧。两国都有发展关系的愿望。希望两国领导人、政府成员更多往来，交换意见，解开疙瘩，较快地发展中美交流和中美关系。

5月17日 在会见厄瓜多尔总统乌尔塔多时指出：我看世界现在存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当今世界不安宁的根源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它损害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第二是南北问题。这是今后国际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发达国家尽管也有其经济困难，总的说是越来越富。而第三世界是越来越穷。解决南北问题是实现国际局势稳定的一个长时间、很重要的问题。发达国家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还不是靠剥削和掠夺？解决南北问题要求北方承担更多的责任。联合国提出建立国际经济

新秩序，这并不容易。人越富，越吝啬，要他让一点，他不肯。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走南南合作的道路。我们虽然很穷，但穷国之间的合作余地还是很大的，可以互取长处，不能把我们的命运完全放在发达国家的恩赐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多起来，积累起来，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范围的南南合作。

5月20日 会见由马尔科维奇主席率领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他说：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观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主席将它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实际制定自己的政策，同样也要尊重别的国家、别的党的实际。在谈到“左”的思想时说：一九五七年夏，毛主席发表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不幸的是在那中间开始“左”。反右是对的，但是扩大化了，犯了错误。更重要的是，从反右运动开始就出现了“左”的思潮。这时候实际上又否定了毛主席那篇讲话的论点。反右以后，“左”的思想扎下了根，后来导致“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后，我们还有两年的徘徊。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才明确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八个大字。在谈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指出：关起门来无法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要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要靠发展

生产力。贫穷、生产力落后，有什么优越性？要发展主要靠自力更生，实行开放政策能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补充。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曾经为人类文明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为什么后来落后了？就是闭关自守。在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就是用炮舰、火炮把我们打垮的。建国以后，虽然也有一段时期发展是好的，但是，使我们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也正是闭关自守。要总结这个经验教训。我们不仅对外要开放，对内也有个开放问题。现在西方反映，国内人民也是这样，就怕我们的政策改变。他们特别说我已经八十岁了，一旦我不在，政策就会变。我对他们说，改不改变不决定于我这个人存在不在，而取决于事情办得对不对。如果这样的政策导致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谁要改变也不行。

5月21日 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对李政道提出的关于在国内培养和安排“博士后”科技人员的建议，表示赞成。指出：“博士后”对我来说是新事物、新名词，我第一次听到。成千上万的人回来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对回来的人不晓得怎样使用。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很好。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十个博士后流动站太少，要建立成百成千的流动站，成为制度。主要是先定点，定了点后拨款，盖房

子，买些必要的设备。看准了就要行动。

5月25日 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强调：我国政府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请代表和委员们充分相信，只要按照我国政府的政策办事，香港问题是会得到圆满解决的，真正爱国的、爱香港的人是不会失望的。

5月29日 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但这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他说：中国的对外政

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国内建设》。

6月21日 在会见缅甸副总理兼计划、财政部部长吴吞丁时说：我们讲的最大的变化还是国内政策。国内政策的立足点就是搞社会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应该是生产力发展比较快的制度。建国后，如果说我们有错误，最大的一条就是不重视发展生产，所以我们国家落后了。我们国家在国际上虽有地位，但经济还不发达，这同十亿人口的国家不相称，也同我们在国际上应该承担的责任不相称。所以，我们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新的方针政策，就是一心一意搞建设。

6月22日、23日 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阐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指出：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

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政策不会变。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它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线索。在谈到港人治港问题时指出：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他提出：从现在起要逐步解决好过渡时期问题。在过渡时期中，一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二是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政府。这两次谈话的要点已收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6月30日 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构想。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十分重要。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我们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

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现在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在内。我们欢迎外资，也欢迎国外先进技术，管理也是一种技术。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他最后指出：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我们还要积累新经验，还会遇到新问题，然后提出新办法。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7月31日 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说：在香港问题上，我们非常关注十三年过渡时期，只要过渡时期安排好了，我们并不担心一九九七年后的事情。谈话中，邓小平提出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等五个方面的问题。他说：我们希望过渡时期不出现问题，但必须准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

问题。今后中英两国要更好地合作。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

8月25日 会见并宴请美籍华人陈省身教授和夫人。在谈到我国教育情况时，他希望海外科学家们要多多提出批评意见。他说：我们在教学上“满堂灌”的现象还存在，要多多鼓励学生自己发展。我们准备在这方面搞些改革，但不很容易，要慢慢来。

9月8日 在会见意大利参议院议长科西加时说：现在世界上有好多潜在的爆发点，还有一些地方存在着两国之间的主权争端问题。如果不根据新的问题采取新的方法，就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有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与日本有钓鱼岛问题，与东南亚一些国家有南沙群岛问题。世界地图上，南沙群岛历来被划为中国领土。解决这些问题，一种办法是中国按照历史，收回这些领土。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是否可以避开主权，采取与南沙群岛有关的国家搞共同开发的办法。中国是一个大国，要解决这些问题总要有点新的办法。世界上还有其他问题，比如英国马岛问题，现在并没有解决，联

联合国议程上还有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多得很。这些问题都可能是爆发点，解决的方式，或是战争，或是其他办法。和平谈判，就要双方相互让步。香港、台湾问题，从中国内部来讲，我们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想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和共同开发解决争端的办法，都是为了和平而不用战争方式，都叫和平共处。

10月1日 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阅兵和群众游行，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邓小平检阅部队并发表讲话。他说：三十五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彻底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陆续实行了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他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同时，要对全国现有的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要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各级教育工作，以及全体职工和干部的教育工作。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

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

10月2日 会见参加国庆活动的外籍华人科学家。他说：今天同你们见面，是对你们付出的知识和劳动表示感谢。为开拓新的局面，也希望你们今后付出更多的知识和劳动来帮助我们。我们现在还缺乏知识，你们是有知识的人，对中国知识的贡献要靠你们。我在昨天讲话中特别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在一些老干部思想中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所以要专门讲。这个问题很迫切。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比过去付出更多的知识和劳动。在谈到国内问题时，他说：不久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我相信在将来的历史上会表明它的重要性。会议的主题是城市改革。如果说开拓新局面是从农村开始，这次则是全面改革，包括工业、商业、科技、教育等，范围很广。改革是很迫切的。因为农村政策见效，农民好起来了，如果城市不进行改革，就会障碍农村继续前进，城市也满足不了占我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需要。城市改革要有更大的勇气。农村改革说明，城市改革不但必要，而且相信会成功。这就可以保证我国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在谈到“一国两制”问题时，他说：“一国两制”，

马克思没说过，世界历史上没有过，这是我们从实际遇到的问题即香港问题、台湾问题提出来的。大陆十亿人口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允许部分地区实行特殊政策，继续搞资本主义。这个政策不会变。他还说：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尽管一九四九年到“文化大革命”中间犯了一些错误，如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但不管怎么样，中国人在世界上不再是二等公民了。中国人有十亿在大陆这边。台湾有些人想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太不可能，太不现实，也太不谦虚了。

10月3日 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指出：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大前提，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爱祖国，爱香港，在今后十三年和十三年以后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大家共同努力，这个目标肯定可以实现。就我个人来说，我愿意活到一九九七年，亲眼看到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

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再一个是有些人担心干预。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益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我还讲过十三年的过渡时期参与的问题，参与也是一种干预，当然这个参与不是北京方面参与，而是香港人参与，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人参与。为了便于管理一九九七年以后的香港，在过渡时期后半段的六七年内，要由各行各业推荐一批年轻能干的人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甚至包括金融方面。他最后说：我们不是有个口号叫“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吗？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希望香港同胞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一九九七年政权顺利移交作出贡献。这个谈话的主要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10月6日 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阐述我国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指出：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

达到小康水平。这个目标，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我们的目标，不是很容易的。讲大话，讲空话，都不行，要有一系列正确的对内对外的方针和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定了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的政策，没有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成功。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这几年进行的农村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与此同时，我们开始了城市改革的试验。即将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由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可能会出些差错，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我们相信，城市改革也会成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写上很重要的一笔。在谈到开放问题时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

10月10日 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指出：过几天我们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这将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会。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他说：一九七四年你来访问，我们曾说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中国最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的力量合作。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

10月15日 为中国科学家考察南极〔1〕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

10月20日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1〕我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是一九八四年十月八日在北京成立的。这个考察队在南极半岛地区的亘古荒原上建立起了我国第一个夏季科学考察站，并开展对南极的多学科综合考察。

定》〔1〕。决定通过以后，邓小平在会上发言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有这么一个评价，但是要到五年之后才能够讲这个话，证明它正确。

10月22日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在谈到祖国统一问题时说：“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香港问题能够谈成，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有力量的、值得信任的国家。当然，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为

〔1〕《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任务、性质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指出要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在谈到国内建设问题时说：翻两番的目标肯定能实现。它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翻两番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要达到这个新的目标，离开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公有。国家富强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不断提高，这有什么坏处！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

会是资本主义。雇工问题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在谈到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这个文件最重要的是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0月23日 在会见突尼斯总理姆扎利时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但当时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的，近三年来又增加了新的内容，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南南合作，即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当前世界面临的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发达国家的前进也会遇到障碍。南北问题提出很久了，至今看不到解决的迹象，发达国家有钱但不慷慨。南南合作事业的发展可能会推动南北问题的进一步解决。

10月26日 在会见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时说：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

10月31日 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所以，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

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在谈到对外开放问题时说：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一些人理解只是对发达国家开放，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南南合作。还有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关系不好的也开放，共三个大方面。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

11月1日 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培养军地两用人才，也是个顾全大局的问题。他强调：要解决我们高层的老化问题，不要把这个矛盾留给后来人。提拔干部，过去我们讲台阶，按部就班地搞，现在要修正一下，要破点格。凡是看准了的人，要大胆地提升上来，把他们放到重要

的或者更重要的岗位。在讲到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我国的对外政策时说：我们现在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是维护和平的最好的政策。因为中国这个力量，加到任何一方，都会发生质的变化。我们说十年打不起来，包括我们这个对外政策的作用。最好的是我们现行的政策，这个最有分量，最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形势的稳定。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他指出：即使战争爆发，我们也要消肿。肿，就是表现我们指导战争的能力不高。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大家都很赞成军队减到三百万这个方案。减到三百万，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我希望用两年、三年的时间实现这个决策。在讲到改革开放问题时说：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

11月9日 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书记处书记巴叶塔。他说：自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五年内，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措施，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二是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在这两件事上，我们是胆大的，但不是妄为的。提出“一国两制”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即香港和台湾问题。这是从我国的实际需要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这实际上是一场革命。它是不是正确，归根到底是看生产力能不能得到发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得到提高。只要这条得到证实，谁也不能说我们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胡思乱想。为什么现在我们党通过了这一决定？近几年来，我们在农村进行了改革，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党已经决定国家和先进地区共同帮助落后地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避免出现两极分化（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出现新资产阶级），但这不是要搞平均主义。经济发展起来后，当一部分人很富的时候，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目前，有的雇工达二十人，有些同志就着急了。我说，不要着急，这只是个别现象，不必改变现行的政策，过几年再说。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有不少问题，首要的问题是物价问题。我们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干，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就总

结一步的经验，不妥当的就改。

11月20日 在会见挪威首相维洛克及其主要随行人员时说：我们五年前确定改革从农村开始。我们叫改革，实际也是一场革命，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我们在三十五年前搞了土地革命，那也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这次改革实际上是那次革命的继续，也可以说是继续和发展。城市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对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

12月19日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并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同撒切尔夫人谈话时指出：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人们担心中国在签署这个协议后，是否能始终如一

地执行，我们不仅要告诉阁下和在座的英国朋友，也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如果说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末在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他说：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我们对外开放二十来个城市，这也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反地，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是信守诺言的》。

12月30日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1〕送审稿上批示：“我看十条

〔1〕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针对农村生产向商品经济转化中还存在着种种不协调现象，为进一步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活跃农村经济，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等十项政策。

都好。”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这十项政策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出。

1985年

1月1日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出版发行。该书是继《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之后，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要思想，将邓小平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至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之间的重要讲话和谈话编辑而成的，共二十二篇。一九八七年三月又出版发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增补了邓小平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七年一月之间的重要讲话和谈话二十二篇。

1月4日 同一位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在听取了关于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情况的汇报后说：看起来大有希望。关于人才问题，可以考虑从香港，从东南亚、日本，从其他国家，请一批人来做顾问。任务就是教我们的干部怎么同外商打交道、怎么搞好城市的开放和管理。此外，还可以考虑选一两个地方、一两个学校，办对外开放专题速成班。沿海城市老企业技术改造的工作要有规划，主要改造哪些技术，应该规划好。要

有计划地展开对外经济活动。沿海连成一片了，这很好。要再加上闽南三角洲。

1月19日 会见以香港中华电力公司主席嘉道理勋爵为首的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在谈到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时说：这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本世纪内不能变，下个世纪前五十年也不能变。五十年以后中国同外国在经济上将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能断得了呢？有人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我们回答是，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如果真的导致了资本主义，那末，我们的这个政策就失败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比重将始终占优势。

邓小平在会见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后，专门听取了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关于电力问题的汇报。他说：电的问题，我主要关心后十年电是怎么安排的。二〇〇〇年前电要搞到多少，才能保证翻两番的需要。在谈到三峡项目建设时指出：三峡是个大项目，我们要从长远利益考虑，给子孙后代留下点好的东西。这是多么了不起，今后有意识地把工业项目摆在那里，可以帮助那里发展经济。成立三峡行政区是个好主意。可以把四

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1〕，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建设性移民的办法很好。可以发展乡镇企业，发展第三产业、旅游业，也可以搞经济作物，那里是亚热带，可以种柑桔。

3月4日 会见以五岛升为团长的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从政治角度和经济角度论述了中国的发展对国际社会是否有利的问题。指出：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他说：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

〔1〕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四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重庆直辖市管辖原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所辖行政区域。

题》。

3月7日 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题为《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指出：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去年，中央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世界都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现在，中央还要作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你们这次会议为中央作出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了准备。这个决定草案，我看是个好文件，这个文件的方向，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之后，又即席讲话，强调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指出：现在我们国内形势很好。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

五讲四美三热爱〔1〕，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他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

〔1〕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单位，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在联合发出的《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中提出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五讲四美”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在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中，中央总结了有些地方开展的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的活动经验，从一九八三年起，把“五讲四美”和“三热爱”统一起来，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强调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纪律里就包括这一条。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这个讲话和即席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即席讲话题为《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

3月25日 会见美国新闻界人士组成的“重访中国团”成员。指出：中国太穷了，同我们这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国家的地位不相称。我们有个雄心壮志，从八十年代起，到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小康社会。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八百至一千美元，说准确点是八百美元或稍多一点。这还并不富裕，但日子好过些。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实现翻两番，达到一万亿美元，在国力上就有较多的增强。那时我国的人口将达到十二亿左右。这个目标达到了，就为我们的继续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再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建设，我们就可以接近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办好这件事，要花七十年的时间，但这是我们坚定不移要

做的事情。如果在本世纪末，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实现翻两番，达到一万亿美元，中国就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多一点贡献。如果再花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末我们这个国家对人类的贡献就更大一些。我们有信心做好这件事情。

3月28日 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了我们已经遇到的一些风险。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他强调：两个开放，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这个政策不会变。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两个开放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改革需要继续开放。对于开放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不是盲目的。我们的方针不是收，而是继续放。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4月15日 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他强调：要实现经济发展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

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上。总之，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他最后说：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谈话的主要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

4月17日 会见比利时首相马尔滕斯。指出：西欧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有强大的技术力量，也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霸权主义要称雄世界，第一个目标是欧洲。要取得欧洲，不一定采取正面进攻，那是下策，可以从两翼包围欧洲，特别是从中近东着手，取得中近东的资源，卡住欧洲的脖子。正因为国际战略态势如此，所以我们的愿望是有一个强大、联合的欧洲。欧洲只有联合，没有别的出路。单独一个国家即使比较强大，也对付不了霸权主义。我们希望有一个强大联合的欧洲，同时也希望有一个执行独立政策的欧洲。欧洲只有在联合

强大基础上才能有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政策，分裂的欧洲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很穷，但我们可以不考虑任何内外因素而建立自己的独立外交政策。所以在此基础上，中国和欧洲可以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帮助。我们把欧洲的发展当作和平力量的发展、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也希望欧洲把中国的发展看作和平力量的发展、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主要靠自己，但也要靠朋友。为什么我们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就是为了赢得朋友，来加速我们的发展。这不单是中国自身的需要，我们不仅是从中国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也是从国际战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考虑问题。一九七八年底我们的三中全会制定的目标也就是从全球战略来考虑的。

4月18日 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在谈到中国同欧洲的经济关系时说：中国经济发展了，对外贸易也会增加。在我们的对外贸易中，欧洲应占相应的份额。在外贸上应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技术转让，欧洲在这方面比较开放，当然，这只是比较而言；第二个是双方都应开辟贸易途径。贸易总是一来一往的，中国买欧洲产品，欧洲也要买中国产品。中国买外国产品总要有偿付能力。你们在技术上帮助我们，我们的经济发展了，对外贸易也能随着发展。三年来，我们一直在考虑加强同欧洲的经济联系，这是作为一项政策来考虑的。希望

欧洲的企业界为中国商品进入欧洲市场创造条件。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加强同欧洲的经济联系》。

4月24日 会见美国汽车工会代表团和美国工会领导人访华团。指出：随着相互熟悉，美国工人和美国工会会相信中国工人和中国工会是可以打交道的，是可以交朋友的。同样，中国工人和中国工会也会感到，美国工人和美国工会是可以交朋友的。希望中、美两国工会之间今后有更多的来往。在来往中，把意识形态问题撇开，根本不去管它，就讲友谊，谈可以合作的东西。美国工会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力量，也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工会的社会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同美国工会不同，可能更大一点，因为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工人在中国的社会地位。我在法国呆过，知道西方对“专政”不容易接受。其实，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制度都是专政。我们还讲民主，讲民主和法制。现在还要扩大民主，并相应地加强法制。

5月4日 在会见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吴奈温时说：改革也包括军队，我们准备减少一百万军队，节省点钱来搞建设。我们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就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霸权主

义，维护世界和平。这符合世界人民的愿望，也是我们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这一方针，解决国际间的问题，解决我们同国际间的问题，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如香港问题、台湾问题。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了一个调整。我们过去曾说过建立“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国际上一切和平力量都是我们的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也不搞集团政治，不依附于任何集团。这一政策对于维护和平比较有利。

5月15日 在会见新加坡前总理吴庆瑞博士时说：城市改革涉及到各个领域，比农村改革复杂得多，也是有风险的。但是，我们有勇气，有信心，相信是会成功的，当然也很容易出偏差。去年十二月，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刚刚公布不久，就出现了多发行一百亿元票子的事。对我们来说这种事应当避免，但也难以完全避免。因为改革是新事物，而我们的知识还不够，鼻子不通，信息不灵。这样的事情出现后，国内有人提出了疑问，更多的人是担心。对这种事，我们应该十分注意，切实总结经验教训。但这也没什么了不起，还有可能再出现。倘若出现，发现要早，纠正要及时，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的事业顺利进行。我们自己一定要有必胜的信心，一定要有足够的勇气正视现实，及时地发现和纠正错误。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在不断地克服困难和纠正错误

中前进。现在正是改革的最好时机，搞好改革，不但会为九十年代，而且会为下个世纪我国经济协调稳定地发展奠定一个好的基础。他说：搞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是知识和人才。我们最大的弱点恰恰在这里，知识不足，人才不足。我们请你们来，就是请你们提供知识。不仅请你们来，还要广泛地请发达国家退休的专家、技术人员来帮助我们工作，他们来当顾问或到企业里担任实职都可以。

5月19日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他说：我们不是已经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吗？这个重点，本来就应当包括教育。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

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从去年十月以来，中央相继作出了三项改革决定。这些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

5月20日 在会见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时说：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在谈到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时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

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这个谈话的主要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一部分。

5月24日 在会见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多，走的路是比较曲折的。因为我们干的是一件新的事情，叫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比我们搞得早的有苏联，还有东欧。我们开始的时候搬它们的，看来它们的东西也并不那么成熟。即使是很成熟的，但毕竟国家不同，各有各的历史，各有各的政治经济状况、社会状况，照搬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成功的。当然我们有些错误不是照搬来的，那是我们自己犯的。有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自己搞得太急了，违背了事物的客观规律，要求太急就必然要犯错误，犯极左的错误。总结了这个历史经验，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底制定了一系列合乎中国自己情况的新的政策。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比较好地、比较快地

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但也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体中国人民。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中国也并没有被搞垮，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可能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十亿人口的国家，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又加上我们这个国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我们潜在的力量是大的，这也就是我们以后能搞好的一个依据。总之，我们还要去干，看来有希望。

6月4日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邓小平减少军队员额一百万的提议，讨论军队精简整编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讲话阐明了我国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转变。他指出：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

些分析，以及对我国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我们改变了过去“一条线”的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在谈到军队建设问题时说：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6月6日 在接见“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主席团全体成员时说：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关于人权问题，他说：什么是人

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二部分。

6月7日 在会见柬埔寨客人时说：九月，我们要开党的代表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七五”计划，二是讨论中央领导层的年轻化问题。两项议程中，主要是年轻化问题。十二大决定要开这个会。那时就想到进一步更新中央委员会。干部年轻化是世界性的趋势，越是现代化，越要年轻化。这件事要有决心，有勇气，我们做得不够。我们党是个老党，革命历史长，对革命有贡献的老同志、老党员比较多，趁我们这些人还在，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容易。

6月29日 在会见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时说：我们两国间在很古老的时候就有密切交往。中伊两国共同点很多。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需要发展自己，相互间的合作有广阔前景。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希望加强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把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生活逐步改善起来。伊朗也好，伊拉克也好，都面临着发展自己的任务，而实际情况是如果有和平环境，第三世界是能够很快发展起来的。我

们实在不希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自己消耗自己的力量，请阁下考虑一下，能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结束这个战争。如果为了结束这个战争需要中国方面做什么事情，我们是十分愿意做的。我们同你们是朋友，是友好国家，同伊拉克，同许多阿拉伯国家也都有友好关系。我们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过去不介入。但如果你们双方都觉得需要中国出面做什么事情，我们是很高兴去做的。

同日 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试验嘛。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这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农村见了成效，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的改革。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他说：要理顺各种经济关系需要几年时间。如果关系理顺了，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就有把握。我们要按价值规律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压倒一切的最艰巨的任务。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

卷，题为《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

7月1日 在会见泰国友好访华团时说：我们同东盟多数国家的关系是好的，但现在也有的国家对我们还不信任，他们认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威胁是中国。消除这样的错误观点，也许还要时间，但时间将证明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中国人口这么多，地方也不小，处理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还能去干涉别人的事情？诸位知道，我们真正忙的是怎样把自己的国家发展起来。这是我们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状况，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国家力量，这是很不容易的。关键是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没有和平环境谈不上建设。现在我们看到国际上可能取得一个和平的环境。我们希望有七十年的和平环境，以便实现我们自己的目标，在下一个世纪的三十年至五十年内，确切地说是五十年，逐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7月6日 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说：我们正在进行的主要是两大改革，一个是干部年轻化，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干部年轻化。有了大批年轻的、精力充沛的和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这两件事最关键。

7月11日 在听取中央负责人汇报当前经济情况

时，强调要抓住时机，推进改革。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他说：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否则，下一个十年没有希望。我们要抓住时机，现在是改革的最好时机。他强调：工业生产特别是出口产品的生产，中心是提高质量，把质量摆到第一位。乡镇企业也要抓质量。要提高质量，就必须改革。要立些法，要有一套质量检验标准，而且要有强有力的机构来严格执行。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抓住时机，推进改革》。

7月15日 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钱伯斯。在谈到一九七五年整顿时说：一九七五年，我主管了一年的工作，做了一点试验，在各方面进行整顿。当时整顿很快见效，各方面都有点起色，人民高兴，但“四人帮”不高兴。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新路。所谓新路，就是两个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两个开放的作用，就是加速或者说比较快地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我们叫社会主义社会

生产力。这是一种试验。不搞改革，不坚持开放政策，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关，这个关必须过。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是要坚持到底的，不会变化。变，就没有出路。任何这样的事情的结果无非是两个，一个成功，一个失败。我们相信会成功。中间一定会有曲折，甚至于犯大大小小的错误。那不要紧，有了错就纠正。这种办法不成功，就改一种办法。总之，要及时地、经常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回答钱伯斯提出的身体健康的“秘诀”时，他说：好多的朋友都问我。我的回答是“乐观主义”四个字，天塌下来也不要紧，总有人顶住。我是三下三上的人，没有乐观主义态度，没有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的思想，不可能活到今天。

7月16日 在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说：我们说要有理想，主要是两条。第一条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搞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条是爱国主义，就是要使祖国兴旺发达，使中华民族兴旺发达，具体讲就是把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搞好。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我们从青年时就干的事情。为什么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能坚持下来，就是有这个理想。那个时候天天准备杀头，还不是个别人，而是成百万成千万的人。有理想要有个内容，就是爱国主义，振兴中华民族，把我们民族发展起来。在谈到人才问题时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办什么事情都要有人。我们现在就是缺乏人才，在好多事

情上缺乏本领，各个领域都如此。现有人才不合拢来，丧失了可惜。

邓小平在会见前和会见后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时说：人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们有几万名留学生在国外，这是财富，要争取他们回来。我们要加强同他们的联系。一个是搞博士后的方法，一个是特区、开放城市招聘留学生的方法。把他们吸引回来，还要想更多的方法。博士后只是一小部分人，要从更多的方面来考虑。有许多框框束缚我们，要改革。招聘要有对象，有名单。要赶快搞规划。尤其是科学研究机构，现在就要去招聘。把最优秀的先招聘回来。所谓少讲空话，多做实事，这就是实事，要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人。最优秀的，招聘的条件要提高。

8月1日 在会见日本公明党第十三次访华团时说：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向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前不久我对一位外国客人说，深圳是个试验，外面就有人议论，说什么中国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变，是不是我否定了原来关于经济特区的判断。所以，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

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

8月21日 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他说：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至于吸收外国资金，这是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不用担心它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搞活、开放也会带来消极影响，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但有办法解决，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从政治上讲，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有能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上讲，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农业、商业和其他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

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

8月28日 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在改革中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

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用到自己的实际中去。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8月31日 在会见法国对外关系部部长迪马时说：

中国同法国的关系很早。中国人对法国有特殊感情，这有历史渊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创始人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是在法国受教育的，这包括社会知识的教育。我曾在法国呆过五年零两个月，在工厂做工近四年。我同工人关系很好，但你们的资本家也教训了我，使我和我们这批人受到教育，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并信仰马列主义。法国人民是非常友好的。

9月10日 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时说：我们正在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七五”计划期间发展速度不要太高，希望能保持在百分之七或八，实际执行的结果可能会超过。我们不追求发展速度，速度太快不利于均衡的发展，更不利于持续的发展。在谈到改革问题时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遵循两条最重要的原则，第一，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第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不会导致两极分化。在回答中国搞改革采用一些市场经济的办法会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的问题时说：我们的改革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我们欢迎外商到中国投资，允许一些个体经济存在，不会影响走社会主义道路。

9月14日 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在谈到

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时说：毛主席当时提出的国际战略有当时的历史条件。那时苏联在各方面都占优势，美国加上西欧都处于劣势，是很大的劣势。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性态势，而且是全球性进攻，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为了避免战争，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日本和欧洲同中国的关系也改善了。那时我们的判断也有缺陷，所以现在改变了。更大的原因是情况变了，如果现在发生战争就不只是来自一家了。我们现在的判断是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们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现在，我们对战争的判断和采取的政策比过去更妥当一些。现在不仅西欧在一定范围内采取独立政策，东欧也在一定限度内采取独立政策，这是十分可喜的，是国际政治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我们现在观察国际战略形势，不仅把中国看作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因素，而且把西欧和东欧也视为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制约战争的最大力量是第三世界，这些国家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有这么大的维护和平的力量存在，尽管仍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但如果我们搞得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本世纪战争打不起来，下个世纪和平就更有希望。我们在战争问题上由悲观变为乐观，但不

能掉以轻心，和平必须争取才能赢得。在谈到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时说：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我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但是，我考虑这对国际上是否也有些益处？我是指对和平会不会有点益处。维护世界和平最大的问题，是各国都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不依附于集团政治，同时，也要考虑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历史纠纷的方式。我们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不只是考虑到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中国与有关国家的问题，也向国际社会提出这样一个构想，看是否对和平有利，一切都着眼于维护和平。在谈到开放问题时说：只有对内、对外开放才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我国的力量。我们过去多年搞的是苏联的方式，这是一种僵化的方式，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都捆起来了。在国际上是闭关自守。所以，经济虽有发展，但速度很不理想，绝大多数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

9月20日 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不管怎样，现在台湾和我们还有共同点，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但如果蒋经国不在了，就可能真正出现两个中国。美国、日本都有一股势力支持台湾独立。我与里根、舒尔茨、温伯格都说过，中美关系的焦点是台湾问题，应该好好解决台湾问题，如果像美国国会那样干涉中国内政，将会在中美关系中引起冲突。蒋经国不在了，台湾出现独立怎么办？我们怎么能承诺不

使用武力？我同他们谈得很坦率，确实存在台湾独立的可能性。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但先把话讲明白好。

9月21日 会见以稻山嘉宽为团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在谈到中外经济技术合作问题时说：日本战后引进外国技术，主要是为了掌握和发展技术。你们的这一宝贵经验我们还没学好。这与我们的教育不发达有关系，现在我们是知识不够、人才不够。今后希望有更多的合作，并在这些合作中真正学到你们的经验。我们也要同欧洲、美国进行合作。在所有的合作中，都要学习这一点。在谈到中日贸易问题时说：要平衡才能持久，才能发展。平衡国际贸易，发展国际贸易，这也是一种知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要利用外资，包括借款。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欠了那么多外债，那条路我们是能走的。希望日本朋友在合作时帮助我们出主意，帮助我们进行技术改造，使更多中国的商品进入日本市场、进入世界市场，这样的合作才能够持久，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才有广阔的前景。现在世界上都注意中国市场，这个市场应当是有进有出的市场。确实，中国这个市场还有待开发。

9月23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

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在谈到“七五”计划时说：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在谈到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时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他强调：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

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教育入手。思想政治工作 and 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讲话最后谈到干部的新老交替和理论学习问题。他要求中青年干部接好老同志的班，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发扬起来。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敢于说真话，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要任人唯贤；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0月5日 会见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施特劳斯。在回答关于苏联的政策是否会有根本性变化以及中苏关系将如何发展问题时说：前一段相当长的时期，苏联的全球战略采取的是进攻政策，后来美国带头对苏联的进攻政策做了强有力的反击。近年来苏联得手不多。

苏联本身需要改变这方面的战略态势。苏联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情况迫使他们谋求改变。但如何改变，戈尔巴乔夫上台半年多了，还看不出明显的变化。总之，还要观察。从中苏两国关系来看，我们还要观察。我们有明确的标准，改善中苏关系存在三个障碍。这三个障碍无论苏联愿意先消除哪一个都行，愿意先走一步或两步都可以。如果苏联真正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走出一大步，它对和平就做出了贡献，不管走的是哪一步，边界撤军问题，柬埔寨问题，或阿富汗问题，对世界来说都没有坏处。在谈到美苏军备竞赛问题时说：我们不赞成“星球大战”计划。撒切尔夫人来时提了这个问题。我说如果里根把这个计划作为谈判的筹码我们可以理解，要真正干是干不得的。因为“星球大战”计划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在军备竞赛方面实现质的升级，不是量的升级。这可能导致不能控制的地步。两个超级大国不管哪个搞，我们都不赞成。这是我们对“星球大战”计划的态度。对苏联现在提出的削减战略核武器建议，国际反应不同，我们对此问题未研究清楚。有一点可以肯定，苏联对控制核武器竞赛历来的态度是小打小闹，这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对核武器问题有两项主张，第一，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第二，通过谈判逐步减少直至全部销毁核武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避免人类遭到毁灭。

10月9日 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请他给戈尔巴乔夫带个口信：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访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同志们也不让我出国了，但是如果同苏联能够达成这样一个谅解，我可以破一次例。为了这样一件好事，我愿意去。

10月11日 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时说：最近发生了日本内阁成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这些年我们没有给日本出过难题，而日本的教科书问题、最近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还有蒋介石遗德显彰会问题，是给我们出了很大的难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两国领导人都要经常注意避免出现这样那样的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一出现，人民就联系到历史。我们知道日本政府有自己的解释，但对人民来说，不仅中国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他们看问题要看事实，看本质。我说不但是中国，而且整个亚洲，包括东亚、东南亚国家的人民都有这个感情问题。所以，出于继续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愿望，我建议日本的政治家、日本政府的领导人和各位朋友关注这个问题。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那就不是现在这样的状况。这是真话。对日本方面来说，不做这些事没有任何损失，不做这些事也可以很平静地、很稳定地、持续地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真正达成谅解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10月15日 会见美国副总统布什，就中美经济贸易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就如何改进中国出口产品问题向在场的中方人员谈了几点意见。他说：中国产品打入不了国际市场，主要是自己没本事。要解决这个问题，靠这样的外交谈判根本没有用，主要要靠自己。能否增加出口，关键在于产品质量。出口产品一是要“新”；二是质量要“高”，“高”是指要达到国际水平；三是价格要“低”。靠这三条才能真正增加出口。要逐行逐业进行研究，可以搞一个研究机构。例如我们的芝麻、香蕉、烟台苹果，质量就很好。问题是运出的时间要快，现货现运，这也是个保证质量的问题。哪一个企业产品质量后退就关它的厂。通过改革，凡是不能改进质量的，就要打屁股。这样抓他十年，就有办法了。

10月16日 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纳塔时说：“尤里卡”计划〔1〕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赞成。他还说：我们两党都在搞试验，你们是在发达资

〔1〕一九八五年四月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一个多技术目标协调发展计划。这是在美国推行“星球大战”计划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欧洲科研协调机构”，加强西欧国家在尖端技术领域的合作，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缩小与美国、日本的差距。由于“欧洲科研协调机构”的英文缩写的读音与古希腊语中“尤里卡”（意为“有办法！”）一词相近，所以称它为“尤里卡”计划。

本主义国家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是在执政条件下探索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应该说，我们两党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勇于探索的党。

10月23日 会见以格隆瓦尔德为首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格隆瓦尔德问：现在经济改革，你们教育人民要致富，出现了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你们准备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邓小平说：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也不可能靠几个人讲几句话就见效。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有能力逐步克服并最终消除这些消极现象。格隆瓦尔德问：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

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这样做是否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呢？没有。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当然，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我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总之，我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化建设。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搞这些改革，走这样的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结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邓小平指

出：我们的政策是否有连续性，主要看两条。首先是看政策本身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政策对，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使人民生活逐步好起来，这种政策本身就保证了它的连续性。其次要看执行政策的人。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有一批勇于探索、精力较好的人。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

10月29日 会见联邦德国副总理兼外长根舍。在谈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问题时说：从赫鲁晓夫起，苏联一直在说大话，其中赫鲁晓夫说得最大。他说一九八〇年建成共产主义。一九八〇年已经过去了，就算是一九九〇年，也还只剩下五年。他的大话吹破了。不过赫鲁晓夫的大话有他的根据，就是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你也许还记得，赫鲁晓夫给共产主义下了个定义，就是“土豆烧牛肉”。那样的“共产主义”，欧洲不少国家恐怕在一百年前就实现了。中国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我们不讲大话，讲大话没有用。中国底子薄。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一九七九年底我们决定花二十年时间达到小康水平。那时中国将拥有十二亿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八百美元，将有一个中等的变化。我们设想，在本世纪末小康水平的基础上，再花三十至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目标。现在看来，本世纪这个目标肯定能实现，还会

超过一点。

11月11日 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谈到中国改革问题时，基辛格说：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你们的尝试是一个全新的试验。如果你们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邓小平说：不说是个伟大的试验，但确实是个重大的试验。我们的经验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必须改革，这是唯一的道路。中华民族不是低能的民族，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最终证明中国人行不行，还要看这十亿人口怎么做。中国落后许多年了，近几年可以看到一些兴旺的气象。更早一点的时候，在一九四九年，黄面孔的中国人站起来了，但是真正的翻身还要两代人的努力。

11月19日 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居内久时说：农村改革中的一大特点就是发展乡镇工业，乡镇工业兴起和发展了，才能容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否则农村人口都要往大城市跑。这是我们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看来，这个路子走对了。

11月22日 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谈到两国关系时说：我们两国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

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发展自己。要发展自己就需要加强相互谅解和相互合作。对付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就要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们中国在考虑自己发展问题的时候，提出了对外开放。向谁开放？当然要对发达国家开放，要从那里得到技术、资金和市场。但是对外开放一个重要的内容，一个重要政策就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开放。这方面我们过去做得不够。我们发现同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的领域是非常广阔的。第三世界人口最多，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我们相互变成对方的市场，这个市场就是世界最大的市场。我们在很多方面相互帮助，相互合作，彼此都有好处。甚至在技术方面，也不能说我们全都落后，我们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特点。

1986年

1月17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时说：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不能手软。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书记处抓整顿风气抓得好，建议狠抓两年，抓出成效。这件事抓好了，就可以真正促进改革和建设。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

2月2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听取中央机关端正党风领导小组的工作汇报，结束时他指出：不

管什么人，只要犯了法，都要按法律办事，党员还要按党纪处理，有的要开除党籍。现在我们的缺点是不够严格。对党员要更严格一些，不管多老的党员，都应该严格。因为我们法律还不完善，法律处理要慎重一点。但是党员的标准总是明确的吧！在这项工作中，把一些确实该开除出去的人清除出党很有必要，也是一个好机会，这方面不要软弱。在打击经济犯罪、刑事犯罪中，清除一批人不会犯错误，这样办可以纯洁我们党的队伍。总的来说，我们现在还是处理上比较软。要继续狠抓下去，我们要认真严肃地搞两年，人们对我们的信心，包括国际上的信心，才会建立起来。上海陈小蒙、胡晓阳那个强奸、流氓犯罪案判得好，党内外、国内外觉得我们有希望，但并不会因为这一两件事就坚定了人们的信心，还要看。我们就认真地做，证明我们不说空话。

3月5日 对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3月3日向中央提出的关于跟踪高科技发展的建议作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根据邓小平的批示，有关部门邀请部分科学家进行座谈讨论，讨论中对选择高技术项目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还是以增强军事实力为主，产生了不同意见。对此，邓小平4月6日作出批示：“我赞成

‘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10月6日，他在关于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报告上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如有缺点或不足，在实施中可以修改和补充。”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又称“八六三”计划〔1〕。

3月28日 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对这个政策有一些人感到不那么顺眼，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还有一个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现行政策不能变。他指出：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

〔1〕 这个计划中选择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一些领域作为突破重点，在几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水平。一九八七年三月，这个计划开始组织实施。

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拿事实来说话》。

4月4日 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然后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准备基础。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都是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服务的。他说：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

4月19日 会见捐资助学的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刚、王宽诚、霍英东、李兆基等，赞扬他们为国家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指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四化建设的实现要靠知识、靠人才。政策上的失误容易纠

正过来，而知识不是立即就能得到的，人才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这就要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长远的根本大计。现在我们是知识缺乏、人才缺乏。越往前走，这方面的问题越大。同发达国家比较，我们落后很远，但不是一切都落后。我们有原子弹、导弹、氢弹，同步卫星上天，通信卫星也可以出口。有和没有不一样，就是有这么几个东西，国家的分量就不同了。但是在许多领域还是落后，要急起直追。现在世界上科学技术发展得很快，美国搞“星球大战”，欧洲搞“尤里卡”计划。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多大，它代表了科学知识的飞跃前进。不只是在军事方面的作用，还可以带动整个社会工业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看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搞。在高科技领域里要投点资，投资不能太少，起码要做到在若干领域里，人家有的我们也有，不一定比人家更好，但要有。如激光、生物工程、粒子束、计算机等。搞这些要利用现有人才，将来香港人才也应该容纳在内，还有海外留学生、华人学者，希望他们出力。华人中有很多人才，如李政道、杨振宁，多几个这样的人才就好了。

4月23日 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在谈到中国的人口政策时说：中国对人口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从自己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我们力争在本世纪内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这是中国自己的一项重大战略决

策。美国国会干涉我们，说中国控制人口、节制生育不人道。他们希望中国不要控制人口，使中国永远处于落后状态。中国控制人口，使国家发展起来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4月24日 在会见香港知名人士安子介、查济民时说：“一国两制”是国策。香港有人担心这个政策靠不住。要使人有信心，就要做工作，要使他们通过实践相信“一国两制”不会变，我们在中英联合声明中作出的承诺不会变。信心问题最终要靠实践来证明，现在不相信，到一九九七年看到政策不变，他们就会相信，到了二〇〇〇年还是不变，他们就更相信，到二〇五〇年他们就完全相信了。“一国两制”首先体现在基本法，但基本法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要靠实践。有许多香港人主张基本法要搞得非常细，太细了不好，越详细越管不住。你晓得事情会怎么发展？总的来说，我们的政策没有变的理由，变了对我们不利，香港会成为国家的包袱，几百万人的生活怎么办？要靠国家来养这怎么行！变不得的。在过渡时期，香港是会有波动的，一九九七年以后，香港也还会有波动，不会平平稳稳。问题是不要发生大的波动，我们要做工作不发生大的动荡。小动荡可以预料，不可怕。英国人是要搞一些把戏的，这一点我们要清醒。福利主义不能搞，搞不起。香港问题解决的程序，第一是搞基本法，这是非常郑重的事

情。第二就是交接，要顺利交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体在基本法制订出来后，从一九九〇年开始就要认真搞参与，要有参与的时间，即中英联合声明说的过渡时期的后七年。参与，是香港人的参与。当然，也有中央政府的事。从现在起，四年内就要物色人，创造这些人参与的条件，做好准备工作。直接参加管理的人，要找一些四十岁、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一定要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参加进去，才能接得上。参与得好不好同接收得好不好是一回事。驻军是体现国家主权，是个安定因素。不要以为香港不动乱，等到发生了动乱再派军队，问题就严重了。有点象征性的军队，就可以防止爆发动乱。

5月10日 会见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在谈到中国的改革问题时说：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是互相联系的。城市改革的同时，农村改革还要继续进行。农村改革不仅使农民的生活明显好了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普遍出现了农工结合的局面，大办多种经营和乡镇工业，容纳了剩余劳动力。这是我们成功经验中很重要的一点。中国还有一个广阔的天地没有开发，就是第三产业。在谈到吸引外资问题时说：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是一个长期不变的政策，不仅要管这个世纪，下个世纪的发展也还得靠它。有人担心中国的法律会变，我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投资没有风险，我们会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如果法律不完善还可以补充。

5月20日 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克。他说：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就要消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还包括改革人事制度。过去的经济体制调动不了积极性，农村因为进行了改革，才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城市改革首先要权力下放，没有权力下放就调动不了每个企业和单位的积极性。国家发号施令少了，下面活动的余地就大，发展就会快。国家发号施令少了，上面的机构就没有好多事情可干，就可以精简了，就可以按才能合理地使用人才，减少官僚主义。中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影响至今还有，也要在改革中逐步消除。我们过去的经济工作背着沉重的大包袱，国家把什么都包起来，下面的积极性发挥不了。企业没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一切靠国家计划，没有主动性，吃“大锅饭”。企业没有权利，也就没有义务，权利和义务都在国家手里。企业对生产的好坏不承担责任，包袱都由国家背起来。如果改革成功，就可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现在我们满脑子想的是改革。城市改革每个措施都会影响到千家万户，每个家庭每个人都面临像物价一类的问题。改革中抱怀疑、等着瞧态度的人是有的，办法还是让事实去说服他们。

6月10日 听取中央负责人汇报当前经济情况。

指出：有两三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会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一是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到二〇〇〇年以十二亿人口每人八百斤计算，粮食年产量要达到九千六百亿斤。从现在起，每年要增产一百多亿斤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现在粮食增长较慢。我们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二是外汇问题。要研究多方面打开国际市场，包括进一步打开香港、东南亚和日本市场。要打开出口销路，关键是提高质量。质量不高，就没有竞争能力。逐步减少外贸逆差是个战略性问题。三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一九八〇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通过改革，要取得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条件。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

6月18日 会见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联邦德国、巴西以及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的荣氏亲属回国

观光团部分成员和内地的荣氏亲属，称赞荣家在历史上为发展祖国的民族工业做出了贡献。他说：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这次你们亲属的团聚是一件喜事，是我们民族大团结的一个体现，一个演习。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我们欢迎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参与这个具有前景的事业。在谈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时说：我们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就更加重了。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6月21日 在会见马里总统特拉奥雷时说：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错误是“左”倾错误。“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极左调动不了人们的积极性，致使社会长期停滞。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纠正了极左错误，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现在开始见效了，处在一个发展时期。在介绍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时说：如果达到了这个奋斗目标，首先，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了，再加上全世界的和平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和平力量，战争就更有条件避免。其次，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人类的五分之一摆脱了贫困，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中国是个古老的

国家，在历史上为人类做出过突出的贡献，但是长期的封建制度阻碍了我们的进步和发展，后来受到帝国主义的欺负，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态，所以对人类的贡献少了。第三，那时，中国仍然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国政策的基础。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即使发展起来了，还是要把自己看成是第三世界，不要忘记第三世界所有的穷朋友，要帮助第三世界穷朋友摆脱贫困。实现中等发达水平的中国，仍不忘帮助穷朋友，这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国是在搞社会主义。

6月28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强调要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指出：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明年党的十三大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把关系理顺。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在谈到党和政府的关系时指出：党政分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

多，应该从中央开始。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

7月14日 会见朝鲜国家副主席李钟玉。在谈到干部年轻化问题时说：我们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还要使干部进一步年轻化。老人有老人的长处，经验丰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毕竟活力不够了。老实说，老同志知识面也不够广，科学的东西我就懂得很少。所以，要有专业知识的年轻人来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

8月5日 在北戴河会见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时说：几年来我一直是尽量地不做工作，一旦我不在，可以向世界证明，中国的事情仍然可以办得好，现行政策仍然能执行得好。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国家和党的安全问题。我人还在，但是别人做工作，就可以向国际、国内证明，现行政策不是决定于我一个人，而是决定于政策本身是否正确。

8月19日—21日 在天津视察期间多次同中共天津市委负责人谈话。他说：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

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你们准备向外国借一百亿美元，可以多找一些国家。十年时间，有一两个地方，借百把亿美元，只要讲效益，有什么危险？两百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天津港下放两年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块地，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无非是给了他们权，其中最重要的是用人权。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把年轻干部放到第一线压担子，这个路子对。他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这些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视察天津时的谈话》。

9月2日 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在谈到国际问题时说：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

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在回答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的问题时，他说：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这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台湾人民没有损失。在回答致富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时，他指出：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民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他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

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在回答以后政策会不会变的问题时，他说：肯定不会。因为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根据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他最后说：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

9月3日 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需要审慎从事。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

小平文选》第三卷，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第一部分。

9月13日 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明年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现在实际上没有做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要有一个蓝图。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关于工资改革问题，他说：解决工资问题，关键是企业有自主权。管理权力下放，涉及厂长负责制。现在中国环节多，有些行政公司要改，不搞厂长负责制不行。要搞负责制，首先厂长要负起责任，要明确企业的第一把手是厂长。企业党委的机构太大，人数太多。这两条要加以肯定，下决心予以解决。厂长负责制不要只是试点。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第二部分。

9月28日 出席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并讲话。针对会议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时，有人提出决议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见，他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他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9月29日 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说：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第三部分。

10月18日 在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和夫人、意大利学者齐吉基教授和夫人时说：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就要花。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

10月21日 为悼念刘伯承逝世，发表《悼伯承》一文，对刘伯承一生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文章说：伯承同志党性坚强，突出表现在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他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说伯承同志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恰如其分的。他始终是自己的一切贡献于、服从于党的需要，把自己融合于党的事业之中，毫无个人荣辱得失的考虑，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这篇文章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1月3日 会见美籍华人陈省身教授和夫人。在谈到培养使用人才问题时指出：最好的人才不用才是真正的损失。要努力争取在国外学习的人回国，并为他们

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使他们回国后能发挥专长。国内办高科技中心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吸引人才回国。对少数尖子人才的待遇可以高一些。应该向尖子人才提供较优厚的待遇。对有才能的人应该破格评级提升。对成名的学者为何不可以破格提升？中国目前人才往往从五六十岁的人中挑选，这样就不能体现活力。中国只有出现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科学家、经济管理家和企业家，并由这批人担负重任，国家才有活力，政策才能保持长久。我们建国时一些领导人都是四十多岁。当然，我们那时已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革命斗争。现在选拔的四十多岁的人缺乏这个锻炼，三十多岁就应该注意从基层培养锻炼，逐步提到领导岗位。学术界也是一样，有才干的年轻人要上去，学术界才能活跃，光靠老同志还不行。论资排辈的状况一定要改变。学术界、教育界应该在年轻化方面带个头。

11月9日 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回答根据长期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经验，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的问题时，他说：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

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对我们的军队来说，有坚定的信念现在仍然是一个建军的原则，仍然不能丢掉，这是中国自己的特点。在军队里要讲信念，在人民中间，在青年中间，也要讲信念。首先要向青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的教育。许多青年崇拜西方的所谓自由，但什么叫自由他们并不懂。要使他们懂得自由和纪律的关系。他还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回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和具体内容的问题时，他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领导层干部年轻化，明年党的十三大要前进一步，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哪一天中国出现一

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同样，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搞四个现代化不讲工作效率不行。当然，提高工作效率不仅是党政分开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需要解决。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领导层有活力，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这个谈话分为两篇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篇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第四部分，一篇题为《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

11月14日 会见前来参加中美金融研讨会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一行。在谈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时说：实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中叶的两个目标，关键是坚持开放政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的这几年，带来了广泛的国际合作。但规模还不够理想。可以设想，下个世

纪中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六万亿到七万亿美元的时候，这个合作的规模是很大的。人们现在都说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强大市场，我相信这一点，当然可能在下个世纪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在回答问将来美国商业界在中国投资是否可以有直接的拥有权，是否可以同中国共享利润的问题时，他说：合资也好，独资也好，都可以。既然合作，不分享怎么行。你们担心我们这方面的法律不完备，这可以逐步解决。现在我们确实对这方面的知识不够。

12月12日 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访华团。在谈到改革问题时说：经济体制改革、权力下放、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主要方面。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不够理想。权力下放、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不只是经济改革，也是政治改革。中国的体制改革不容易，积习太深，习惯势力大得很。明确表示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一遇到实际问题就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赞成改革的人，也会变成反对改革的人。改革不仅是这一代人的事情，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要搞改革。只要搞改革，左右前后都要碰到障碍。所以我们要慎重，做这件事不能太急，太急了要出毛病，重要的是坚持改革。中国古代有个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我们的改革不只是过五关，但是我们下决心改革。我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一个头绪，但看不到

改革的完成。在谈到中日贸易和中日关系时说：逆差太多了不行。这是中日经济贸易关系能否持久发展下去的带根本性的问题。中日关系，以经济纽带带动政治关系的发展，中日两国才会真正成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力量。

12月14日 会见贝宁总统克雷库。在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时说：“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使我有机会可以冷静地总结经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改善生活的速度。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我们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由于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我国经济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这中间我们当然也有些好的东西，也有创造和发展，比如原子弹、卫星等，都在那个时候，但总的社会经济面貌没有大的改变，我们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文化大革命”十年更是一场灾难，在许多方面是后退状态。总起来看，这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

个问题不光我们有，苏联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总之，贫穷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谈到我们的发展目标时说：本世纪末中国会出现一个小康社会，虽然不富裕，但日子好过。那时国民生产总值可能达到一万亿美元到一万二千万亿美元，就是人均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那时的人口有十二亿。下个世纪，在一千美元的基础上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还需要花三十到五十年，设想那时的人口控制在十五亿，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六万亿美元。人均四千美元，只能说中国是个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国家总体力量至少将位于世界前几名。只有到那时我们才可以大胆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讲这个话，我们只能说，社会主义总的来说比资本主义优越，但要靠我们的发展来证明这一点。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坚持马列主义理想，过去我们靠这个理想打赢了战争，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但由于一些失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很好地体现。我们要做这件事，但不是几年时间就能做到的，看来要用五十至七十年。我们的信念不是空洞的，但必须去做。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自己。要发展自己就要坚持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我们要搞活经济，要开放，就必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并进一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12月19日 听取几位中央负责人汇报当前经济情

况和明年改革设想。指出：我们的改革到底要走几步？多长时间完成？请你们研究一下。从长远看，粮食问题很重要，要通过改革解决农业发展后劲问题。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问题。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要搞企业联合。形成企业集团，就形成力量，信息也就比较灵通了。在谈到金融改革时，他强调：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对借外债要作具体分析。有些国家借了很多外债，有得有失。我们要借鉴两条，一是学习他们勇于借外债的精神，二是借外债要适度，不要借得太多。借外债不可怕，但主要要用于发展生产。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

12月30日 就学生闹事问题〔1〕同几位中央负责

〔1〕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旬至下旬，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的情况下，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数学生出于各种情绪和缘由上街游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从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煽动，有的地方出现了扰乱交通秩序和违犯社会治安规定的情况。后经各地有关方面和学校当局的教育和疏导，事件逐渐平息。

人谈话。他指出：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处理学生闹事是一件大事，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7年

1月13日 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一行。在谈到学生闹事问题时指出：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我们要改变这种引导不力的软弱状态，要用我们自己的历史来教育青年，也要揭露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因为他们这次的口号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共产党要有纪律。学生闹事不会出大问题，不会影响我们既定的方针政策。处理这样问题的结果，只会使我们的政治局面更加安定，更加团结；只会使我们既定的方针政策，包括开放、改革、建设的方针政策，更加顺利地、稳步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他说：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简单。我们从来没有自我陶醉，没有认为会一帆风顺。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他强调：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放不简单，比开放更难的是改革，必须有秩序地进行。学生闹事，要向他们讲清楚危害在哪里。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

楚。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这才是对青年的爱护，对青年的真诚引导。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排除干扰，继续前进》。

1月15日 在会见芬兰共产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是坚定不移、一心一意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体说就是两大任务，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另一个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要完成这两项任务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排除一切阻碍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障碍。

1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

1月20日 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指出：学生闹事和总书记更换都不是小事，但我们党有足够的处理能力处理这些事情。这两件事的处理，都不会影响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会影响我们对内、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影响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不会影响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只会使我们的党和人民更加清醒，更加相信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

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

1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阐明了这场斗争的性质、意义、范围、重点等政策问题。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2月6日 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了。他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

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他还提出：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十三大报告应该是一篇好的著作。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

2月18日 在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说：大学生闹事，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正因为斗争是长期的，所以我们不搞运动，主要是进行教育。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他强调：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

年，教育人民。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

3月3日 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他说：我们这次用很温和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不搞运动，尽量缩小这个问题的范围，减轻这个问题的性质和分量。有两条要讲一下。第一条，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条，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秩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历来提倡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有纪律。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这个谈话的一

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3月8日 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方针，第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条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确定了两个阶段的目标，就是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在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这两个阶段的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根据这一方针，我们制定了两个开放的政策，即对内和对外开放的政策。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这两个开放不行。还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权。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既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又能保证我们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既然这是个长期的任务，我们

就不能搞运动，方法以教育、引导为主。当然，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使用纪律、法律手段。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当然，对这次学生在游行中提出的我们国家中确实存在着的一些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不正之风等，要重视，要注意解决。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3月21日 中共中央负责人向邓小平报送《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其中提出，十三大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准备循着这个思路加以展开，说明由此而来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由此而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由此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由此而来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由此而来的在理论和思想指导上避免“左”右两种倾向的必要性。25日，邓小平对这个设想作了批示：“这个设计好。”

3月27日 在会见喀麦隆总统比亚时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

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各国情况不同，政策也应该有区别。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

4月6日 会见瑞典首相卡尔松。在回答现在中国强调经济效益和市场的作用，这会不会影响党的领导的问题时，他说：不会。我们正在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党要善于领导，党政要分开。这件事我们没有经验，但又必须做。我们的官僚主义与这个问题有关。我们国家太大，问题很复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多时间里，我们办了不少好事，人民生活有显著提高，但群众意见还是不少，所以说不容易。问题总是要解决的。不管怎样，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变。之所以不会改变，是因为效果显著。群众意见虽然不少，但真

要放弃这些政策，人民会普遍反对。

4月12日 在会见冈比亚总统贾瓦拉时说：我们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是政策对头，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们走第一步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二步也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三步更要靠改革和开放。这个政策几十年不变。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中国后退了，要改变政策了，这是乱猜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有时放得多些，有时要收得多些，这是很正常的。看到我们在某一领域里收一下，就说我们改变政策了，这是一种误解。

4月13日 在会见葡萄牙总理席尔瓦时说：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为处理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我们考虑用何种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立足点是，解决香港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英国和香港的利益；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门的利益；而解决台湾问题，则既要符合大陆的利益，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从解决台湾问题着手，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受台湾问题的启发，我们考虑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看来，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是成功的，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热点问题提供了经

验。会见后，邓小平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4月16日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讲话。指出：“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的事物。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他指出：要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条，需要政局稳定，第二条就是现行的政策不变。比如雇工问题，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动也就是制约一下。他强调：说不变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要保持香港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

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从全局看，我们每走一步都必定会有有的收，有的放，总的是要开放。在谈到基本法的起草问题时，他指出：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中国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级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他还指出：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这种想法不实际。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他们是难以解决的。如果有人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那就非干预不行。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会

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

4月26日 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指出：我们现在的方针政策，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文化大革命”当中，“四人帮”荒谬地提出，宁要贫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他说：到下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不但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所以，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

4月30日 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完整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已经过去的八年多证明，我们走的路是对的。但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他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几十年“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我们既有

“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

5月4日 会见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曼内斯库。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世界总的趋势是和平力量在发展，特别在欧洲。第三世界是和平力量的主力。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谈判上，和平力量应该团结起来。从全局看，在本世纪和下一个世纪相当一段时间里仗打不起来。我们不要丧失这个时机，而要利用这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和平时间好好发展自己。我们的力量越发展，这个仗就越打不起来，从而维持更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即使不说是永久的和平。对第三世界和整个欧洲来说，发展自己同维护和平是一回事情。

5月5日 在会见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等日本朋友时提出，要警惕日本极少数人复活军国主义。他说：中国人民担心日本有很少一部分人，其中可能有的是有政治影响的人，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加强批评、揭露，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题为《警惕日本极少数人复活军国主义》。

5月11日 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我们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联合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政策与阁下一样,是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南北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作为主要任务。这就抓住了要害。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表面上看是发达国家之间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实际受害的还是发展中国家。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开放政策,中国也坚持开放政策。发展中国家不搞开放,就发展不起来。如果不懂得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又闭关自守,根本不可能发展。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政策如果得不到发达国家的响应,就非常困难。西方要发展,从长远讲,如果只在它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搞保护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它需要新的市场。在发达国家内部已到了饱和程度的情况下,新市场在第三世界那里。在谈到世界热点问题时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大原则是任何人不能用武力去侵略别国。

5月12日 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说: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还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一九七八年

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有利于和平。我们不打别人的牌，就是说不打苏联的牌，也不打美国的牌。我们也不让别人打我们的牌。我们认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只要欧洲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这个谈话的主要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

5月22日 在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会谈时说：我们两家都有个统一问题。你们解决同南朝鲜的关系问题，或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关键都是我们自己要发展，自己要搞好。总有一天，要体现出我们的社会制度确实优于他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要超过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现在世界总的局势表明，各个争端问题都不能用军事力量来解决。世界总的形势是谁都不想发动战争，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避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要利用这个机会，借

助一切力量，把经济搞好。

5月24日 同金日成话别。在谈到国际问题时说：现在国际问题更加复杂化，处理国际问题需要我们用更多的方法和方式，从更加广泛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回答问题。现实问题非常复杂，而且千变万化，每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党都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处理问题，强求一致是不可能的。别的国家的同志要理解这一点。现在我们搞开放，对问题的认识也要开放，我们要把经济搞活，也要把政治搞活。在谈到开放问题时说：最近，深圳技术比较高的产品可以打入国际市场。开放政策的成功就要看这一条，这是真正的成功。深圳只用六七年时间，从一个小城镇变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经验是很宝贵的。还有烟台、青岛，一搞对外开放，也是五六年时间就变样了。现在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我们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农业问题。我们要增加对农业的投资，更重要的是实行正确的政策。要使农民重视农业，生产粮食有利可图。调动积极性要靠政策。使农业更加现代化，是更重要的政策。这不是二三年能见效的。很可能整个九十年代我们其他方面都很顺利，就是农业不顺利，我们担心的是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正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6月4日 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矢野绚也。在谈到中日关系时说：战后日本一部分人中一直存在着复活

军国主义的倾向，这些人人数不多，能量不小。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台湾，没有忘记从另外的角度解释日本战后宪法，没有忘记制造中日之间的隔阂，这是很不幸的事情。我们对此始终是担心的。然而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日本，主张同中国友好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会世代发展下去。无论是两国的政治家还是人民，都要从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不仅限于政治问题，还包括经济问题。

6月12日 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指出：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他说：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

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我们的对外开放采取了多种方式。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他强调：要讲究稳妥，但稳妥变成停滞不前就坏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步骤都已经确定，现在的问题是要加快。现在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这是今年十月将要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的主要议程之一。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但是，共同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

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做到这些，我个人考虑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6月29日 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说：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在强调发展民主的同时，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要有理想、守纪律。在谈到民族问题时，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对少数民族地区，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

是坚定不移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看待这样的问题要着重于实质，而不在于形式。这个谈话分为两篇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篇题为《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一篇题为《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

7月4日 在会见孟加拉总统艾尔沙德时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他还指出：我们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二，使我们领导层比较年轻化一些。这两件事都不容易，但是非干不可。政治体制改革如能在十年内搞成功就很不了不起了。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期内不会打。第三世界国家应当利用

这段时间发展经济，逐渐摆脱贫困落后状况。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我国方针政策两个基本点》。

8月1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题词：“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

8月29日 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十三大归根到底是改革开放的大会。在谈到我国农村改革的经验时，他说：我们真正的变化还是在农村，有些变化出乎我们的预料。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剩下的劳动力怎么办？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

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9月3日 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谈到国内形势时说：人民看得很清楚，现行政策使所有的人都得利益。人民的拥护，人民的赞成，这是保证我们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基础。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是新事物，没有前人的经验，也没有外国的经验。某些方面不一定搞得那么准。所以“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几十年内，在某个时候作些调整还会有。我们现在加快步伐，在加快中有时也要作些调整。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每一个措施都要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要更稳。必须是有领导、有秩序、自上而下地进行。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力求我们国家的政策和实行这些政策的步骤、方法合乎我们自己的实际，力求及时总结经验，有错赶快改。

9月5日 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前副总裁二阶堂进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几年前就提出来了，但过去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这次才提到议事日程上

来。十三大要作的报告将从理论上阐述改革和开放的重要性、必要性，这是十三大的主题。政治体制改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逐步年轻化。十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都将比较年轻一些。领导层年轻化是九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但做起来不容易。年轻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第一要保持政治的活力，第二要保持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年轻不行。

10月13日 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他强调指出：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这涉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所有方面的问题。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

了。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比如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再如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又如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所以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

10月16日 会见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施特劳斯。在谈到将要召开的十三大时说：十三大后会加快改革。不仅经济体制要改革，政治体制也要改革。各级领导机构要年轻化，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改革。这一时期，我提出全退，但都不赞成，所以半退，保留军委主席。根据国家的需要，根据党的需要，我还是可以起现在起的作用。这样的安排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一旦马克思召见，不会引起什么波动。在有生之年做好后事安排，非常有利。这次人事变动更加体现了政治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比较年轻的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不

是五年的安排，而是十年的安排。中国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我们与你们历史不同。你们西方民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我们不能照搬你们的东西，一切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去办。在谈到西藏问题时说：达赖喇嘛和美国参议员给我们制造点麻烦，对我们影响不了什么。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谁也没有这个本事。我们对西藏采取扶持的方针，要内地帮助西藏发展。关键是要使西藏人民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在谈到国内形势时说：总的形势是好的。至少在本世纪九十年代会像现在一样平稳地、速度不算太慢地发展。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发展速度不要太快，要适当控制速度。否则配套跟不上，能源、原材料、资金都跟不上，特别是不能为下个世纪发展的后劲打下很好的基础。我们计划连续几十年的发展，要避免曲折，更要避免倒退。总的是要加快步伐，在加快步伐中，头脑要冷静，步子要稳妥。

10月25日—11月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十三大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定了本世纪后二十年和下世纪前五十年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11月11日 在会见朝鲜总理李根模时指出：十三

大报告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讲了到建国一百年时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是到下个世纪中叶，二十一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将发展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一百年已经过去三十八年，还有六十二年，我们的路还很长。以后的六十二年，我们还要夹着尾巴做人，要很谨慎，并且要艰苦奋斗。艰苦奋斗还是要讲，一点不能疏忽，要勤俭办一切事情，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11月16日 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的特点，一个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另一个是更新了中央领导班子，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能够连续贯彻下去，并且加快步伐。他还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于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这样就能听到更多人的意见，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意见。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十三大的两个特点》。

1988年

1月23日 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上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的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在广东、福建、海南建立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海南建省，把海南岛办成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实行比现有的经济特区更加优惠的政策。

3月1日 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现在美苏达成关于中程导弹的协议，这仅仅是缓和的起步。我们欢迎这样的起步。但是美苏裁减核武器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解决，在地区问题上美苏也还没有解决它们应该解决的问题。霸权主义仍然威胁着世界和平。世界真正的缓和仍然需要全世界人民为之奋斗若干年。

5月15日 在会见阿根廷总统阿方辛时说：过去我们曾经对战争有较大的忧虑。七十年代以后，我们改变了观点，发现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现在出现了对话代替对抗的新潮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趋势正在发展。现在人们常说，二十一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我

看这个说法为时过早。最大的缺陷是十亿人口的中国还落后，这个地区还有约十五亿人口处于不发达状态。所以说，太平洋时代肯定要到来，但不是现在。真正的太平洋时代的到来至少还要五十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两个，就是和平和发展。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的和平时间发展自己，看来有可能。你们和我们都要充分利用这个时期，从事建设。

5月18日 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说：我们建国三十九年，头八年好，后十年也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大好。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他还提出：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

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解放思想，独立思考》。

5月19日 在会见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时说：我们党的十三大和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精神都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物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过去，物价都由国家规定。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这就要求我们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理顺物价，加速改革》。

5月24日 在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代表团时说：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口可能是十五亿左右，而且还一定要坚决贯彻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美国有些国会议员不懂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说什么人道不人道。什么是人道主义？如果中国到了那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可言？至少对中国人民不人道。

5月25日 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他说：我们改革的内容为什么那么广泛深刻呢？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所耽误的时间，是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本内容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当然，在改革中也有不同意见，但这

里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革到什么程度，如何改革，如何开放。这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现在不是要收，而是要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不是二十年，因为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在谈到海峡两岸统一问题时说：中国还有个台湾问题要解决。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

6月3日 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他说：我们是在一个贫穷的大国里进行改革的，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我们搞建设有三十九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

备好对策。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对香港的政策，我们承诺了一九九七年以后五十年不变，这个承诺是郑重的。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的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十二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五十年。我们在内地还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他还说：香港要稳定。香港的稳定，除了经济的发展以外，还要有个稳定的政治制度。现在香港的政治制度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今后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如果硬要照搬，造成动乱，那是很不利的。这是个非常实际的严重问题。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要吸收国际的经验》。

6月7日 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梅斯内尔时说：中国正在深化改革，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有了这样的信心，才能有恰当的决策。关

键是两条。第一条就是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决心要坚定，步骤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第二条就是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改革中保持生产的较好发展》。

6月22日 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说：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还需要过好几个关，现在碰到的最大的关是价格制度和工资制度的综合改革。在谈到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时说：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

7月5日 在会见巴西总统萨尔内时指出：今天我可以肯定地说，到本世纪末我们翻两番的目标能够达到。现在要为下个世纪持续发展创造条件，那就要深化改革，加快开放。在改革和开放的过程中，物价和工资改革是件很有风险的事。深化改革会带来通货膨胀，对这个问题，需要整体考虑，综合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尽量减少波动，但改革要坚决地干下去。

7月15日 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两个国家之间总会有些不同的见解，甚至存在一些分歧，这是正常的。中美两国关系需要发展，要把这一发展提到一个更高的角度，提到维护世界和平和全人类利益的角度。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市场，发达国家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两国关系要搞好。在谈到中国的改革时说：中国的改革与苏联的改革不同，苏共党代表大会最近首先提出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对他们来说难度大。为什么中国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做起，而不是从政治体制改革着手？因为中国在政治上问题不大。国际上都在猜测，说中国有两派，一个改革派和一个保守派。中国没有保守派，特别是在我们领导层中，要改革是一致的。有时在改革的步骤、方法上，有些具体的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没有才不好。

8月26日 在会见日本首相竹下登时说：中国要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就必须进行重大改革。我们在闯难关谋求今后的发展方面，第一，改革既要坚决，又要稳妥；第二，经济增长要保持适当的速度，应特别注意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第三，如果能得到更好的国际合作，取得国际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能力就会更强一些。

9月5日 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他说：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他强调：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哪一

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一九九七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我也想去台湾看看,不过看来一九九七年以前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在中午宴请胡萨克时,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他说: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这个谈话的主要内容分为两篇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篇题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一篇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第一部分。

9月12日 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的汇报。在谈到科技问题时指出: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

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他们回来工作的条件，很重要。这些人不回来，实在可惜啊。科教投资的使用要改进，这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嘛。我这里说的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在谈到改革问题时说：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但是，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权威，就办不到。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不仅是价格一个方面的改革，而且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宏观管理要体现

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这个谈话分为两篇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篇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第二部分，一篇题为《中央要有权威》。

9月16日 会见日本自民党前副总裁二阶堂进一行。在谈到改革问题时说：改革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到了应该很好总结的时候。十年来的发展是可喜的，但也带来新的问题。速度快本来是好事，但太快也带来麻烦。通货膨胀主要是管理不严造成的，我们缺乏经验。物价改革以前就有通货膨胀问题，主要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处理得不够妥善。现在需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控制总需求的增长，控制发展速度。我们的胆子够大了，现在需要稳。十亿人口的大国，应力求稳定。走一步，总结一下经验，有错误就改，不要使小错误变成大错误，这是我们遵循的原则。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中苏关系正常化迟早要实现，现在正在走向正常化。正常化的性质不是五十年代那种关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我们同所有国家包括与日本的关系，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中苏关系正常化，自然还有一个党的关系问题。党的关系正常化的性质，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也不是五十年代那种关系。

9月17日 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谈到治理整顿问题时说：我们十年改革并不一帆风顺，现在面临一些问题，特别是通货膨胀问题。我们需要总结十年的经验，制定进一步发展的政策。对一些措施、规划，要根据现实作进一步调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以后还会有，不会风平浪静。我们做好多事还没有经验，欠缺的是本领，不过本领是可以学会的。至于通货膨胀，我们会有办法的。很重要的一条是加强纪律，中央要有效地进行管理。这同开放并不矛盾，越开放越要善于管理。无政府主义会弄得天下大乱。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现在集团政治该结束了，这主要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霸权主义也该结束了，不仅全球霸权主义，还有区域霸权主义。现在世界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到缓和的趋势是明显的，至少在今后三十年、五十年内这一趋势还会发展。道理就是超级大国谁也不敢发动世界大战。谁搞霸权主义，谁侵略别国，到头来都得收缩。绝对优势也没有用，还得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9月21日 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观点。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看来，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

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邻国之间的关系。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都需要这些原则。现在看来，战争打不起来，和平可以维护。发展问题是个南北关系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更多，要放到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解决。要使发展中国家发达起来，穷国、富国都有责任，但毕竟穷国有自己的责任。穷国主要靠自己，靠别人施舍，希望不大。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利用和平环境好好地发展自己。

10月4日 会见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谈到国际关系要用什么新秩序、新原则来代替时说：就我个人的知识来说，经得起考验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能够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左邻右舍服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是亚洲的产物，也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国家应该能够接受这些原则。

10月5日 在会见肯尼亚总统莫伊时说：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原则。先沿海后内地是我们的发展规划，但原材料很多在内地，不在沿海，这样就会出现沿

海和内地的种种矛盾。所以每走一步都要考虑客观世界，制定下一步的方法和步骤。现在我们出现了通货膨胀问题，我们将把整顿经济秩序放在首位。讲发展，第一要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设想，第二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既要大胆，坚持现行的方针和政策，又要步伐稳妥。要求过急，往往是犯大错的根源。前一段时间发展速度太快，恐怕也是这个原因。他指出：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这是总的趋势。和平环境的赢得是全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共同努力斗争的结果，它并不是超级大国发善心的结果。

10月13日 在会见芬兰总统科伊维斯托时，提出实现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指导原则是，“不纠缠过去，一切着眼于未来。”他说：我们要同苏联建立新的关系，即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新关系。可能明年实现中苏首脑会晤。我们在两国外长和高层会晤中不准备谈过去的问题。简单的历史回顾恐怕也难以避免，这要当作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来讲。不纠缠过去，一切着眼于未来，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来解决中苏关系问题。

10月17日 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在介绍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后说：我们最近经济发展过热、速度过快，需要总结经验。所以，我们最近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

提出控制经济发展速度，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初步确定搞两年。一个是降低经济发展速度，保持比较适当的发展速度。一个是努力消除一些腐败现象。为此应该加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控制能力，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和妥善的办法来加强管理。在谈到社会主义问题时说：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我们都在努力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但是，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要多种形式，各有自己的特点。各国只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和与之相适应的方法、方式，制定适合自己具体实际的政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验相互可以参考、借鉴，但绝不能照搬，都是一个模式不行。经验教训，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要自己去总结。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怎么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但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观点、成功的办法。他说：我这样讲有两点。一是每个社会主义国家要独立思考。每个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情况都是千差万别的。二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把生产力搞上去，证

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当然，在较短的时间里不可能证明这一点，也难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

10月24日 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1〕，参观了全部实验设备。讲话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水平。

〔1〕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这项世界高科技工程是在邓小平关心下建成的。

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11月2日 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题词：“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12月2日 在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经贸协会访华团时说：我们的开放、改革政策，不管遇到什么暂时的麻烦，如通货膨胀，都不会改变。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搞了十年。这十年应该说是成功的，它使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台阶。现在我们正在上第二个台阶，即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上第二个台阶遇到的问题比上第一个台阶所遇到的问题还复杂。现在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进行调整，保持适当的速度，这些都是不可少的。我们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问题，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上第三个台阶需要花五十年，那时遇到的问题将更多。国际上对我们的发展情况估计得比我们更乐观一些，但我们自己要小心谨慎。现在遇到的问题总有办法解决。

12月21日 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他说：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

展问题。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我们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有自己的良好政策。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一九七四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他最后说：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

1989年

1月2日 对民主党派成员关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问题所提建议作出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根据邓小平这个批示，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下发。

2月4日 在上海会见为中苏最高级会晤准备工作而来访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任务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个任务相当繁重，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太多，牵扯面太广，而且都不是小问题。为了开辟未来，也需要了解过去。不过有个限度，只是了解，不予纠缠，重点在于开辟未来。在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指出：就我个人而言，希望中国能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应有贡献。只有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才能发展自己，摆脱落后。为此，我们必须改变同一些重要国家的关系。我们同美国在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的基础上实

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同日本恢复了两国邦交，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我们与英国发表了联合声明，按“一国两制”的原则解决了香港问题。现在剩下的重大问题就是中苏关系问题，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

2月22日 在会见布隆迪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布隆迪总统布约亚时说：我们是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也不一样。要我们所制定的每项政策都能照顾到各个方面，是不可能的。总有一部分人得益多些，另一部分人得益少些；就是得益少的那部分人生活也比过去好得多，但还是要发些牢骚。我们的事情又好办，又不好办。好办的是举国一致，十亿人都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拥护发展战略；难办的是完全照顾到十亿人不容易。十年的发展使我们上了一个台阶。上台阶的好处是差不多十亿人都得到益处，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就是经济发展过热。人们提出的要求更高、更难满足了。总之，这些问题我们要解决，也是能够解决的。

2月26日 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

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我们已经对建国以来历史事件的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也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他还说：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压倒一切的是稳定》。

3月4日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关于如何估计形势，他说：要看到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大多数学生是拥护改革的。告诉同志们，遇事要沉着。台湾集中攻击我们四个坚持，恰恰证明四个坚持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

就乱了。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违法的就要取缔。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我们在这方面控制得严一点，不会影响外商来华投资，恰恰相反，外商会更放心。我们要让国内外明白，加强控制是为了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他最后指出：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不允许乱》。

3月23日 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他说：中国过去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封闭状态，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把这个问题恰当地解决了。从那时到去年底的十年里，中国有了可喜的成就，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台阶。发展中也出现了新的失误，但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成就，这是我们的根本观点。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困难。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准备用两年或更多的时间来解决问题。我们的一条经验是，发展顺利时要看到出现的新问题，发展要适度，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

总之，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他说：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非洲国家要利用这一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要根据本国的条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搞好民族团结，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使经济得到发展。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他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4月8日 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将军。在谈到国内情况时说：这几年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但也出现了经济发展过热的情况，带来了一系列供求关系的困

难。这种现象如果在五年前就警惕，可能情况比现在好得多；哪怕在三年前注意这一问题，也会比现在好得多。这件事也许为国际上提供了一种经验：当事业进行顺利时，就要提高警惕，避免差错。要考虑到发展快会带来什么新问题，尽量避免出现过失。即使出现了，也要尽量缩小。

4月28日 就海南岛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问题作出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1〕

5月11日 会见伊朗总统哈梅内伊。在谈到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争端时说：中伊两国是朋友，我们同包括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国家也都是朋友，我们希望你们和平共处。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团结起来，不要把力量消耗在相互的争端上。我还是一句话，“和为贵”。他说：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在当

〔1〕海南一九八八年建省并在海南岛建立经济特区后，中共海南省委、省政府决定在位于北部湾东部、海南岛西北部的荒凉半岛洋浦划出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租给外商成片开发，租期为七十年。此举引起不同意见。三月三十一日，中共海南省委负责人写了《关于海南省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汇报》给杨尚昆并报邓小平。这是邓小平在详细了解情况和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后的批示。

前国际缓和的大气候下,只有不怕麻烦,通过耐心对话来解决问题。只能选择对话,不能选择战争。中国要力争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把自己发展起来,这是我们当前要做的最主要的事情。

5月16日 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指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时,他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

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关于中苏关系问题，他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过损害。从中国得利最大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在谈到近三十年来，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的问题时，他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他说：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过去就结束了，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在今后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5月31日 同两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他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在谈到动乱平息之后怎么办的问題时，他说：我们确实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主

要有两条：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第三代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要干出实绩。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他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个根本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来选。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他指出：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

当前，放眼一切方面。他告诫：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他最后说：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

6月9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讲话。指出：这场风波〔1〕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

〔1〕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在悼念活动期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诬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由于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对动乱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发展。从五月十三日起，北京非法学生组织“高自联”煽动一些人进行绝食，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为保证社会安定，恢复正常秩序，国务院决定自五月二十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是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戒严部队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组织各种非法活动，最终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六月四日，党和政府依靠人民，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

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今天我不可能展开来讲，只是提出课题。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

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当然，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八十年代初就提出要两手抓。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到计划与市场问题时，他指出：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封闭性的国家。实行封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总结过去的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他最后强调：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要坚定

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6月16日 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他表示，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他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他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他还说：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

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他说：现在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同时要赶快注意那些对我们前进不利的事情。第一，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第二，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要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第三，平息暴乱抓到底。他最后强调：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

6月23—24日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调整，撤销赵紫阳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选举江

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中共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7月2日 会见美国总统布什的特使、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斯考克罗夫特是在中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平息发生在北京的政治风波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宣布制裁中国的情况下秘密访华的。邓小平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

8月20日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文选集中了邓小平从抗日战争时期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二十八年中的重要文章、讲话共三十九

篇。文选所有文稿在出版前均经作者审定。

9月4日 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主要商量自己退休的问题。他说：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退的方式，越简单越好。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也没有什么好处。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我退休时的职务交待，军委要有个主席，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希望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安定团结和改革开放的形象。我们是一个大国，只要我们的领导很稳定又很坚定，那末谁也拿中国没有办法。改革开放放弃不得。如果固守成规，照过去的老框框一模一样地搞，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关于国际形势，他指出：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

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国际局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动乱。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还要很冷静地观察。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别人的事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他最后说：到本世纪末翻两番有没有可能？我希望活到那个时候，看到翻两番实现。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

同日 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求辞去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信中说：“一九八〇年我就

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封信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9月16日 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指出：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在谈到个人退休问题时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要搞退休制。在谈到不久前发生的政治动乱时说：现在我可以肯定，经过动乱，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和改革

开放事业可以搞得更好。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我这里主要讲两点。第一，中国目前局势是稳定的。第二，中国人吓不倒。在判断中国局势的时候，这两点是必须看清楚的根本的两点。总之，中国一定要发展，改革开放一定要继续，生产力要以适当的速度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一步步改善。邓小平请李政道教授转告认识的人，包括在国外参加过游行、签名的人，请他们放下包袱，中国不在意这个问题。他还指出：搞改革开放有两只手，不要只用一只手，改革是一只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一只手。有时这只手重些，有时另一只手重些，要根据实际情况。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

9月19日 会见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针对巴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1〕对中国处理动乱的指责，指出：那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根据谣言做出的，中国不能接受。我们对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主宰一切表示怀疑。中国不怕威胁，不怕孤立，也不怕制裁。提出制裁中国的国家，其内部是否行得通还是个问题，现在事实上也没有行得通。一个国家自称为世界宪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文化大革命”时，中国本身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但也没有把中国搞垮。老实说，制裁十年、二十年，中国也还是存在。

10月1日 出席首都各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四十周年联欢晚会，在天安门城楼与朝鲜国家副主席李钟玉谈到不久前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时说：发生那件事是坏事，但归根到底对我们是有益的。过去一段时间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我们党一些同志把思想阵地也交出去了。经过这件事，我们清醒了。我们的秩序两个月前已经恢复，但还要保持必要的警惕。不过戒严不

〔1〕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至十六日由法国、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七国首脑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在法国巴黎举行会议。会议在十五日发表的政治宣言中，“谴责”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是所谓“中国违反人权的暴力镇压”，宣称要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及延缓支付世界银行的贷款等制裁措施。

影响人民的正常活动。

10月10日 为纪念十月十三日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四十周年题词：“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10月26日 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说：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得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就体现出来了。他们的决策人至少有两点对中国认识不清。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

10月31日 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我们同美

国也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他说：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他请尼克松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

11月6日 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时说：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分重

要，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决不能放松，否则，我们非垮台不可。两个总书记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不是一般性的错误，而是政治思想原则问题上的错误，是带根本性质的错误。现在实际上换成了第三代领导集体。第三代领导集体就是江泽民同志当头头，以他为核心。江泽民同志知识面比较宽，多年来都是地方和部门的重要干部。这四个多月的中央工作很不错。他工作扎实，而且比较民主。

11月6日—9日 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和《关于调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决定由江泽民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11月9日，邓小平会见出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全体同志，说：“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11月10日 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回答如何确保改革开放持续到下一个十年等问题时说：可以肯定地说，谁要走回头路，谁就要垮台。十年改革开放，虽然出了些毛病，现在需要进行治理整顿，但成就是很显著的。我们前进了一大步，使中国上了一个台阶。这

一切来之不易。实践证明了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加强中央的权力是对的，但并不等于改变过去实行的改革开放以及权力下放等措施。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说：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

11月12日 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发表讲话说：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这与世界各国的军队不同。就是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也不同，因为他们的军队与我们的军队经历不同。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把我们军队建设得更好，为捍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捍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11月17日 在会见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和夫人时说：中美要友好相处，这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我们不做伤害美国的事，美国也不能做伤害中国的事。这次美国官方使用的手段太厉害，甚至连回旋余地也没有留。中国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压力的，同中国闹僵没有好处。要尽早结束这个纠葛，最好不要超过今年，为什么八十年代的事情要拖到九十年代？不必讲是谁占了上风，谁占先，谁胜利，也不能让世界上的人认为哪一家输了，哪一家屈服了。解决中美之间半年纠葛，不管美国使用什么语言、方式，要在实质上结束制裁。我们希望短期内解决这个纠葛。作为一条原则，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态度来解决纠葛。

11月20日 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回顾“刘邓大军”这支英雄部队的历史。他说：回想战争年代，我们二野在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这是对二野的评价。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上下级之间，各纵队之间，甚至于更下层一点，关系都很协调。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题为《对二野历史的回顾》。

11月23日 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说：霸权主义过去是讲美苏两家，现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国平息暴乱后，七国首脑发表宣言制裁中国，他们有什么资格！谁给他们的权力！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他强调：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

12月1日 在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

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主要成员时说：在国际垄断资本对我国实行制裁时，你们带了这么大一个代表团来我国访问，这是真正友情的表现。他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换了代，现在事情归新一代领导人管了。他们主持全局已经五个多月了，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并没有因为我退下来而有任何变化。我们一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在谈到今年发生的动乱时，他说：在过去的工作中我们虽然有一些失误，但事件的原因也来自国际上的大气候。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看清了这一点，就有助于认清问题的本质，总结经验教训。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这次动乱还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稳定的重要性。这次我们采用戒严的方式解决了动乱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以保证我国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12月10日 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的特使、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说：你这次访问是非常重要的行动。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肯定要影响世界。他说：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他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1990年

2月17日 在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委员时说：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这个即席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香港基本法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于一九九〇年四月四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实施。

3月3日 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他说：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不管苏联怎

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他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综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比如抓上海，就是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在谈到农业问题时，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

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他最后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

4月7日 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时说：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中国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振兴中华

民族》。

7月3日 在视察北京市亚运会场馆等市政建设工程时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什么困难的事都能搞成。我这次看亚运会体育设施，就是来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比外国圆。现在有些青年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我们的宣传不会回答为什么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中国只能是社会主义，不能是资本主义。回答这个问题，有好多例子可以借鉴，现在的解释平淡得很，讲不出很多道理。

7月11日 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他说：中国有抵抗制裁的能力。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尽管东欧、苏

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我们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什么“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中国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引起大家警惕，是为了提醒各国决定对华政策时要谨慎。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

9月15日 在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说：现在台湾有人想搞“一国两府”，连联合国的局面都想改变，实际上还是搞“两个中国”。怎么能把台湾当局称为中国政府呢？这不行。再没有比“一

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大陆是中国的主体，有十一亿人口。其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二，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八。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共同努力，实现祖国统一》。

12月24日 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指出：对一年半以来中央的工作，我满意。对这次统一思想，制定出新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我完全赞成。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在谈到国内问题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

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他说：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他强调：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国际上不可能小视我们，来中国投资的人会越来越多。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

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1991年

1月28日—2月18日 在上海视察期间，同上海市负责人谈话。指出：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他还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他强调：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

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这些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视察上海时的谈话》。

3月 为中国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十年周年题词：“绿化祖国，造福后代。”

4月23日 为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八六三计划”工作会议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会议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8月20日 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方面道理也要讲够。这一段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重点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没有改革开放十年经济发展的那个飞跃，取得顺利调整是不可能的。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总结经验，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机会难得呀！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

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他强调：人才难得。我们现在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没有很好地发现，发现了没有果断地起用。总的看，我们对使用人才的问题重视不够。建议中央总结一下用人的问题，尊重人才，广开进贤之路。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总结经验，使用人才》。

10月5日 在会见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时说：我们搞改革开放，要有两手：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手中最核心的是发展生产。我们的改革是先从经济上，从改善人民生活上做起，不是从政治上做起。在宣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我就说过，不赞成美国式的民主。我当面对布什以及其他美国人多次讲，我们不会学美国。我们不赞成西方民主，但是我们也确实要民主，要社会主义民主。在谈到国际问题时说：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还没定，恐怕要成十年、成十年的时间才能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观察，少露锋芒，沉着应付。孤立中国，谁也办不到。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没有起什么作用。七国集团从宣布对中国制裁的第一天起，就不一致。因为在美国宣布对中国制裁的同时，布什就宣布中国是不能孤立的。在

谈到国内问题时说：今年中国遇到的水灾是很大很大的水灾，救灾这件事教育了人民，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共产党的领导好。真正要出问题，是我们内部出问题，别人拿我们没办法，美国也没办法。因此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包括自我教育，党员干部的模范作用，不搞特殊化，这是过硬的东西。中国太大，也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垮，社会主义事业就垮不了。东欧、苏联的事件帮了我们，坏事变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

1992年

1月18日—2月21日 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为两个讲全了。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恐怕再有三十年的

时间，我们才会在各个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多搞点“三资”企业，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解决

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而后继续前进。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

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

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这些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0月12日—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从九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

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会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3年

11月2日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邓小平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二年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作，共一一九篇。编辑工作在邓小平亲自指导下进行，全部文稿经他逐篇审定。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决定》指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为落实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统一全党思想，教育干部和人民，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和最有力的武器。从现在起，要把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摆在党的思想建设和干部理论教育的主要地位。同日，中共中央举行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学习报告会，江泽民发表讲话。

1994年

11月2日 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八三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经邓小平同意，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作了增补和修订，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第二版。这次修订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连同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第三卷，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邓小平著作集。

1997年

2月19日 邓小平在北京逝世。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全国人民深切悼念、缅怀邓小平。21日，新华社播发《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25日，邓小平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江泽民致悼词，高度评价邓小平光辉、战斗的一生和建立的丰功伟绩。他说：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就是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念，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和愿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教导，坚定不移，满怀信心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3月12日，根据邓小平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入大海。

9月12日—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大会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